滕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滕縣文史資料

第一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滕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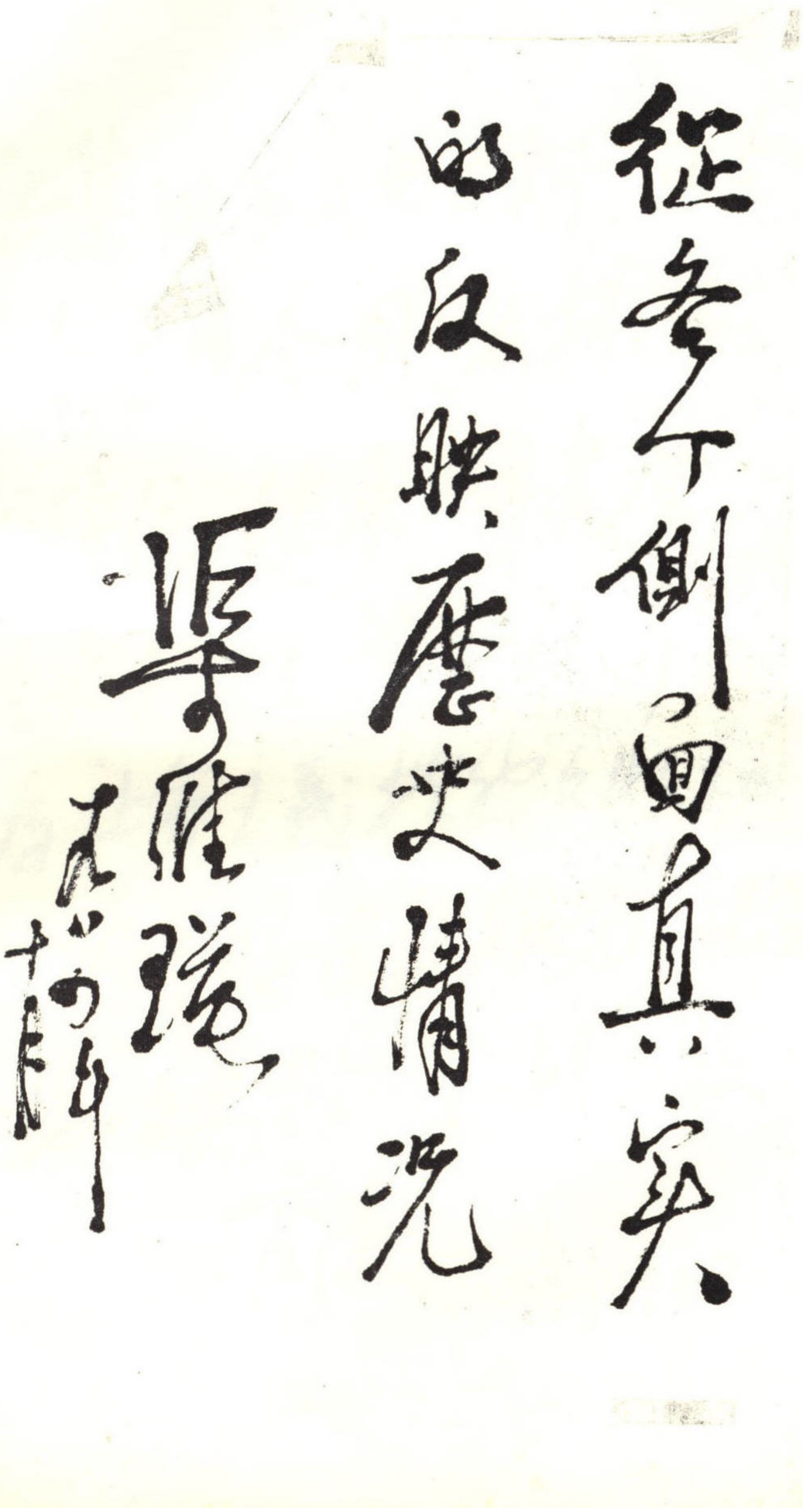
滕县文史资料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滕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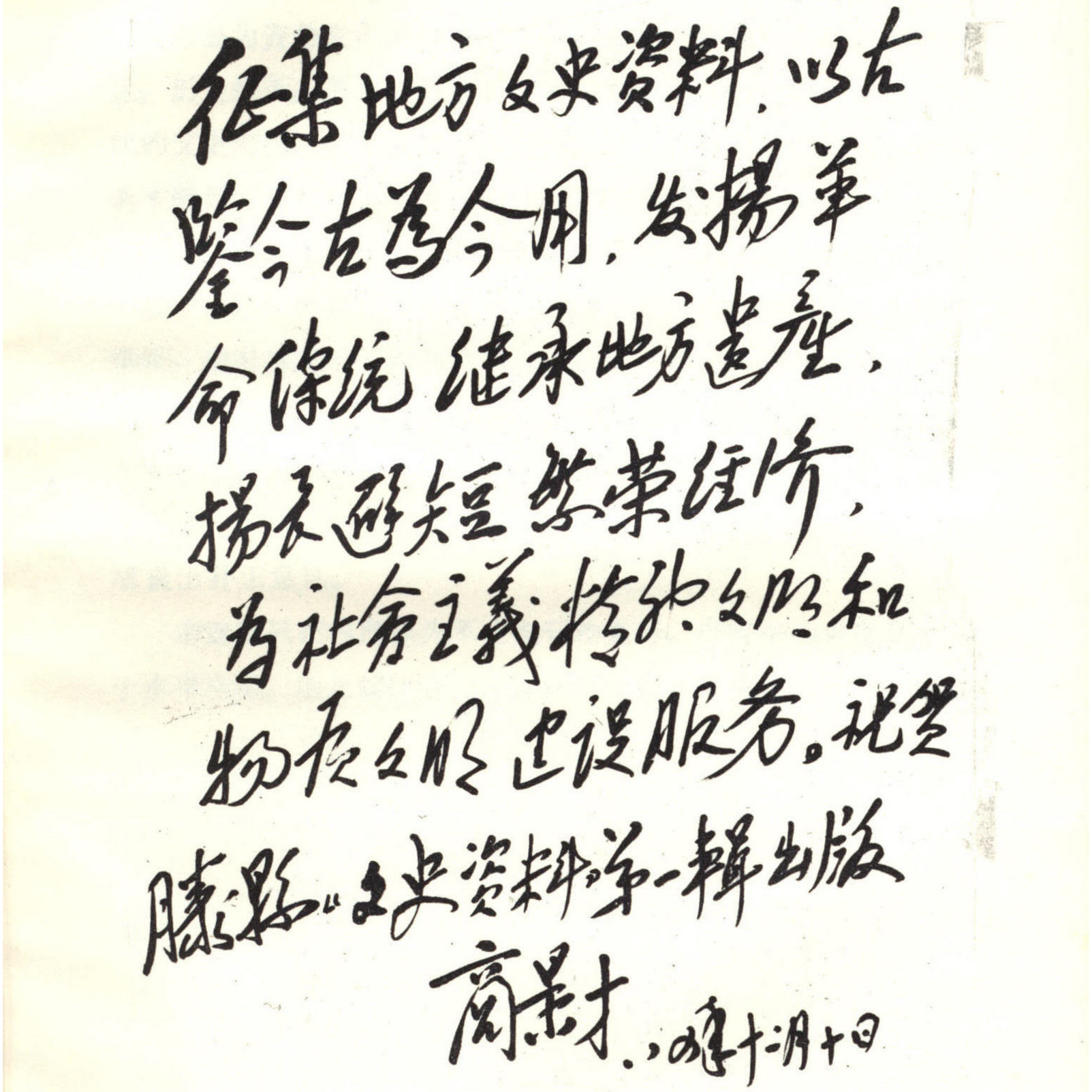
南京部队后勤部原副部长

渠维瑛同志为本刊题词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商景才同志为本刊题词



前　言

滕县为齐鲁文化发祥胜地之一，古有“滕国”之称，文化发达，历史悠久，所存史料颇多。为积累和保存历代特别是近、现代的文史资料，使其发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应有作用，特编选《滕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供内部参考。

本选辑所选资料，一般时限是从清末到六十年代中期；选文一般要求求实存真，秉笔直书，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本辑所选资料，相对地重视了滕县抗日保卫战的一些史实记录，同时相应地辑录了在滕县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几位领导人及滕县籍著名民主人士的一些事迹。所选资料因多是撰稿者本人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在观点和材料上都难免受到一定的局囿，深望得到知情者提出补正意见。

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供有关方面参阅。由于水平所限，加之编印仓促，讹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政协滕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群策群力办好《滕县文史资料》……郭良志（1）
滕费峄边区斗争概况……穆林口述　党史办整理（3）
忆八年抗战工作片断……商景才口述　鲁在岭整理（11）
滕县抗日守卫战纪实……熊顺义（25）
滕县抗日守卫战亲历记……何煜荣（42）
颂川军抗日……黄以元（49）
滕县沦陷的片断回忆……罗广海（50）
北沙河惨案记……县政协调研科（54）
刘子衡先生史实述略……刘曾莹（60）
清末翰林高熙喆……高竹澳（109）
滕县医林人物史略……张存明　马同如（113）
滕县书院今昔……马昭航　龙厚昙（131）
滕县华北基督教会与孤儿院……罗广海（144）
反帽税　打帽行……张知寒（148）
临城劫车案我见我闻……王有持（154）
“滕国”漫游……万　东（165）
七千年前的村落……万　东（167）
滕县轶事一则……滕县城关镇地名考查小组（169）
滕县政协历届主席、副主席、常委简介……（171）
征稿启事……（187）

群策群力办好《滕县文史资料》

郭良志

《滕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在县委领导下，在有关方面的热情帮助、积极支持下问世了。

这些资料是撰稿人的亲历、亲见或亲闻的史实记述，它的出版既可以弥补历史文献的匮乏，为我县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又能够为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真实生动的教材，从而在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建设“两个文明”中发挥其一定的积极作用。

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的。周总理指出：研究文史资料的方向，就是“用历史知识教育后代。”这是我们办《滕县文史资料》的指导思想。在征集、编辑、出版文史资料工作中，我们始终以此为文史资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让它在推动统战工作方面发挥相应的作用；让它推动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推动八十年代三大任务尽快实现。

胡耀邦同志发出“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号召，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在筹稿时注意征集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它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实际；让读者从中看到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历史传统；看到老一辈革命家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到创业之艰难，从而更加激发了自己的爱国热情，积极地投入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去。

为了办好《滕县文史资料》，我们要积极倡议——迅速“抢

救”滕县文史资料。“抢救”工作迫在眉睫，因为我县地处齐鲁之邦，古称“滕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县内有古滕城遗址，七千年前的村落——北辛遗址；还有近代和现代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的事迹，正待我们的搜集整理。有些年事较高的老人是知情者，他们有的身体欠佳，就史料来说，人在史在，人亡史亡。因此，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动员知情老人抓紧提供史料，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切实抓好发掘和“抢救”这些宝贵史料的工作。

征集文史资料是一项既严肃又认真的工作，“要认真，要实事求是。”撰稿人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但必须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尊者讳、不溢美、不隐恶、不贬损，文史并茂，多说并存。

《滕县文史资料》是政协滕县文史委员会编印的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参考资料。希望各界人士，广大读者积极撰稿，踊跃提供史料的重要线索，并对我县文史资料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批评或建议。

滕费峄边区斗争概况

穆　林

一九四一年成立四地委。我在地委工作。一九四二年，四地委和鲁中地委合并，组成滨海地委。一九四二年春，鲁南区党委决定：调我到滕峄边任县委书记；调纪华到运河支队任政委。

当时，山东分局，区党委的领导都和我们谈了话，最后由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又给我们谈了话。罗政委对我说："你的任务是开辟山区根据地"。对纪华同志说："你的任务是巩固平原根据地"。那时候开辟山区根据地不容易，敌我力量悬殊，伪顽势力猖獗，争取一个村子，占领一个山头，有时要付出很大代价。一块地盘白天被敌人占领，晚上我们又拼命夺回来，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扩大。巩固平原根据地困难更大。枣庄地区的平原，主要在津浦沿线两侧，北从界河，南至临城，既是交通要道，又是敌占区。敌人的汽车、大炮到处可以通行，对我们极为不利。但是，鲁南地区党的组织建立早，群众基础好。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山区根据地，同时坚持在平原一带活动。运河支队、独立支队，随时随地地打击敌人。尽管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大举扫荡，严密封锁，我们的脚跟始终立得牢牢的。这是因为，一是有党的正确的抗日方针，二是靠牢固的群众基础。

我到滕峄边之前，一九四一年春，敌人进山，区党委、一一五师东撤到临沂、郯城一带，这时四县边联县委存在，滕东县委解体，到了七月，区党委派崔晓东同志来滕东恢复了县委。到十一月，滕东县委撤销，成立了滕峄边工委、办事处。当时的人事安

排情况是：工委书记崔晓东，组织部长李子成，宣传部长刘耀华，统战部长邱焕文，工会主任李西亭，办事处主任孙怡然，民政科长孙文成，财政科长王子玉，教育科长尹伯恒，财粮科长田诚，公安局长马平。

滕峄边的范围，从西北角的城前，往东南到白彦、辛庄、板上、辛召、高桥、北庄、抱犊崮、岩头、郭里集。从西北到东南一条长线，约三百华里。共划分六个区。一区抱犊崮为中心，区委书记朱云（翟厚仁），区长李瑞（四四年李瑞调崖头区任书记），宣传委员孙倩，区中队长姚洪义，张露做妇女工作；二区以徐庄为中心，区委书记刘耀华，区长陈正寅，副区长王正方；三区以辛召、东西七里河为中心，区委书记霍建华，区长王传章；四区以下辛庄为中心，区委书记李子成，区长张锡爵（后叛变），宣传委员朱英（朱瑞柯），特派员何先锋（朱慕唐），区中队长李继义，财政助理张天运，粮食助理张焕彩；五区以东西濂水、大小岩头为中心，区委书记孔子玉，区长赵剑一；六区以西集为中心，区委书记薛广信，区长王鼎新。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到滕峄边任书记，崔晓东任副书记，其他人员不变。这时撤销峄县，建峄南县委，峄县的东西阳泉开始划归滕峄边管辖。

滕峄边县委常驻辛召、七里河一带。我到滕峄边的第一天，带县机关百多人，县大队二百多人，住在前辛召，晚上开了一个见面会。夜里从山亭伪军据点里来了二百多人把我们包围了，天还没有亮，敌人就向我们打枪，他们有机枪、小炮。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和敌、伪、顽相峙而立，相望而居的情况下，我们夜间睡觉经常不脱衣服，而且连屋门都不关，裹腿打得好好的，一旦有情况，三分钟就可以把部队集合起来。我们把人员集中起来后，拿两个班阻击从西边来的伪军，其余的边打边顺着山沟往东撤。撤离中我们有十二名同志光荣牺牲。东撤大约一个多小时

后，我们占领了有利地形，狠狠地向敌人还击，伪军久攻不下，中午撤了回去。

当时县委驻地，没有固定的地点，常常在游击区里流动，住过的村庄很多，有时我们刚住下，就被敌人挤跑了。那时县委书记一律兼县大队政委，所以当地群众都称呼我政委。一比五万的地图成天在我兜里装着，哪些村庄是我们的，哪些村庄是敌、伪、顽占据的，一有变化就用红圈、黑圈标起来。

武装斗争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它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不抓它我们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开辟、巩固根据地了。在这一带究竟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主要的战斗也有几十次，有些战斗我们有准备，有计划地去打，比如打毛家宅子，这个地方的反动势力很顽固，不打它就会影响根据地的巩固，也不利对日伪军的打击。因此，我们采取主动；有的战斗很突然，是遭遇性的，多数是我们主动出击敌人。根据地就是这样一寸一寸地打出来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敌人一年几次大规模的向根据地进行扫荡。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被迫还击，进行反扫荡。敌人的扫荡多数在春、冬两个季节进行。夏季青纱帐起来了，我们白天可以到处活动，敌人出动就少了。只要看到白天敌人开汽车能走的路，晚上我们就把它挖掉。这个季节既是我们出击敌人，打埋伏的好机会，又是部队休整的好时机。

一九四二年五月，鲁南区党委在费县黄崮区的黄草坡村召开扩大会议。由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传达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四月份在山东分局委员座谈会上关于根据地和减租减息问题的指示。

刘少奇指出："什么叫根据地？根据地不能只有枪杆子和政权，还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群众发动起来了，武装才能扩大，战斗力才能增强，根据地才能巩固。"当时他还对黎玉和罗荣桓

说："这件事拜托给你们弟兄俩，不发动群众搞好减租减息，我就给你们送一块匾，叫做右倾机会主义"。

六月，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决定：从滕峄边划出四个区，从区党委和一一五师民运部抽调部分同志组建"实验县"，即费滕工委，主要任务是开展减租减息的实验工作。一一五师民运部长李青任书记，王韬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马伟宣传部长，靳怀刚敌工部长，委员有肖长桃、何波，崔波任妇女主任。县长刘剑，公安局长马达，民政科副科长赵千，财粮科长李干武，文教科长李恭。一区劳山，以苗庄为中心，区委书记黄逸宾，区长任一人，副区长李坚；二区皇崮，以白彦为中心，区委书记马东昌，区长梁昌武；三区岳棚，以欧家峪为中心，区委书记是从滕四区调过来的赵孝庭，区长王正方，副区长管敦武；四区以上下辛庄为中心，区委书记李子成，区长张锡爵（后叛变），各救会长耿益。四三年古历正月陶有亮接替李子成区委书记职务。

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反扫荡、反蚕食，加强敌占区工作，对敌加强政治攻势，巩固根据地，减租减息。

自从开展减租减息后，党组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变化，四二年以前，党员中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双减"工作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教育了广大贫雇农，一大批农民被吸收到党内，不少还参加了支部工作，重点的村、乡都建立了党的支部。部队中把支部也建到了连队，战斗力加强了，根据地巩固了。

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主要表现在建立"三三制"政权上。根据毛主席一九四二年的讲话，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共产党代表，群众代表，开明地主士绅代表组成的政权组织。

一九四二年冬，敌人扫荡白彦、大皇崮一带。皇崮区的区委书记、区中队长、各救会长等十几名同志，在皇崮山顶上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壮烈地牺牲在皇崮山顶。

一九四二年冬的翻边战术。十二月日军对我白彦、皇崮一带进行扫荡，大的村镇不是敌人安了据点，就是伪顽安据点，仅滕东一带的据点就有二十多个，滕费交界处就是李宜锦的据点，碉堡一个接一个，同时还强迫老百姓挖封锁沟、垒封锁墙，东部山区从邹县往南，到西集这一线都有敌人的封锁沟、封锁墙。我们则发动群众反扫荡、反封锁，采取翻边战术，白天日军强迫老百姓挖的沟、垒的墙，到晚上我们又发动群众把沟填平，把墙拆掉。连这一带的伪区、乡长都发动起来了。如，田庄乡乡长田忠湘和我们经常有联系，我们常住在他那里，他不但给我们送情报，还掩护我们，并发动群众参加反封锁，帮我们一起破坏封锁墙、封锁沟。乡公所有部分武装，用的弹药是从枣庄伪军那里领来的。每到晚上，他们总是朝天上放枪，手榴弹乱扔一气，同时派人向枣庄汇报，就说又把八路打跑了。第二天再派人去枣庄领弹药。

我们还采取钻、挤的办法，钻敌人的空子。一个村庄，一个碉堡地挤，对于敌、伪、顽的据点，我们成天合计如何钻空子搞掉它，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地挤，一块一块地夺，使根据地不断扩大。

争取中间力量，震慑首恶分子。每当敌人扫荡，地方伪顽势力、反动地主豪绅、伪保长就猖獗起来，死心踏地为敌人效劳。我们始终贯彻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一致对外，打击少数的方针。对于积极抗日的伪乡长，就放手利用，有的还结合在“三三制”政权里，对于立场不稳的，则加以教育，他们做一件有利抗日的事，我们就给他记一个红点（表扬一次），对做一次坏事的，就记一个黑点（警告一次），连续三个黑点的就坚决枪毙。这种方法在地区伪化时期对震慑首恶起到一定作用。

在费滕边工委建立两个月后，即四二年秋冬之际，经鲁南区党委同意，撤销滕峄边县委和办事处，建立双山县县委和政府。

双山县以徐庄为中心，（编者注：关于双山县建立时间，有几种说法，孙怡然说：四三年的七月，鲁南区党委决定取消滕峄边县委、办事处，秋天打垮九十二军，冬天成立了双山县；祁耀华说：一九四四年春，上级决定将费滕峄边区县政府改为双山县政府；渠维瑛说：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消灭刘黑七后建立的双山县；霍建华说：四三年秋打跑国民党九十二军后建立双山县。）我任书记，组织部长刘德坤，宣传部长刘耀华，敌工部长渠维瑛，县长刘剑，各救会长冷朋，秘书王华英，公安局长马达、副局长马平，民政科长孙文成、副科长赵千，财粮科长杨俊达，司法科长王鼎新，教育科长李恭。所辖八个区。

四三年，朱云带领武装在石道峪和伪军打了一仗，他们在山头上把主要道路封锁起来，把伪军围住了，然后开展政治攻势："只要放下武器，愿走的就走"。伪军听后，纷纷把枪送到了山上，一个个撒腿就跑，我们缴获机枪二十多挺，还有不少步枪。

战争时期，三道峪、石道峪人民一直对我们很热情，每到一处，群众都为我们解决吃住、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掩护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费滕峄中心县委改称双山县，领导人员除增加了王韬任副书记（不久又换王化）外，其余人员不变。所辖区不变。中心县委直属鲁南区党委领导。为加强对敌斗争的需要，区党委委托中心县委代管枣庄工委，书记邱焕文；代管独立支队的第二大队——铁道游击队，政委孟昭煜；代管滕东县委，书记王有持。同时鲁南区党委已决定，撤销鲁南独立团，缩编为独立营，归中心县委领导，我任政委，杨广立任副政委（不久杨调铁道游击队任政委）。原团政委肖长桃任营长，王福振为副营长，下编三个连。

四四年建立崖头区，李瑞从军山区调来任区委书记，区委常驻土罐村，这里地形很好，有利于我们出击敌人，敌人还不敢轻易进驻，这一带群众基础好，半湖据点的敌人一出动，我们这里

很快就知道。双山县合并为中心县委后，李青调到了费南中心县委任书记，崔晓东调到了费东，四四年费东改为温河县，崔晓东调回滕县任书记。

温河县直属区党委领导，许言任书记，不久许言又调到鲁西二地委任书记。

四四年的冬天，我调到二地委（住两城一带）。从这开始撤销中心县委，又称双山县。孙振华接替我任书记，徐培元任县长。

滕峄边、滕费峄，从四〇年建鲁南区党委，一直到四四年的春天，都是区党委的直属县。

一九四五年解放，成立枣庄市委，杜季伟任书记，后从二地委调许言来任书记。

编后附记

穆林同志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七年在山东工作。其中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六二年一直在鲁南一带从事革命工作。

“七七”事变后，穆林同志去延安学习。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结业后，回山东分局任党校教员。秋天到大鲁南区任区党委委员、党校主任。一九四〇年小鲁南区党委成立，任党校主任。直到一九四一年秋，成立四地委止。一九四二年初，鲁南区党委派他到滕、峄边任县委书记。一九四二年八月，任中共双山县县委书记。一九四四年春，任费滕峄中心县委书记。后又到鲁南区党委工作。

一九六二年，穆林同志调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副省长；一九七七年调吉林省工作。一九八三年五月离休。

离休后，于同年十一月来山东作调查研究。路经济南、烟台济宁、曲阜；十二月一日到达滕县。五日穆林同志在市县领导陪

同下，前往枣庄以北，抱犊崮山区的北庄、辛召、徐庄、山亭等老革命根据地访问，爬山越岭，行程二百余里。访问了当年的老党员、老交通员、老游击队员和老贫农，亲切地回忆了党的这段光辉的战斗历程。

忆八年抗战工作片断

商景才口述　鲁在岭　整　理

出　走

我叫商景才，滕县姜屯乡商村人。一九三七年，我十五周岁入滕文中学就读。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向我大举进犯。当时，滕文中学有些进步教师，常向同学们讲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前线抗敌的战绩，同学们比较向往八路军的战斗生活。纷纷自发地走向街头，走向农村，为前线抗敌将士开展募捐活动。不久，日军打到山东平原县，一些流亡学生来到滕县。他们和我县学生一起，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逼近滕县。三月十八日滕县失守，不久滕县、枣庄一带便沦为敌区。当时，滕县形势错综复杂，匪患严重，“司令”多如牛毛，还大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听同学杨知伦说，滕县乡下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于是便想到那里去投军。我是家中长子，弟、妹均小，再加上如此兵荒马乱之年，母亲坚决不同意。但我矢志不移，只想着不做亡国奴，抗日打鬼子。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我私自出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从商村出发，和同学张贻谋等一起，穿过滕县县城，赶到南塘，找到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南塘当时是义勇队驻地。义勇总队政治部主任孙俊才，是第一个接见我们的负责同志。他对我们说：“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是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队

伍（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公开），我们非常欢迎你们青年学生参加抗日，共赴国难，以后，可把你们的同学都介绍来。”谈话之后我被分配到政治部下设的宣传队当宣传员。

宣传队大部分是男同志，还有个别几位女同志。我们经常在羊庄、西集、木石、善堌一带活动，以唱歌、演戏为宣传手段，发展和组织群众。那时我们演唱的抗日歌曲有《义勇队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等，演出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还有铲除汉奸、消灭敌人的活报剧。

我在宣传队工作期间，经历了数次反顽斗争。那时，盘踞滕东一带的顽固派的反动势力很大，他们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不打鬼子，专搞摩擦，对我军共同采取包围态势，阴谋消灭这支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为了团结友军共同反顽，宣传队曾到四县边联等部队作慰问演出。在战斗紧张时，我们就运弹药，抬担架。遇到顽固派的挑衅，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进行了英勇反击。顽固派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我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在讨伐申宪武的第二次战斗中，义勇总队政委何一萍同志牺牲了。噩耗传来，全军悲痛。我参加了义勇总队为何一萍同志召开的追悼会，会场上摆满了花圈，四支队代表孟英同志致悼词。与会者在英灵前宣誓：我们一定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入　党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孙俊才同志到省委汇报鲁南情况后，省委书记郭洪涛率领四支队一部来到鲁南，准备开辟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随即，抗日干部学校开办，义勇总队介绍我们九人到干校学习。

善堌是省委驻地，干校就设在那里。我们来到善堌后，由省委书记郭洪涛介绍我们到干校。干校座落在一座小山上，有几间

房子，四周是围墙。我们被编成一个班，班长崔兰亭。当时反顽斗争形势仍很紧张，所以我们既是学员，又是战斗员，过的是战斗生活。

我军围攻东江的刘广田，几次没能攻下。这时，顽固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使我们四面受敌，处境十分不利。为此，省委决定撤回鲁中，并命义勇总队东征抱犊崮，开辟根据地，干校随省委向北转移。我们班的任务是管好两匹骡子驮的两门炮。

我们在北上途中，三天遭到地主武装孙鹤龄的三次袭击。第一天的半夜，我们到达八里沟，遭到敌人的伏击。敌人从两面山上向下冲来，我们边打边向北撤退。翌日拂晓，我们撤到一个小山上休息，又一次遭到敌人的袭击。我们打退敌人，继续向北转移。第三天下午我们来到一个村庄，从出发到现在还没顾上吃顿饭，大家又累又饿。可是，刚要吃饭，敌人又赶了上来，顿时枪声一片，我们被迫应战，边打边撤。最后，我们又撤了回来，驻在城东山亭，和义勇总队会合。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了战争的严峻考验。频繁的战斗，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们常常忍饥挨饿，一次通知去领饭，每人只发了几个辣椒。日夜行军打仗，鞋磨烂了，就穿用布条打的鞋，我打的不结实，跑不多远又烂了，只好赤脚跑山路。和义勇总队会合后，他们送给我一双鞋。有些人往往受不住这种艰苦生活而离队了，我们从义勇队一起来的九个人，当时只剩下我一个了。

后来，我们在费县北门薛庄得到了半个月的休整。就是在休整期间，干校负责人徐仲林找我谈话，第一次给我谈起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让我继续接受党的考验。大约八月底，我们进驻沂水县的岸堤。干校在岸堤开学，下设政治队、民运队、军事队、妇女队，我被分到民运队。九月，我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反“扫荡”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在干校结业，调到苏鲁豫皖省委秘书处工作，先后任文书、文书科长、秘书等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又被调到鲁中区党委秘书处任秘书。秘书处只我一人。实际上我是这个处的负责人。处以下设总务科、会计科、文书科、交通科，我参加区党委会议担任记录，那个时期的区党委文件大都是经我起草、整理发出的。我只上过一年中学，写东西就是那时逼出来的。我在鲁中区工作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

这期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日军经常重兵“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什么“铁壁合围”、“铁环合围”、“梳篦战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上旬，日军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敌伪军五万人，“扫荡”当时的山东抗日战略中心——鲁中根据地，企图一举扑灭山东的抗日烈火。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区党委机关、公安局、警卫连共约五六百人，利用晚上突围。我们分成两队行动，由我和一个教导员带领两个排和机关人员走在前面；区党委书记霍士廉，新来的军区司令刘海涛和公安局长朱玉干带领一个排走在后面。不料，在行军途中，由于天黑，我们跟后队失掉联络。第二天，我们到达南墙峪后，立即派侦察员去寻找后队。侦察员虽然找到了他们，但正当我们去会合时，遭到了敌人的机枪封锁，又一次跟后队失去联络。随后，我们转移到高湖，在一片山林里隐蔽。侦察员侦察到周围都是敌人，白天根本不能行动。我处理了文件，埋藏了笨重东西，以防不测。当天晚上，我们终于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沂蒙公路的空隙里跳出了包围圈。这次突围，我们前队没有任何损失，但后队的刘海涛、朱玉干同志牺牲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敌人又对我根据地实行大规模

的“铁环合围”。那时，我身患疟疾，霍士廉同志很关心，行军时就把他的马给我骑。后来，又安排我在蒙阴的一个村庄养病，但不久敌人的“铁环”正扣在我养病的地方。我们立即转移。在莱东地区，我们同县委书记陈克取得了联系，他带着一个排和县委机关。我们会合一处，继续突围。那天晚上，我们穿过了博莱公路，以为跳出了包围圈，便到山下的一个村庄里去休息。不料，村里全是日伪军。敌人发现了我们，顿时枪弹不停地打来。我们转身就往回跑。跑出一里多路，我下意识地一摸斜背在身上的包袱，包袱不见了。这个包袱里全是鲁中区党委的重要文件，若被敌人搞去，后果不堪设想，它比我的生命都重要，是万万丢不得的！我立即收住脚步，沉了沉气，仔细推想可能丢失的地方。于是，我又不声不响地摸了回去。找了半夜，一直摸到离敌人岗哨很近的地方，也没有找到那个包袱。心里真是焦急万分。我登高四顾，只见周围村庄灯火一片，几乎村村驻满了日军。我把全身所有的重要东西都埋藏起来，只留一支手枪，准备天亮之后跟敌人拼一场。我坐了下来，由于连日来奔波突围，不觉朦胧睡去。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这时，由山下上来一个拾粪的农民，我上前一问，才知天一亮敌人就全部开走了。

突然，我眼睛一亮，在离我不远的地上有一个包袱……。

重建济南工委

一九四三年八月间，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组织部长高克亭找我谈话。大体内容是：党中央最近指示，要加强大城市和交通沿线的秘密工作，以便将来里应外合夺取城市。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山东分局很早就十分重视开展济南的秘密工作，一九三九年已派王见新等同志打入济南，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后因组织暴露，被迫撤了出来。现在，区党委决定再派你到济南，

协助张洪涛同志开展工作。在此之前，在济南郊区也曾重建过市工委，又一次遭到破坏，你们应该很好地总结前市工委的经验教训。具体做法，到泰山地委熟悉情况以后再定。

当时，要我离开生活、战斗过五个年头的沂蒙山区，委实感到依依难舍。再说，济南的情况我很生疏，又缺乏地下工作经验，显然面前摆着不少难题。但是，这是组织上的信任，党的工作需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几天后，我同张洪涛等几位同志，从沂水孙祖一带出发，踏上了新的征途。

张洪涛同志，当时只有三十岁左右年纪，细长身材，精明强干。他是离济南不远的齐河县人，抗战前在济南兵工厂当钳工时入党，还在工人中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在济南党组织几次遭受大破坏的情况下，他都没有暴露，保存了下来，并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以后，还能坚持斗争。抗战爆发后，洪涛同志转到延安和太行山区做党的组织工作。这次回到山东，山东分局根据斗争形势和工作需要，派他去负责济南市的地下工作。来到区党委后，我被指定作了他的助手。

我们一行，除了洪涛同志和他的爱人王真、警卫员小张以外，还有六名不久前从济南撤出的学生。每个人的行装都很简单。用一匹马驮了衣被。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被单，一床夹被，一套替换衣服和几本书籍。八月的沂蒙山区，天气十分炎热，高粱抽穗，玉米甩缨，汶河蜿蜒，山花吐艳，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晓行夜宿，有说有笑，并没有感到长途跋涉的疲劳。

当我们到了莱东的常庄一带，就觉察到形势紧张了。离解放区周围十多里远的地方就有敌据点，小股敌人经常出来到根据地进行骚扰活动。在莱东县委的帮助下，我们一夜通过了博莱公路敌人的封锁线，找到了泰山军分区。

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林乎加，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当时正值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他说："已接到区党委电报，非常欢迎你们前来工作。你们先参加会议，了解一下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后再研究开展济南市工作的问题。"会后，他首先要我们找到周民同志，听取前济南市工委遭受破坏的情况。

周民是一位较老的同志，原籍四川人，是前市工委唯一幸存下来的成员。他介绍情况说："市工委书记刘明和几个成员，经常在游击区活动。在一次敌人扫荡根据地的时候，他们插到仲宫以北的敌区去，因暴露了消息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周民同志因那次没有同刘明等同志一起行动，才得幸免。他深有体会地说："现在看来，在济南做地下工作，不依托根据地，不和武装斗争相配合，只是孤立地插入敌区，很容易因暴露而遭受破坏。这个教训应该很好地记取。"这些情况给予我们深刻的教益。

九月初，鲁中区党委电报通知：决定由林乎加、张洪涛、商景才三同志组成济南市工委。张洪涛任工委书记，兼任泰山地委副书记。我任工委宣传部长兼任泰山地委秘书长。林乎加同志参加工委主要是便于在地委指导和支持下开展济南工作。

济南市工委成立后，在莱芜地区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形势、任务、工作方针、工作方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

鉴于前济南市工委遭受破坏的教训，开展济南工作，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加强游击活动，首先争取站稳脚跟；必须迅速在根据地内组织工作组，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做好巩固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必须在边沿地区开展反蚕食斗争，同时派武工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人的骚扰破坏活动，扩大我政治影响。争取把巩固扩大根据地、开展敌区工作和建立济南市区地下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市工委机关选定在离济南较近的章（丘）历（城）边区一带活动，分批选

调一些干部和群众打入济南市区，逐步在工人、学生和市民中开展秘密工作，并建立党的组织。

十月初，我和洪涛同志到了章历边地区。经常活动在藕池、葫芦峪、四角城、爪凹、赵庄、巴哨泉、白炭窑子一带。

这些村庄距离西营敌人据点，远的七八里，十多里，近的三四里。站在爪凹高处，西营的炮楼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地方距济南市区也只有七八十里路。它和市区的经济联系、社会联系较多，把市工委设在这里，对开展市区工作十分有利。而且，这一带山区，山高沟深，树木茂密，泉水纵横，道路崎岖，有的村庄在山顶上（巴哨泉），有的在山腰里（四角城），便于隐蔽，也便于回旋转移。我们出村，敌人同时进村的事是常有的。

市工委活动的一些村庄，开始时村长保长多系两面政权，即：他们与敌伪政权有联系，但又害怕我们，不得不向我们交公粮，替我们办一些事。这些村长、保长又多系地主、富农，当地群众是既怕他们又恨他们。他们对我们当面笑脸相迎，背地里又和敌人勾勾搭搭。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机关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为了使这一带成为可靠的根据地，我们先后在葫芦峪、爪凹、巴哨泉、白炭窑子等村庄领导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对于群众痛恨的个别恶霸地主，如爪凹的李村长，我们发动群众斗了他。在斗争中组织群众，成立民兵、农会，建立人民自己的区、村政权。同时派罗俊、尚子芳等同志率领的武工队深入敌区，打击了小股敌人的破坏活动。

这时候，和我们同来的六名青年学生，也都陆续被派回到济南市区去了。市工委要求他们，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和要好的同学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宣传八路军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宣传根据地建设的成就，有条件的可以动员一些青年到根据地来学习。

向敌占区开拓

为了开展市区的地下工作，我们在巴哨泉设立了一个青年招待所，由王晓东同志负责，专门接待从济南市区来的工人和学生。招待所里准备了供他们阅读的《大众日报》，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还经常派人给他们介绍根据地的情况，我有时候找他们谈心，问他们到根据地后的感想，从中进行一些思想引导。有一位济南正谊中学的女学生陈翠华说："在学校里读书很苦闷，当亡国奴的滋味实在难受！一切都得听日本人的，什么'东亚共荣'、'中日提携'都是骗人的鬼话。要抗日，但找不到出路。这次到根据地来，虽然山区里的生活很苦，精神上却感到舒畅。八路军究竟怎样，过去不甚了解，这次来虽然时间很短，却消除了一些误解，看到了希望，想作一点抗日工作。"她指着同来的一位黄包车工人老王说："王大爷是我的老邻居。他听到八路军抗日打鬼子的事，常讲给我们听，他是很佩服八路军的。他老人家也想为抗日出点力。"老王激动地说："我年纪大了，又没有文化，做不了多少事情，但为抗日跑一跑腿还是可以的。"他们的讲话表达了敌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我说："百闻不如一见，你们来看看，找些老乡谈谈，就会感到我们的人民是有志气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后，又向他们提出希望："你们回去可以找一些亲戚朋友，谈谈这里的情况；有条件也可以请他们到这里来看看，我们一定会热情接待的。你们在这里多看些报纸和毛主席的书，如果带回去看也可以。隔些时候还可以再来。"此后，济南市经常有些工人和青年学生到根据地来，在招待所里住上三、五天再回去。

有一次，从敌区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民到工委机关接关系。他名叫王瑞，家住距西营约二十里路的村庄里，他既会种地

又会木匠活，是早期发展的老党员，儿子王平也是党员。父子俩在与党组织失掉关系的情况下独立工作，并继续在周围几个村子里发展了五、六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团结了一些群众。因为他所在的村庄是在西营、仲宫、柳埠几个敌军据点的中心地带，离济南市区只有三、四十里路，是我们向市区进行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我和洪涛同志听了他的汇报，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批准了他们成立的支部，还共同研究了进一步团结群众，开展党的工作问题。他提出在西营伪军内有工作关系，打算把王平同志派进去开展伪军工作，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

我们与原在济南市内工作的汤秦、李文德两位党员接上了关系。汤秦在仁丰纱厂，李文德在恒泰火柴厂，他们都有些工作关系，就确定他们继续在这两个厂工人中开展工作，个别发展党员。有几个准备发展的党员对象，都由他们带到根据地来，经过谈话考察后批准入党，然后再回市内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在四角城一间茅草屋里，挂起了一面庄严的党旗，为被批准入党的朱深同志举行了入党仪式，洪涛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唱国际歌，宣读誓词，当宣读到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时，朱深同志是很激动的，他说："仪式虽很简单，但教育深刻，使我一生难忘。"

汤秦、李文德同志反映，他们每到根据地来，看到我们的《大众日报》，感到对了解敌我斗争形势、根据地建设、党的方针政策很有帮助，希望能建立地下交通站，在市区设联系点，经常向市区输送报纸，并且约定李文德的联系点是一家杂货商店，汤秦的联系点是一个中学教员的家里。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对于如何把报纸送到市区，谁担任交通员，其它的联系点怎样建立等问题，我和洪涛同志进行了慎重的研究。

我们在机关警卫班战士里选定了党员李进东同志作交通员。他入伍前是一个贫苦农民，为人朴实忠厚，家在西营西约四、五

里路的村庄，常到市区卖山货，对济南的情况比较熟悉，担任这一工作是很适宜的。怎样把报纸带进去呢？李进东同志想了个办法，他找了一头小毛驴，装上两篓山果花红，把我们的报纸夹在敌人报纸里，作为柳篓的垫底。第一次去济南送报纸，我们都很耽心，想不到李进东同志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回来说："在去济南的路上，伪军的关卡并没有怎么检查，到了普利门，日军哨兵见了就问'什么干活的？'我就把篓子盖掀开指一指说'卖山果花红的'，还抓了一些给哨兵尝。哨兵摆了摆手'开路开路的'，这样过了普利门"。他又介绍分送报纸的情况：晚上他住在骡马店里，取出报纸来用信封装好，第二天以卖山果花红作掩护，一份一份地送到几个联系点。剩下的几份，分别塞到一些住户的门里边了。

后来了解，市区的一些工作关系看到我们铅印的八开《大众日报》，是很高兴的。报纸本身不仅说明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强大存在，说明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而且具体介绍了我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形势、根据地的建设、军民关系、统战政策以及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等。一份报纸，往往你传我，我传他，竞相秘密传送，贪婪地阅读。有的人在一个晚上一口气把几期报纸全部看完，有的人甚至看过几遍还不忍释手。传送报纸确实能给敌区人民群众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报纸能起这样大的作用，是我们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所以我们把向市区输送报纸看作一项重要的经常工作，每隔十天半月输送一次。

当时在工委机关工作的张纯、丁干、陈图等同志，也经常到市区去与一些工作关系联系，开拓敌区的工作。

智取西营打开新局面

度过一九四三年的严冬，迎来了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泰山地区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武装部队拔掉了一些孤立的敌

伪据点，根据地逐步扩大，过去被分割的一些根据地又逐步连成一片。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林乎加同志带了两个连的主力部队来到了章历边地区，他主持召开了一次章历边各有关负责人会议，分析了章历地区的形势，认为已经有条件把比较孤立的西营敌据点拔掉。西营虽然有二、三百伪军，但士气低落；日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数量较少，只有几十个人。如果我们内外配合，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仲宫、柳埠的敌人也来不及增援。战斗部署是：由地方武装配合民兵袭扰仲宫、柳埠，牵制敌人；主力部队主攻西营，西营内的伪军关系要在混乱中配合我主力部队里应外合歼灭敌人。在林乎加同志亲自指挥下，一天晚上，乘敌不备，突然向西营敌人发起攻击，很快就冲了进去，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激战，解放了西营。

拔掉西营据点，使章历边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解放区边沿扩展到仲宫附近，距济南市区只有三四十里路，我小股部队可以经常在市郊活动，我们进入济南市区工作就更为便利了。为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在组织上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决定将市工委机关与地委机关分开，专搞济南工作。建立历城县委，调派原军分区后勤政委傅敦武任历城县委书记。地委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若干工作队，由地委民运部长吕子仪率领，在历城新区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和各级政权。为了把历城新区的工作和济南市区的工作结合起来，委任丁干同志为历城八区区长，张纯同志为十区区长，运用政权工作在新区群众中广泛进行有关济南社会关系的调查登记工作。

为了把公开工作与地下秘密工作分开，以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把党的工作和一般的群众工作分开，以一般的群众工作掩护党的工作，区党委决定成立济南市人民政府办事处，派武中奇同志参加工委，任办事处主任。武中奇同志是抗战前济南市的一位老党员，他的家就是战前省市委的一个联络点，对秘密工作有

一些经验。抗战爆发后他拉过游击队，搞武装斗争，曾担任过八路军的团长。既健谈，又善交际。喜欢书法篆刻，他写的字苍劲有力，称得起书法家。选武中奇同志作为办事处主任是很合适的。

由济南市到根据地来要求参加抗战工作的青年学生日益增多，为了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工委举办了青年训练班。先后集中了百多名青年学生进行学习，派吕戈龙、林烈两位同志负责这一工作。学习内容主要是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论持久战》等，还有形势与任务、根据地建设、青年工作、统战工作等等。这个青训班的学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没有课堂，没有固定的教师，也没有成套的教材。主要是发扬抗大精神，在露天上大课，分小组讨论，生活很艰苦，但学员学习情绪还是很高涨的。洪涛同志和我都到青训班讲课。青训班结业后，有的就留在根据地分配工作，多数是回市区工作。

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一九四四年八月，鲁中区党委把我调回鲁中，另调泰山地委组织部长蒋方宇同志到济南市工委工作。鲁中区党委建立了城市工作部，由高明宇同志任部长，我到城工部任党务组长。

一九四五年五月，鲁中区党委在沂蒙地区召开了铁路交通沿线和大中城市的工作会议，济南市工委书记张洪涛，新汶矿区工委书记刘木易，淄博矿区工委书记许光明，张店明水工委书记景宜亭，坊子潍县工委书记许杰参加了会议。山东分局城工部长杨一辰及城工部的赵鼎夫、张骏同志等也赶来参加。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在新形势下怎样加强大中城市及交通沿线的工作。我们度过了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黎明前的黑暗，出现了许多根据地连成一片，敌人龟缩在一些点线的新局面，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展现在眼前。党向我们提出了加强交通沿线和大中城市工作，

创造条件，里应外合夺取大城市的新任务。会议认为在新形势下，地下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仍然必须坚持，同时要充分利用我解放区逼近交通沿线和大中城市的有利形势，加强对敌斗争，展开政治攻势，发展敌区统战工作。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形势开展合法斗争，以合法斗争掩护秘密工作。会议还进行了整风学习，交流了地下秘密工作的经验。杨一辰同志又把今后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区党委抽了一批适宜于做敌区城市工作的党员负责干部打入城市工作，城工部办了一个打入干部训练班。做打入工作的干部是要单线联系的，学员相互不能见面，只好把学员分散在城工部周围的村庄住宿。有些课程是自学的，有的课程要集中上课又不能见面，怎么办呢？我们在用作教室的房子里，从梁上拉下若干条绳子，用被单子做幕布，把教室隔成十多个方格，每个方格内摆一个矮凳，讲课一般安排在晚上，讲课前学员按规定时间逐个进入教室方格内，讲课后再逐个从方格内离开教室。就这样集训了一批干部，大部分是派到济南去的。

城工部还派李文达、邹健两同志负责举办了青年训练班，集中训练了三百多个由大中城市来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济南来的，也有一些是铁路沿线和其他城市来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夜晚，传来了出人意料的大喜讯——日本投降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们每个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纵情地欢呼、歌唱，直闹到深夜。日本投降后，山东分局决定成立济南市委，派张北华同志任市委书记，杨一辰等同志也赶到济南市委，加强济南工作。此后，我被调回区党委秘书处工作，随部队进驻博山，开始了新的战斗任务。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

（商景才，滕县姜屯乡商村人。早年参加革命，现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滕县城守卫战记实

熊顺义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五日，由于两下店、界河前线战斗紧张，原来守备滕县城之川军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三七二旅四个营，陆续抽调驰援三七〇旅，开赴邹滕边境石墙以南之池头集、大坞、小坞等地作战，所遗守城任务，二十二集团总部即令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负责，调整该师兵力部署，接替城防。当时该师各部队的位置大致如下：

一、第三六四旅旅长王志远率旅部及一个警卫连在滕县城。三个步兵营，一个迫击炮连编成之七二七团，由团长张宣武率领在滕县以北北沙河守备。其第一营也在北沙河以西之洪疃守备。统称为第三阵地带守备队。

二、第三六五旅旅长童澄率旅部一个警卫连及七二九团团长王文振所属之三个营，设防在平邑与城前地区，掩护临沂庞炳勋军团之侧背，防止邹县以北之敌向临沂进袭。

这时城内可供王铭章使用的部队，仅三个警卫连，一个步兵连，万一发生问题毫无办法应付，乃令三六五旅迅速开回滕县城。以后因敌情变化，未能全部回来。午后三时又令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除留一个营于北沙河，一个营在第三阵地带洪疃归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指挥，作第四十五军之掩护部队外，团部率一营跑步回滕县城接受新任务。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受命后，除留第一、三营于阵地外，黄昏前到达县城北门时，师长王铭章正在城门口迎候。王铭章当时告诉张宣武如下各种情况：

一、日军之主力部队与我四十五军尚在九山、龙山一带激烈战斗。敌一纵队步、骑、炮兵一万余人联合，今日下午已窜到龙山以东之东郭、田庄地区，有继续窜犯滕县之势。

二、我四十五军前线部队已经混乱，恐难持久。

三、滕县城明晨大有发生战斗之可能，现仅有一二二、一二四师师部及三六四旅旅部三个警卫连与三七三旅的一个步兵连，总共仅有四个连的正规部队。另外有周同县长所属两个保安中队。现在滕县城正唱着空城计呢！

四、平邑三二五旅已令迅速回援滕县城，其七二九团之第一营三个步兵连，预计今晚八时可到。现在临城之四十一军军部警卫营预计今晚十时前可到滕县。

五、任命张宣武为城防司令，指挥以上各部队，连夜部署城防，准备明晨战斗。

当夜，七二九团第一营营长严翊，军部警卫营营长刘止戎各率一个营准时到达。当时张宣武对城防作了如下部署：

一、七二五团之第一营守备东关土寨，并于寨外部分村庄及龙泉塔设前线阵地和警戒阵地。

二、七二七团之第三营守备滕县城东、北两面，并于北关外配备警戒部队。

三、军部警卫营守备滕县城之西、南两面，并于西、南关外配备警戒部队。

四、饰令各守备部队彻夜构筑工事，领取粮食弹药（每兵预备一箱子手榴弹。再发一部分饼干、馒头），以备战斗中使用。

五、迫击炮连在城东北角占领阵地。对东、北关外作好射击准备。

六、七二七团团部设在东门里路北大山货铺内。

一二二师师部设在西关电灯公司，一二四师在城内张锦湖公馆。

三六四旅旅部在西门内路南盐店。各警卫部队保卫各司令部并作预备队使用。

两个保安中队除保卫县政府，即在县府附近构筑阵地外，并派遣适当兵力协助警察维持城内外治安秩序，同时帮助市民老弱妇孺向城外疏散，避免伤亡。除动员群众留守家园者外，全城军民一面整夜紧张备战，一面准备疏散活动，来来往往，秩序井然。

十六日晨，日军步、骑、炮、战车诸兵种联合二、三万人，在其空军配合之下，一部继续攻击第四十五军之主阵地，主力由两下店、界河以东空隙地区，迅速迂回南下，上午八时，其原来之先头部队，已窜到滕县城东八里之东沙河与我东关外围前沿部队发生战斗。随之，敌炮兵也开始向我龙泉塔附近之警戒阵地炮击。城内、城外都不断落下炮弹，一会儿机关枪又乒乒乓乓地响起来。我前方阵地、警戒阵地的部队也立即起而应战。激战二小时后，我前方部队和警戒部队先后撤回东关主阵地。敌军很快就利用龙泉塔制高点为其炮兵观察所，俯瞰全城及其附近几十里地区，给予我军极大威胁。但我军因兵力不足，不能守备过广地区，只得忍痛抛弃这个制高点。随后，日军步兵部队亦逐步迫近我东关圩子附近与我东关守备部队开始战斗。另外还有一小股敌人继续向我南沙河方面窜扰。这更加激怒了滕县爱国军民，表示一致团结起来，誓与敌人战斗到底。

在这情况万分紧急之际，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又严令王铭章师长、税悌青副师长率第四十一军死守滕县待援，以保卫徐州战区长官部之安全，争取更多时间进行新的战略部署。这时正遇指挥第四十五军作战之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由前方率两个警卫连回到滕县城。于是王、税、陈三师长，根据当时紧急情况，立即举行一次作战会议，针对当时敌情，我军与友邻部队等军力情况，商得两个作战方案。一案为：以现有兵力死守滕县城，等待战区总预备队汤恩伯军团部队增援，内外夹击，打垮敌人。另一案为：放弃

滕县城转移到城外有利地区，侧击敌人，使其不敢长驱南犯。第一案虽有城池和工事以及丰富物资可以利用，守城之战或可较能持久，但援军如不能及时赶到或者干脆不来，则又会出现以劣势装备的孤军奋战与优势敌人作持久阵地战的极为不利的局面，很有遭致歼灭的危险。第二案比较主动、灵活，可以在运动战中捕捉有利战机，侧击敌人，消灭其有生力量。但过早放弃城池和战略要点，不仅政治上影响不好，万一优势敌人以一部牵制我军，主力继续南侵，则会过早威胁徐州战区首脑，直接影响整个战局。三人互相争执不下，便一同到电话前向临城总司令孙震汇报请示。于是他们与孙震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首先王铭章向孙震电话报告，大意说：敌人先头部队万余人，现已到达滕县东关外围，正与我东关守备部队激战中，我守城部队仅一团余人，恐难持久，即使将四十一军在外面的部队全部调回来，也怕缓不济急，不如放弃滕县城，转移到城外有利地带，侧击敌人，迫使敌人不敢长驱南犯，我军亦不致遭受重大牺牲。孙说：汤军团王仲廉领导的十三军之八十九师，立即全部开赴滕县增援，其先头团，已经出发，务须死守待援。同时速令现在第二阵地带左翼大坞、小坞附近之吕、曾两旅立即回援滕县城，增强守备力量，这样，守城就更有把握。……王铭章听到孙震守城意见坚决，不敢多谈，便调过话头问："援军何时能到？"孙说："几点几分能到滕县城还不知道，总之，很快即可赶到。"接着王又说："死守滕县城可以，但我军大部都在城外，司令部是否就在城外指挥？"孙说："你必须马上把司令部搬进城去，以便指挥守城战斗。"王看孙对这个问题，越逼越硬了，不好再行推托，便又一次从催援军下手，问道："援军究竟何时可以到达？"孙答："四个钟头"。王最后又说："敌众我寡恐难完成死守待援任务，陈、税两师长都不同意守城待歼，而主张弃城上山，机动灵活侧击敌人。"孙说："军人以保国卫民为天职，现在大敌当前不打

不行，必须坚决死守滕县城，以待援军，不许弃城不战，让敌人铁蹄长驱直入，威胁徐州地区的安全。你们如要离开，责任即在你们”！王看孙意见十分坚决，自己不好再往下说，便叫税悌青师长向孙申诉，税说：“敌众我寡，守城不利，如能转为野战，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更有利于大局。”孙仍然以极坚定的口吻答道：“第四十一军一兵一官都不准离开滕县城，必须死守该城与敌人打到底！”税吓得不敢再说。然后，三师长又商议一番之后，再推陈离师长向孙震说：“现在敌人兵临城下，我们当然要打，不过如何打法最为有利，我们不能不加考虑，经我们三人商量，当前作战方案有二，二者比较，仍以弃城野战为最有利。”孙说：“我已命令第四十一军死守滕县城待援，他们如擅离职守，应由他们负责。”第四十七军可以撤到南沙河一线，继续与敌战斗。因此静珊（陈离号）可以带上警卫连离开滕县城，前往南沙河收容整顿部队。然后，陈离率两个警卫连离开滕县城向南沙河前去。后来在中途的颜楼附近，突然遭受敌人袭击，双方激战一小时许，陈离师长腿部受伤，仍然继续指挥战斗，坚决不下火线。这更加激励官兵，奋勇杀敌，反复肉搏，终于打退了敌人，然后逐步掩护撤退，脱离险境，径向临城总司令部所在地转移。此后陈离转到后方治疗休养。当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电慰问陈离师长。其电文如次：“静珊兄勋鉴：鲁南喋血，卒挽危局，捷报传来，惊闻裹伤督战几陷重围，忝在同胞，弥深怀念……朱德”。

经过王、税、陈三师长与孙震在电话激烈辩论之后，王、税决定死守滕县城，以待汤恩伯的援军。然后决定将第一二二师师部迁入城内与一二四师师部合住张锦湖公馆。并在地下室内组成联合战斗司令部，分工负责，指挥督促各地区守备部队，加强各项作战准备，并布告四城门，大意如次：“现在日军兵临城下，我军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独立，必须坚决抗战到底，誓与滕县

城共存亡！”

十六日十时许，日军向我滕县城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重点指向东关方向。首先以四、五十门大炮，集中轰击东关城墙东南角，妄图在该处打开一条缺口，从那里冲入我军阵地内部。据当时守备该处的部队记录，敌人炮弹每分钟落到该处的竟达四十七发到五十发之多，一时该东南隅尘土飞扬，硝烟蔽天，居民的房屋被敌人炸毁，燃烧，形成了一片火海。一会儿果然将我东圩子墙东南角打开二、三十公尺一条缺口。日军步兵乘机以二、三十挺机关枪，对准缺口附近集中猛射，并向邻近之侧防地进行制压，掩护其突击部队一拨一拨地向我军阵地缺口部分接近，一霎时日军先头两拨五、六十人即纷纷跳入我阵地缺口前方外壕内，正欲一拥而上，冲入我军阵地时，我军号令一响，原来除监视哨所的哨兵之外，全部进入掩蔽的主力部队，立即跃出掩蔽部，进入阵地，展开激烈战斗。以一部在缺口两边用猛烈炮火构成浓密的交叉火网，切断缺口前面敌人的后续部队，孤立其已经跳入我外壕的日军。一部猛扑缺口附近，向壕内外的敌人，投掷大量的手榴弹。顿时打得日军在壕底乱窜，无法逃脱其死亡的命运。只见血肉横飞，尸填壕沟，进壕日军无一生还，就这样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敌人指挥官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再次将已经转移了射击目标的几十门大炮，转回炮口重新指向方才他们失败了的突破口。集中火力攻击一小时左右，其步兵又按照上次战法，一拔跟着一拔地跳入我阵地，当时进入前方外壕内的有百余人，正准备爬上外壕冲入缺口之际，我守备部队在城防预备队支援下，再次运用上述逆袭战法，从掩蔽部内跃出，一拥而上，打退了敌人第二次进攻。随之又迅速填补缺口，严加守备。敌人察知我军东南角阵地守兵力量强大，不易得手，然后改变计划，午后另选新突破点，然后将几十门大炮和分三架、六架、九架轮番飞来的敌机，陆地空中密切配合，集中轰击我东北关圩子北门附

近，十四时许，又在北门附近摧垮围墙几十米，敌兵又袭用其惯技，两次冲到我军阵地缺口之前，我军又多次运用巧妙反击战法，终于打退了敌人第三、第四次的进攻。并利用沙袋等物，堵住缺口，加强守备。

十六时许，日军又另选新突破口于东关圩子的东门附近，同样先集中几个炮兵群的炮火，指向东门附近轰击，敌机数十架仍然配合在空中轰炸、扫射，妄图压倒我军，一举从东门附近突入迅速瓦解我军阵地。在打开突破口之前，敌人接连又组织了第五次、第六次猛烈突击，我东关守军，早知敌人的惯用战法，又更加谙熟地运用了前几次打退敌人进攻的巧妙战术，同时使用团预备队增援力量，合力反击，又接连两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时近黄昏，敌人又利用我军视界缩小的瞬间，以二、三百人，分成若干突击拔，反复猛烈冲击，冲进了我东关的东门。顿时情况紧急万分，王铭章师长严格责成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马上增加兵力，坚决把敌人赶出去！"张宣武团长接到师长命令后，立即抽调城墙上司吉甫营之张进如连及三七二旅的武景文连，加上师部警卫连由营长司吉甫指挥，迅速投入战斗。这些英雄连队的官兵们，翻过了沿途堆积如山的倒塌房屋，又不断冲过熊熊火海，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赶到了东门附近，立即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枪声与喊杀声响成一片。两军反复冲杀，达一小时之久。最后日军二、三百人全部被赶出东门。然后与敌人彻夜对峙。敌人害怕我军夜间袭击，通霄不断发射照明弹、信号弹，战场夜空，五光十色；两军之间，剑拔弩张。

这一天的战斗，据当时记录，日军炮兵发射三万余发炮弹，其中有一部分不发弹，城里城外随处都可拾得。敌机投弹三百余枚，主要建筑物多被炸毁，城里、城外民房炸塌、烧毁很多，大街处处断瓦颓垣。七二七团城内团部到东关守备队的营部电话线打断过二十五次之多。敌军伤亡约在四百人以上。我军自营长严

翊以下伤亡三百多人，其中在东门附近最后把敌人赶出东门的张进如连即伤亡八十余人。艰辛地结束了一天的战斗。

这一天上午十时，在敌人开始向我滕县城发起攻击之际，王铭章师长和税悌青副师长，根据孙震电话指示，急电一二四师的三七〇、三七二旅，立即放弃大坞、小坞一线，迅速支援滕县城外，并急电临城总司令孙震请援，孙震当时在隆隆炮声中接到王铭章、税悌青联名急电，同时鉴于滕县、临城之间的通信联络可能随时中断，敌骑兵与坦克又不断出没于滕县城以西地区，逐渐窜到滕县东南地区等等情况，内心十分惶恐，便亲自与汤恩伯军团的王仲廉军长商量，要他立即派遣八十九师，迅速驰援滕县，王答应马上研究。同时又急电战区长官部，请迅速增派援兵，以解滕县之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立即复电孙震："已令战区总预备队第二十军长汤恩伯速率全军团驰援，以解滕县之危。"当天中午，敌人骑兵三百余人，战车六辆，窜到南沙河，切断了滕县后方交通。这时第二十军团汤恩伯所属王仲廉之十三军全部到达临城。孙震满心欢喜。认为援军已到一个军，战局很有可能迅速改观，当即要求王仲廉迅速派一团兵先驱逐南沙河附近之敌，恢复滕县临城间交通联络，以利尔后作战。王答应并立即派遣一团前往南沙河驱逐敌人。殊料该团刚到南沙河附近时，敌骑兵和战车立即突然前来袭击，该团纷纷撤退。然后，总司令孙震又要求王仲廉全军北上，迎击敌人，进而攻占滕县东关外之独角山，粉碎敌人炮兵观测所和炮兵阵地后，再行进击敌人主力，以解滕县之危。但王仲廉军长则佯言"须待军团部到来，几个军都集中完毕后，再策定整个进攻计划，不能逐次分割使用，陷全军于不利。……"孙震虽屡以滕县胜败，关系整个战区及今后的作战。现在城孤兵少，恐难持久。四十一军全部牺牲也无济于事了。如果十三军马上投入战斗，大有转危为安的希望。该军长仍然按兵不动，坐视友军危难而置于不顾。至午后三时，汤恩伯军团长到

古临城，亲自听到滕县方面炮声隆隆，了解到后方交通断绝，友军陷入重围的紧急情况之后，却依然按兵不动。孙震与之再三商量，要求该军团全军驰援滕县，内外夹击，保卫滕县，守住徐州北方门户，以粉碎日军打通津浦线的阴谋。然而，汤恩伯再三推托，不愿接受孙震建议，并提出他的所谓“避实求虚”的新战法，指出：“第三军团沿临枣支线以北山区，进击滕县、南沙河、东沙河以东地带，打击敌人侧背，自能减轻日军对滕县城之压力，最终夺取战场之主动。”孙震从开战以来，天天盼望援军，并对滕县守军将士再三说明肯定要来援军的承诺，如今援军来到后却来而不援，自感无法向下交代，十分难过。最后眼巴巴地看着滕县无法救援，坐以待失，看着汤恩伯带着一个完整的、装备比二十二集团军优越得多的军团向峄县方面的山区开去。汤恩伯的这一行动，直接把临城以北广大作战地区的正面闪开，从而把鲁南大片国土，轻掷敌手。当时，大兵压境，眼看敌人即将长驱直入，孙震寄托在战区总预备队的希望断绝了；寄托在战区长官部正确作战指导的希望也幻灭了。汤恩伯骄横跋扈，不听指挥，只图保存个人实力，撇开上级授予的增援任务，闪开正面战场，躲到一边休息，完全置友军的生死于不顾，这样一来徐州的北方大门敞开了！这时孙震手里无兵，自己指挥的第四十七军远在滕县以北尚未撤下来，四十一军驻守滕县城又不能移动，日军又已窜到南沙河，乘击溃王仲廉军八十九师一团之势，正继续南下，迫近官桥附近。在此万分紧急情况下，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迫不得已，请求长官部批准，只好转移到韩庄以南之利国驿，收容部队，继续抗敌。从此，滕县守军则完全陷于孤军无援、独自奋战的危急状态之中了。

所幸，当日正午，曾转战于邹县边境石墙、深井、池头集等地之第一二四师两个旅，尚有残缺不全的七、八个营，在大坞、小坞之线。当时接到税悌青副师长关于：“日军五师团正围攻滕

县，王、我两师零星部队仅两三个营与敌激战半日，现已残破，孤城情况万分危急，盼兄部星夜赶回滕县，共同抗敌”的紧急电报之后，吕康、曾苏元两旅长，立即率所部，按三七二、三七〇旅次序以急行军的速度，驰援滕县城。当日下午前卫部队七四三团第二、三营营长熊顺义、黄伯亮亲自带着前卫部队，冒着空中飞机的不断轰炸、扫射，击退了李店、鲁寨等处敌人骑兵、战车的阻击，排除了路上的重重障碍，终于午夜二十四点赶到了滕县西关火车站。勇猛迅速地把日军驱逐于火车站以北铁路桥头。然后以十二把军号向城内吹起我两旅已经胜利占领火车站，赶回滕县增援的号音，响亮而雄壮的号角声，激荡在孤城上空，打破了寂静的夜晚，顿时，激动得全城守军热烈鼓掌欢呼。随即打开西门欢迎吕、曾两旅长入城，与王、税两师长共同研究守城的战略、战术问题。曾旅之熊、黄两营合并为一个加强营，守备火车站。胡少瑗营守备西关与北关之间并与西北城墙守军联系。虞高暄营为预备队，控制火车站以南，并保卫南边铁桥与铁路以西村庄，对西、对南派出警戒部队，掩护吕旅各部队到西关休息待命。滕县守城兵力骤增，士气为之大振。

十六日晚上，滕县将领会议，进一步分析了敌情、地形，研究了我军情况，战区总预备队增援情况（汤军团不执行增援命令的情况，孙震未敢告知滕县守军）等等。决定了固守滕县等待援军到来，共同破敌的方针，以及战略上战术上的重大问题，然后，调整部署如次：

一、一二四师三七〇旅七四〇团团长王麟指挥该团之雷迅、康平两营，为东关地区守备队。

二、一二二师三六四旅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指挥该团由北沙河撤回之两营及司营残余部队为东城、北城地区守备队。

三、四十一军警卫营刘止戎部为西城地区守备队。

四、一二四师三七〇旅七三九团蔡钰营为南城区守备队

五、一二四师三七二旅三个营另一连为西关、火车站地区守备队。

六、一二二师三六五旅七二九团之严翊营、三七二旅之武景文连等残部以及各师旅部之警卫连为预备队，安排在战斗司令部附近。

七、县长周同指挥两个保安中队与警察中队，维持城区、城关治安秩序，并作巷战工事，准备必要时参加战斗。

这时守城部队，加上保安团队共约四千人左右，与日军兵力三、四万对比，确是敌众我寡。

十六日一天，我军前线几个阵地在广大纵深地中，撤退不易，又经一日激烈战斗之后，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敌人后续部队窜到从邹自滕的公路上，日夜运输繁忙。我守备火车站之熊、黄两营长遥望北沙河至滕县城的公路之上，各种车辆，灯光闪闪，宛如长蛇逶迤。随即派遣黄生元连长，率兵一连潜入北关外美国教堂以北，袭击敌人车队，一阵猛烈射击和肉搏，打死打伤敌人数十人，打毁敌人汽车十余辆。据俘虏日兵安田次等供称，以及缴获文件判明，窜犯滕县敌军部队为五师团后续部队与第十师团之十二旅团和重炮兵联队、兵站辎重车辆部队等一、二万人。经我这次拦腰袭击之后，被迫暂时停止运输。这次战斗，因此关有美国教堂，日军恐与我军作战伤及美国人，引起其它问题，故遭到我军袭击时也只派遣一部装甲车辆出而应战。我军任务完成后，马上撤回火车站附近。得以上情况报告，旅、师部判断敌人明日攻势规模可能更大，激烈程度更猛。师部于是转告各地区守备队长激励士气，加强战备，准备给予敢于来犯之敌以更大打击！广大官兵也更加义愤，誓与日军拼死战斗。

十七日拂晓，敌人的新攻势果然开始了。他们故伎重演，首

先集中山野炮、攻城重炮、平射炮等百十门火炮，同时分别向我东关、南关守备区猛烈射击，他们对城内主要交通线以及火车站、铁桥、电灯公司等地方，也以部分火力施行战略上之破坏射击。连续炮轰两小时，妄图打乱我军防御体系。然后，战车掩护其步兵向我军东关守备地区接近。是日，敌人飞机同时增多，仍然轮番轰炸城里。炮声、飞机声、炸弹的爆裂声，震天动地，硝烟弥漫，咫尺不见人影，不闻人声。炸弹与炮弹的破片在人们头上呼啸乱飞。城内城外，四处起火，靠近我阵地附近之民房，亦被敌人纵火焚烧。战场境况比昨日更为惨重壮烈。战斗紧张关头，敌我双方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声音比节日爆竹声还密得多。我东关守备队勇敢沉着，奋勇应战，屡次打退敌人。特别是一二二师三六四旅七二七团吴忠敏营官兵，几次挥白刃，越过火海，把敌人打退，形成紧张的拉锯战。团长张宣武奋勇当先，指挥作战。

日军仗恃其战车、炮火、重轻机关枪与飞机之优势，不管我军如何英勇战斗，顽强抵抗，其步兵依旧反复冲锋，并逐步侵入我东关守备区。这时我军一二四师三七〇旅七四〇团团长王鳞，指挥雷迅、康平等营，分别向东关左侧地区、中间地区迎袭，又将敌撵出寨围之外。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再次发动攻势，反复向我冲击。我军也顽强抗击，双方伤亡均大。最后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激战至午，东关各地区城墙部分残破，敌我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我军依然逐屋战斗，寸土必争。由于我军伤亡过大，不得已逐步向东城河附近撤退。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始逐步侵入东关，迫近东门附近，全面战斗，愈演愈烈。

九时许，日军炮火除一部延伸射程射击我城内、西关各战略要点而外，其主力仍集中轰击我滕县城墙东南角。一时平射炮、加重炮、攻城炮、百炮齐轰，一齐冲向东南城角。城墙土崩瓦裂，弹石横飞。二三丈高的砖石城墙，不到一二小时，即冲开了

一个大口。敌人接着又集中数十挺轻重机关枪向突破口猛射，掩护其步兵突击队登城。当日军百余人登上城墙立足未稳之际，我一二二师三六四旅七二七团之一连，英勇反击。先利用阵地缺口附近突出部之侧防机能，集中火力构成浓密的交叉火网，切断敌人后续部队。然后由连长张荃馨、副连长何吉苍带领逆袭部队杀上城去。挥大刀、举白刃，一齐砍向敌人的头颅。一霎时尸横缺口，血染城壕，立时将未死的少数敌人也赶下城去。我逆袭部队之连长、副连长、排长、班长及战士百余人大部壮烈牺牲，最后只剩十三名战士编入其他连队，继续战斗，为光荣牺牲的亲密战友报仇！

日军对我东南城角第一次攻击挫败后，又连续发起多次攻击。每次都一样集中几十门、上百门的火炮在这个突击点上进行轰击。接着以大量的机关枪掩护其突击队前进冲锋，蜂拥登城，如此反复争夺，竟达九次之多。我一二二师三六四旅七二七团之王成钰、吴忠敏两个营，亦英勇反击九次，打退登城之敌。击毁敌战车二辆，打死打伤敌兵三百余人。我七二七团守东南城角之部队也仅余吴德胜、何其昌两个连，胜利地守住了东南城角，使该处城墙巍然屹立于战火之中。团长张宣武在此战役中腿负重伤。其他东关各地区战斗也相当激烈。处处形成拉锯状态。至午后三点，我一二四师三七〇旅七四〇团团长王麟在城东关附近指挥作战，在敌弹如雨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奔走战场，不幸头部中弹，光荣殉国。官兵义愤填膺，与敌人誓不两立。副团长何煜荣起而代理团长，指挥该团官兵，继续与敌作殊死搏斗。团政训员胡德珍在激烈战斗中，不久又壮烈牺牲。

当日军九次冲入我东南城角，又九次被打退之后，转而集中百门大炮与几十架飞机，从地上和空中轰击我军南门附近阵地。经半小时的猛烈轰炸，南门附近又打开了一个大口。敌人又用其一贯伎俩，以几十挺机关枪掩护其突击队蜂拥而上。我一二四师

三七〇旅七三九团蔡钲营，立即起而应战，又反复与敌冲杀，一连两次打退敌人进攻。当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三七〇旅旅长吕康前往南门指挥督战，头部太阳穴处被弹穿重伤，敌人第三次冲上前来。在其飞机、大炮、机关枪的掩护下登城，顽固不退。掩护其后续部队迅速爬上城头，逐步把我守卫军挤下城来，南城守备部队不得已始退守南城区，继续与敌战斗。然后，日军沿着城墙向两翼扩张，逐步向城墙东南、西南两角发展。南门城下之敌，又沿着城根往西窜犯，在南城门上平射炮和重机关枪火力掩护下到西南城角爬城而上，该处军部警卫营刘止戎部守兵，因无掩蔽，被迫向西城门撤退。此时南门的敌炮及刚赶到火车站北头之敌钢甲车队，一齐集中炮击西门，燃起大火。刘止戎部逐步退到西门以北地区抵抗。日军乘势节节近逼，侵占了我西门城楼，战斗形势越来越不利。刘止戎部坚持节节抵抗，城墙上又演成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此时王铭章师长、税悌青副师长眼看城内战况逐渐紧张，即分头出发，指挥战斗。当税悌青副师长到达西门附近地区指挥作战时，王铭章亦指挥警卫连及保安团一部在城内核心阵地奋勇抵抗。日军急于攻占滕县城，将大量的炮火指向我城内核心阵地，猛烈射击起来。大批大批的步兵部队也投入巷战，逐屋争夺。战况愈演愈烈，伤亡越来越多。后来有些保安团队与人民群众都拿起枪杆，一齐上阵杀敌，寸土不让。这样如火如荼地战斗至夕阳西下，城内核心阵地及城东、城北守备地区、北门、东门、东北城角、西北城角，尚在我军掌握之中。

黄昏时候，敌发起规模更大的新攻势。除派有力部队沿津浦铁路南北两端猛攻西关及火车站外，大量步兵又投入城区各地战斗。登上南城墙、西城墙之敌，以数百挺机关枪向我城墙守兵猛射。我各点守兵依然坚守阵地，毫不动摇。日军各种大炮也象暴风急雨，杀向我军阵地。房屋倒塌，烈火熊熊。我英勇军民，奋

勇厮杀，与敌决斗。情况越来越紧，阵地越来越不成体系，犬牙交错，形势混乱，指挥联络逐渐紊乱，我军逐步陷于不利地步。战斗司令部的参谋以下各级干部，都纷纷出来督战，希望战斗逐步朝向恢复有利态势的方向转化。不幸一二二师参谋长赵象贤、副官长罗辛甲等先后在战场壮烈牺牲，情况越来越紧张。当天下午三时，王铭章师长遂亲拟一个紧急电报，向孙震表达自己最后的决心。其原文如次："至今独角山仍无汤军团枪声，血战二日，孤城危矣！职本成仁之训，开封嘉勉之词，誓以拼死，以报知遇，以报国家"。并亲自交与无线电台长廖子扬发出。然后亲率卫士数人，离开战斗司令部，由城内核心阵地，转到西北城角出城，拟到西关三七二旅方面指挥作战。殊料刚下城墙，即被西门城楼敌机关枪侧射，弹穿腹部。卫士们想将他抬到原来师部住处电灯公司裹伤。刚到拐弯处，又受敌机关枪集中侧射，王铭章师长不幸壮烈殉国。随行人员除王德玉一人幸免于难外（另据四川文史资料称：只李少坤一人幸免于难），全部牺牲。王德玉请求附近人民帮助，将王铭章师长的遗体掩埋于城壕附近，回到徐州向利国驿总部报告。

第一二四师副师长税悌青，在西城附近指挥作战时，师参谋长邹慕陶、副官长傅哲民及三七〇旅参谋长罗毅威等均在激烈战斗中往来指挥西城区守备部队作战，英勇牺牲。最后仅余税悌青副师长、税斌参谋处长，何煜荣代理团长等数人，突围由西门西去。通过火车站南端铁桥洞子时，正值我们同曾苏元旅长在该处分析战况，研究如何应付突然变化的局势问题。敌人炮火不断落到该处附近。税悌青未多停留，只简单告诉曾旅长："你们掩护一下好了。"然后径向西岗退去。后来听说他们通过西岗不远，即向西南行走，不一会又遇敌人包围，次晨始退至夏镇，敌人骑兵又来袭击。不得已，数人急渡微山湖转到徐州。

在税悌青走后，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当时情况，认为敌人攻

势凶猛，坚守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我们必须坚持到黄昏以后，看情况如何再定行止。不久天色渐晚，暮色苍茫。西门城楼附近仍然打得很紧。估计为我守城部队从该方面突围的关系。我们派部队前往接应时，忽然又中止了战斗。一会儿又听得城中心至东门一带，枪声时起时伏，紧张一阵又松弛一阵。估计我军同敌人仍在战斗中。北门和西北城角比较沉寂，不知双方情况如何，因各方面通信联络早已中断，情况异常混乱。但各部队伤患后送者越来越多，据云大半都是由北门出城，沿城根向西送到火车站附近转运后方。据当时连长高先哲说：吕康旅长负重伤，即由北门拨开麻袋沙包抬出来的。

入夜以后，枪声虽然渐稀，但敌人的追击炮火仍然愈打愈密。其中空中爆炸的榴霰弹、照明弹，打得西关及其以西地区如下急雨一般。因此，英勇搬运伤员的滕县人民，在西关铁道以西村内村外壮烈牺牲的人数都很多。即使如此危险，我滕县人民组成的义务担架队员仍然前仆后继，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当晚十九时以后，三七二旅掩护任务完成，逐渐撤退。首先由熊、黄两营合编之一营部队担任掩护，守备西关连接西北城角之胡少瑗营撤退。其次虞高暄之营撤退。最后熊、黄合并之营撤退，尔后即改为后卫。

二十一时左右，黄、熊二营长率领残余部队开始撤退。当通过铁道西侧小庄时，突然遭遇敌人三挺机关枪在街中心拐弯处墙头上猛烈射击，杀伤我官兵十余名。熊、黄营长除派部队还击外，并派兵一连绕到敌人后方，猛烈攻击，驱逐该敌。然后由村中向南面小巷突出。在村中麦地和坟园、森林中到处都有敌机关枪火力阻击，空中不断有照明弹、榴弹弹片乱飞。部队边走边有人中弹牺牲。领路的人民群众也同样遭受很大的牺牲。尽管如此，我军官兵和人民群众仍然勇往直前，毫无畏惧，突出重围，安全向微山湖滨夏镇方向转移。翌日中午，最后的部队才安全到达夏

镇。

是后，我军伤亡三千人左右，人民群众在协助军队运输等工作中伤亡五百人左右。估计日军伤亡也有二三千人。

根据当时部队记录，十七日敌炮发射四万余发，敌机投弹五百余枚。滕县城里、城外炸成一片废墟。日军烧杀虏掠，万分残暴。

（摘自熊顺义所写“第二十二集团军山东邹滕两县抗日简记”第三部分的第四部分“滕县城之战”。）

（熊顺义，四川人。一九三八年三月，亲身参加了滕县守卫战。当时他担任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七四三团三营营长。）

滕县守卫战亲历记

何煌荣

一九三八年二月底，日军矶谷和坂垣两师团已于邹县地区集结完毕，为配合津浦南段北进之敌以夹击徐州，乃对我在津浦北段之二十二集团军全面转入攻势。同时与一二二师对峙之两下店守敌首先出击。敌人三月上旬开始总攻势，炮火猛烈，继之以坦克前导，步兵随伴，协同前进。我方正面之一二二师及一二七师均被击溃。一二五师沿邹滕公路线经香城、东郭等地，节节抵抗，迟滞敌人。一二七师在微山湖以东地区，交相掩护后撤，并坚守普阳山、龙山、界河、北沙河、大山及大坞、小坞之线。我一二四师七四〇团亦受到敌人数倍于我之兵力及火力的压迫，放弃石墙村，部署防御阵地于东深井村南之高地一线。为了掩护滕县左翼安全，一面竭力抵抗，一面急报师部求援。三月十四日，一二四师师部派三七二旅旅长曾苏元率熊顺义营、江有厚之加强连驰赴东深井应援，于七四〇团左侧方之池头集与日军激战，勉力支撑，使得敌方一时无法前进。

此时津浦路南、北段形势都紧张，战区正在调运增援部队，乃严令第二十二集团军必须坚守滕县不准擅自撤退。副总司令孙震（到临城后，因刘湘病故，调邓锡侯回川任川康绥靖主任，孙震代集团军总司令。）转令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负责统一指挥滕县城防，非奉令不准任何一人擅自离城，违者军法论处。

命令下达后，一二七师师长陈离向王铭章报告，由于该师只有一个师部特务连在城内，此外部队全部在前线不便指挥，请求

出城。王铭章不敢批准，乃电报请示孙震，孙震复令，只准陈离师长一人率特务连出城，其余任何人不准擅动。陈离出城后即在南沙河野战中负伤，离开前线。

正面的一二五师及一二七师在敌军强大兵力压迫之下，逐步后撤。王铭章师长即令王志远旅及童澄旅掩护撤退，并力阻企图进犯的日军南进。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均在节节抵抗后无力完成任务。一二五师及一二七师两师逐步布防于界河及大坞、小坞之线，并从滕县两侧地区撤退。王志远及童澄旅奉令撤入城内，据城力守。此时滕县城已完全暴露在敌人炮火威力及步兵包围之中。滕县东门尤为敌军进攻之重点。王铭章即命蹇国珍团坚守，城墙上亦赶筑防御工事，并利用东门外的一段小街及部分零星民房作为据点，部署防御阵地，与敌反复争夺，交战极为激烈。各城门均用沙袋填塞，仅东西两门略留通道（以曾苏元旅刘公台团据守铁路，构筑工事，维护西门交通），守城决心极为坚定。

战区司令部得知津浦北段敌军攻势甚猛，二十二集团军形势危殆，即调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进援二十二集团军（汤恩伯军团辖王仲廉及关麟徵两个军，武器精良，为中央军之有力部队），共同阻止敌军南下，以掩护战区部队集结及徐州安全。同时并电令二十二集团军孙震副总司令，务必死守待援。孙震随又立即严令王铭章据城死守，以待汤恩伯军团之到达。王铭章曾三次（最后一次因电讯中断不通）复电报告战况，并表示决心死守，成仁报国，不惜作出任何牺牲。

三月十六日敌军加紧向滕县城猛扑，仍以东门作为重点进攻，城墙被敌人大炮轰垮多处，我官兵奋勇迎战，用盐包千余袋堵墙缺口，继续用手榴弹和步枪机枪反击，日军伤亡亦重，但日军仗恃坦克及优势之炮火，不断反扑。战况激烈之处，王、税两师长迭次亲临指挥，争夺相当惨烈。一二二师守军蹇团严翊营长负伤，官兵伤亡颇重，形势甚为危急。此时王、税两师长决心将

在东深井、池头集作战的三七〇旅王麟团、曾苏元旅之熊（顺义）营等部调回滕县，加强固守县城的兵力，接连急令两旅所属团营转移，两旅奉命后即时协议，由曾旅先头出发，吕旅继之，在十六日拂晓前全部撤退，向滕县城转移。午后四时许，我第七四〇团行抵滕县近郊约十里处，已闻敌军炮声隆隆。同时敌军也已发现我急行军部队，从南沙河方面用炮兵猛烈向我进行阻击射击（此时集团军总部已被迫撤退），但因任务紧急全团暴露，故疏开队形，迅速开往滕县西郊待命。时已黄昏，敌军炮声也渐趋平息。旅、团奉命入城接受任务，王铭章师长作了如下指示：

1、两天以来，敌军猛烈攻城，预料明天必将继续。我两师奉命死守以待汤恩伯军团到达后，再行出击，将能胜利地完成任务。

2、七四〇团即刻接替东门内外的一二二师部队的防守任务，将该部换下作预备队使用。

3、曾苏元旅担任维护从西门到后方的交通联络任务，并加紧构筑防御工事。

我七四〇团立即派出雷迅、康平两个营乘夜到东门内外接替，而以陈洪刚营作预备队，位置在东门城内，团指挥部设在东门内城门洞下。此时城内外官兵闻明日即有汤恩伯军团前来增援，甚为振奋。

原来，汤恩伯军团已于十五、十六日陆续到达临城，其先头王仲廉军之一个团刚下火车时，孙震副总司令告以滕县城情况紧急，命其及时前往增援，殊料该团一到南沙河，即被气焰嚣张的日军击溃，其它各部仅在南沙河布置警戒，不敢从正面攻击前进，以解滕县之围。其军部到达临城之后，得知滕县正承受强大的日军攻击，借口“机动作战”，乃将部队迂回向滕县东南地区开去。跟着南沙河之敌即向前推进，二十二集团军总部直属少数兵力不能抵抗，遂后撤至运河南岸之利国驿，从此与滕县守

军失去联系，使滕县城完全陷入日军四面包围之中。

从当时所收听到的日军前线广播中获知，进攻日军，已知我守滕军队是川军部队，装备差，战斗力薄弱，认为不堪一击。但自开始围城进攻，两天以来，终未得逞。于是在三月十七日拂晓炮火威力倍增，坦克、步兵频频冲击。我七四〇团及守城各团，只凭借简单工事及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城墙上兄弟部队的几门迫击炮的支援，坚持战斗。

团长王麟同我（以下何煜荣自述）出东门督战时，眼见是不支之势，王即命我立即回城，将陈洪刚营及临时配属的一个重机枪连带出，一并增加前线，并严令各营不得后退一步。在形势又略显稳定时，我即同王转回城门洞内。但这时敌方炮弹如雨点般指向城东、南门，特别以东门城楼为目标，因此遍街瓦砾，硝烟弥漫，城墙多处坍塌，守兵死伤惨重。传令兵冒炮火给我们送来饭菜（王麟来时带有他平日极为欣赏的成都三倒拐五色子香肠），上面盖了一层尘灰，简直无法下咽。由此可见当时炮火猛烈之一斑。后据两师部估计，敌军三日之内约消耗各种炮弹两万余发。

大约午后三时许，城门洞已呈全部崩塌之势，王麟正同我密议暂时转移指挥位置之际，突然营长雷迅冒炮弹仓促来报，前线已经崩溃。王麟同我只得不顾一切地冲出城去，希图最后支撑危局，但一颗炮弹飞至近处爆炸，破片打在王麟头部，他即时倒地不起。我立即转身回来，在掩蔽处叫随身几名卫士把王麟抬下，并亲自跑去向王铭章师长及税代师长报告当时危急情况。那时王师长态度极为镇定，但听到我的报告、看见我的模样（一个参谋说，如果不看到你的两只眼睛，就根本认不出你是哪个了）以及见到王麟被抬进师部的情况后，知道形势恶化，已临千钧一发之际，可是又不敢下撤退命令，于是立即召集各旅长到师部地下室开会，税代师长作紧急布置，命令参谋长邹慕陶继王麟任团长，

可邹又不敢受命于危难之际，不得已又叫我升任指挥。这时城外三个营已全部崩溃，城内外完全隔断，我身边只几名卫士及团部一个通信排而已。同时责令我选八名精壮士兵，准备于入夜将王麟抬到后方抢救，那时他还未绝气，但已昏迷不醒了。

王铭章及诸人在地下室紧急开会，准备竭尽全力再坚持一点时间，入夜后敞开西门陆续向南撤退。当时初步下了决心，但尚未作出具体布置，团长张宣武仓惶来报说："敌人已经进城啦！"当时两个师部及县府人员都集结一起，闻此紧迫消息，顿时秩序大乱，正在地下室开会诸人，各自赶去指挥掌握各自的部队去了。我随同王铭章师长出来站在街头，面对东门，督促身边少数士兵，依据街道两侧沙袋开枪拒敌。此时敌人已将我团在东门外的三个营吃掉，其平射炮不断从东门射来，眼看敌兵纷纷入城或登上城墙，用步枪、机枪向我猛烈射击。我向王师长报告说，我西门上还有部队，他点了一下头，要我速去掌握，我立即转身向西门驰去，从此我就和王师长再未见面了。（王师长此后情况，下面另作补述）

当我到西门时，即与税代师长悌青，主任参谋罗毅威，旅长吕康，副旅长汪朝廉等人会了面，那时城门沙袋堵塞，仅可容一个人侧身进出，但溃散官兵争相夺路，秩序大乱，无法控制。不久敌兵即从东、南门方向追击前来，由城墙上用机枪向我扫射，用手榴弹向我们投掷，吕康头部中弹，汪朝廉胸部中弹，接连死亡多人。税代师长由几名卫士奋力拉出城门，我及师部参谋处长税斌、参谋张岐等奋力挤出，侥幸得免于难。更幸曾苏元旅熊顺义营长及卢高暄营长、特务连连长江有厚等尚坚守于西门城外及铁道车站各阵地，奋力阻止敌人，不然则所有拥挤在西门城内者必将完全被歼，无一可幸存者。

但过了铁路则是一带开阔麦地，早为敌人火力封锁，敌炮兵延伸射程，直接指向，并用空炸子母弹不断射击，我官兵伤亡于

这一地带之内者触目皆是。此时只见城内火烟四起，枪声不绝，我官兵还在城内各街巷各民房中人自为战，与敌周旋。黄昏后，敌人追击已停，炮声渐息。我在突围途中，遇见税悌青等人，旋又碰见护随王铭章的一名仅存的卫士向我们详细报告了王师长阵亡经过。税同我等冲出约二十里，连夜赶赴运河南岸一民房内休息。三昼夜坚守滕县城之战，至此已基本结束。

次日天刚破晓，我们几人正向微山湖畔之夏镇急进时，税代师长命我和卢高暄分别择地收容前线溃散官兵，殊知敌人骑兵已追击前来。夏镇正处于运河与微山湖之间，进退无路，无法执行任务，在紧迫中，临时觅得渔船一只，税代师长及我们几人登上渔船，驶向微山湖西岸的沛县渡口登陆。

战区长官部已获知滕县失守，四十一军全军覆没消息，正四处打电话给地方政府，与前线溃散官兵取得联系。先我们到达沛县的一二四师师部参谋黎岱宗已与长官部取得联系，长官部电令他负责在此收容，另外还于剿城设收容所，我们即直赴徐州西北约三十里的柳辛庄执行收容整编任务。其他各部溃散官兵，各赴指定地区，但奉命一律不准进入徐州市区。

在此次战役中，我团除团长王麟，少校政训员胡清溪，少校军医主任王某阵亡外，全团伤亡官兵计七百余人。其它各师、旅、团伤亡官兵人数亦众，分由各部呈报。

在收容整编过程中，得知战区长官转下最高统帅部电令，其大要：41A坚守滕县，未能完成任务，应予追究责任，惟念该军伤亡重大，姑免查究。汤恩伯应援不力，予以申斥。

随即又奉电示：嘱孙震不惜一切，想尽办法，将王师长尸体寻觅出来归葬，以慰忠魂。

四月，台儿庄会战拉开序幕，我军各部虽收容整编初步告一

段落，但人员武器还未补充，又奉命向运河南岸津浦路线上的利国驿地区开进，策应台儿庄会战之进行。

（何煜荣，四川人。一九三八年三月，亲身参加了滕县守卫战。当时他担任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二师三七五旅七四〇团副团长。）

颂川军抗日

黄以元

东邻小鬼侵华夏，　西蜀健儿保邹滕。

军民合作去倭寇，　民族团结打日本。

据熊顺义同志回忆，当时在滕县抗日守卫战中，滕县城关涌现了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积极拥军，并率领民众奋不顾身参加战斗，年逾花甲的“抗日三老”之一黄以元老先生（又名馥堂），著名书法家。他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激烈战斗中，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奔走县城，宣传、组织民众，积极运弹药、抬担架，踊跃支援抗日战斗。并在感慨之余，奋笔直书，以颂川军抗日之精神。

滕县沦陷的片断回忆

罗广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不让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寸土”。日本的野蛮侵略，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全国各阶层人民，都要求团结御侮，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颇有生气。特别是青年学生和抗日志士，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联合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慰问团、救护队、义勇队、战地服务团，积极支援和参加抗日战争。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形势。但在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强大军事攻势下，国民党军负责的各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被迫后撤。“七七”事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平津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南侵，不久即进入山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所部弃守黄河天堑，撤出山东。遂使沿津浦线南侵之日军，几乎没有遭到抵抗，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侵占济南，一九三八年一月初侵占邹县。十月间四川邓锡侯的部队奉调东来。十二月初达滕县，先头部队开赴滕县以北两下店和日军相遇，当即展开了激战。这是从“七七”以来，在津浦线上日军第一次遇到的强有力的阻击。川军驻滕县的一二二师官兵，在师长王铭章指挥下浴血奋战，予敌以重创，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从邹县窜到费县，从费南到滕县东南木石、羊庄，把滕县包围了三面。川军在三月十四日由北沙河撤守滕县。日本侵略军于三月十

六日攻城至十八日，守城的川军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由滕县西门撤出，经沛县到达徐州。这时近百万人口的滕县遭到了日本侵略军的野蛮烧杀掠夺。

日军血洗滕县城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旧历二月十五）的早晨，日军对滕县开始了炮轰，到中午全城起火，川军在拼死抵抗三天之后由西门撤离。日军从东门进入。日军的先头部队进城后，遇人即杀，见房放火。这时滕县城内外是一片火海，没有走掉的居民尽遭日军屠杀，极少幸免。滕县北关，因是美国的教会所在地，当时美日关系还保持正常，因而日军没有侵犯教会区。北关的居民全部逃进了教会。据滕县第一个汉奸维持会会长×××谈，在日军进城后，他在教会和日军接上了头。原来×××在滕县卖报，日军就利用他来成立“维持会”，后成了第一任汉奸县长，不到一年即被日本侵略者撤职查办，罚了苦力三年。×××接着谈到日军进城后的情况，是较真实的。他说，当日他带了三十二个和他一样幸存的市民，配合日军清查大街小巷，全城没找到一个活人，每户都有一至二具死尸。那些较大的商号内死难的更多，据说都是店东家强行留下看门户的。从死者的尸体看，多是用刺刀刺杀的。这些死尸，凡是有防空洞的地方，都被拖到防空洞里埋上，无防空洞的地方，就全运到东门外龙泉塔下和会馆前后。这些尸体在烈日曝晒下，臭气冲天，真可说是血肉模糊尸骨如山，其情景之悲惨，令人难以目睹。呜呼！我善良之民族，惨遭此劫，是何人之罪也？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日军攻打县城前，城郊和附近的村民纷纷向东山里逃难，我也是其中一人。但见大街小巷，村里村外，哭声震天，乱作一团。那些抛家舍业，扶老携幼的难民，两

眼含着泪，一步一回头地望着自己的家园。往那里去？谁人知道！亡国之恨，大家都尝到了。逃难的人流继续向东山里走去。路两侧的衣物扔得到处都是。原来这些逃难者，离家时，这也带着，那也拿着，但走不多远累了，就开始丢物逃命了。大家正往东走着，忽然间东边的村民纷纷向西跑，人们正在不解时，就看见了日本侵略军的骑兵由北向南奔驰。逃难的人们都哭着说："逃日本反，竟逃到日本人跟前了！"这些人真是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趴在山沟里等死。这些逃难者的心情谁能体会到呢？只有当事者才知道。幸好这些日军是奉命包围滕县的，并没有停下来杀人，我们得以成为虎口余生。

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我和本村逃难的一些人由山里返回家乡时，走到城东的龙泉塔下，只见：恶狗成群，乌鸦满天。这种情景真象古诗里所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过去的龙泉塔下，虽不能说是游人如织，但每天早晨和晚饭后，总少不了一些男男女女的同学在散步闲谈，或复习功课。（塔的西边就是县立师范）这时，却成了乱葬场。

"国恨家仇压心头，不灭日寇誓不休"。这是当时人民的心声。在日军进入县城后，便对城内城外大肆搜查。城北关西街，有居民张守谦拳师，他自幼学习武术，练就一身好武艺。在抗战前，家中设有拳场，当时跟他学艺的不下数百人。他兼我校的武术教师，因而我称他张老师。张教练身高膀宽，性情直爽，是一位见危授命的英雄。当他知道日军要进北关搜查时，便身带单刀，暗藏在家中。三个日军进入家门后，他纵身而出，抽刀连劈两个日本兵，第三个日本兵慌忙越墙时被张一刀劈于墙下。张老师的行动，确是我民族的骄傲。我国有此爱国之士，能亡于弹丸之地——岛国日本吗！一九三八年秋，滕县西门里有个龙泉池澡塘。一天中午，一个日本大兵（有的说小班长）吃醉了酒，闯进了澡塘，洗完澡即躺在床上鼾声如雷睡着了。这时有个青年从腰

中掏出匕首，照着致命处捅了下去，结果了这个侵略者的性命。这位义士，随即换衣出走。洗澡的客人虽惊恐，也自豪，纷纷迅速离去。到客人走后，澡塘经理即向东家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结果，澡塘被关闭，经理、管账先生都被捕。当时日本人把四个城门全部关起来，在城内查了三天，也没找出“凶手”。这位爱国义士，到底是谁，至今无人了解。

滕县是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县，古有“善国”之称，象这样的义士和张教练等恐怕还有不少。只是事隔四十多年，无心者早已忘记；另一方面，有些事不是发生在身边，就无从知晓。

以上是滕县沦陷前后的一点情况，敬希对滕县熟悉的老同志予以指正。

北沙河惨案记

县政协调研科整理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在北沙河村制造的大屠杀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六年了。但人们回忆起这一件件一桩桩日本侵略军的凶残暴行，仍无不愤恨异常，特别是亲眼目睹这次惨案的老年人，更加切齿痛恨。

北沙河村，位于滕县城北十五华里处，南临大沙河，西靠津浦铁路，过去被称为九省通衢的南北大官道，从村子中间穿过。这是一个有二百零五户，七百六十人，七百五十亩土地，人均土地不到一亩的穷村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大举进攻中国。侵略军沿津浦路长驱南下。由于“国军”节节败退和汉奸亲日派的卖国投敌，我大片国土沦入敌手。祖国锦绣河山，惨遭日军铁蹄的践踏蹂躏，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惨遭无辜杀害，广大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为了阻止日军继续南侵，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命令本师三六四旅七二七团进驻北沙河，修筑工事，布置第二道防线。当时北沙河村外挖战壕，架电网，贴了很多抗日的标语及“八月十五烧破鞋，日寇死到黄河崖”等歌谣。第二天，为了防止敌人钻隙渗入滕县左侧，王铭章师长复令在北沙河的第七二七团，抽一部分兵力去滕县西北十七八华里的洪疃，西南三十多华里的高庙布防，其余部队跑步开回滕县布置城防，并命令离开此地时炸毁铁路桥，切断敌人交通。

十五日，日军沿铁路南下，行至北沙河附近，看到铁路桥被炸，铁轨被扒及抗日标语、歌谣等，前进受阻，恼羞成怒。为了报复，就对北沙河进行疯狂地烧杀抢掠，造成骇人听闻的北沙河惨案。下面是我们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访问两位受害者的记录。

“我叫王延标，今年五十三岁了。遭事那年六岁，刚刚记事。但日军在北沙河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子我永远忘不了，就是一九三八年阴历二月十四日（阳历三月十五日）。

那天，天刚拂晓，鬼子就炮轰北沙河村。听到枪炮声，全村老少惊慌万状，感到大祸就要临头。青壮年只得抛下父母妻子各自逃命，老弱妇孺四处躲藏。日军进村后就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不论是走不动的老年人，还是在地上刚会爬的婴儿，都不放过。有的被绑在树上用刺刀穿死，有的被关在屋里烧死，有的被扔进水里淹死，有的捅死后再开膛破肚……。当时血迹一滩滩，一片片；死人一个个，一堆堆。哭声、喊叫声、撕打声、杀声响遍全村，惨不忍睹。

我家有七十多岁的奶奶，四十多岁的父母，十二岁的哥哥，四岁的弟弟，未满月的妹妹和我共七口人。因老的老，小的小，行动不方便，没有跑脱，就和邻居王德香一块藏在家南的地窖里。唯恐鬼子发现，吓得我们气也不敢喘。清楚地听见鬼子们皮鞋的‘咯咯’声向我家走来。进家就到处乱翻、找人，屋里屋外折腾得不象样子，没找到。刚出门，鬼子发现了地窖，于是瞪着眼、龇着牙，咿哩哇啦乱叫唤。他们先把王德香叫了上来，强迫他跪下，然后扳动枪机。王德香性格刚直，从不忍受半点人格的侮辱。面对这些日本兵，他恨得咬牙切齿。当鬼子向下按他跪下时，他猛地拔开鬼子的刺刀，一拳打过去，把鬼子打得一个踉跄，随即飞起一脚踢在另一个鬼子的小腹上，疼得他直嚎，最后倒在地上。他正要继续拼打，第三个鬼子开了枪。他中弹之后，

又向前走了两步，凶残的鬼子连打了数枪，并在德香的尸体上用刺刀狠狠地捅了几刀。

鬼子被打之后，更加穷凶极恶，把仇恨向我们全家人身上发泄，龇牙咧嘴，恨不得把我们一家人一口吃掉。当即把我们全家老少从地窖里没好歹地拉出来。我吓得躲在奶奶身后不敢睁眼，奶奶吓得直打哆嗦。哥哥哀告饶命。野兽们哪管这些，首先用带血的刺刀把哥哥活活穿死。母亲看到自己亲生的孩子血流满地，死的这样惨，就大哭起来。狠心的鬼子却哈哈大笑。接着把母亲怀里的小妹妹夺过来，举过头顶再摔在地上，妹妹哇的一声昏死过去，并当场撕去母亲的衣服大开了膛，父亲也给活活劈死。这些东西还不死心，又把七十多岁的奶奶向我家前水坑里拥，奶奶不愿撇下我们三个没有爹娘的可怜孩子，就抱住坑边的树死死不松手，残无人道的鬼子竟开枪把奶奶打死后又推到坑里去。这时我和弟弟没命地哭喊，鬼子转过头来，把我们兄妹三人扯腿扔进坑里，又向坑里打了几枪。弟弟妹妹悲惨地死去了。我被扔到死人堆上，连吓加摔，头‘嗡’的一声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个水坑里连杀死、淹死加摔死的就有十九人，坑水变成了血水。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苏醒过来，听见鬼子还在别处打枪，我从坑里偷偷地爬上来，赶紧向家里跑去。回到家里一看，一片凄惨，东西被抢得光光。当时，我心里象插进了一把刀子，难过的那个滋味没法形容。我也顾不得这些了，赶紧钻到床底下，用破席遮住身体。就这样在床底下藏了七天七夜。第二天鬼子放火，心想这回是没命了，万幸没有烧着，但吓得象个呆子。蹲在床下，想想全家老少七口人，只剩下我一个苦孩子了，以后怎么过活？跟谁过呀！我暗暗地哭泣了整整七天七夜，泪都哭干了。这七天，我只喝了三个没被鬼子抢走的生鸡蛋，勉强活了下来。以后，是我旁院的大爷王学增收养了我，才长大成人。解放后，

我作了国家的主人，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一想起惨死的亲人，惨况如在眼前，心里就悲痛万分”。

王延标同志讲到这里，已泣不成声。停了一会，侯志茂老大爷接着说：“我比延标大十六岁，看到、知道的更多些。那天早晨，几百个鬼子端着带刺刀的枪，挎着明晃晃的洋刀，象恶狼一样顺着官路从西北进了村。没有跑脱的乡亲们，吓得有的藏在床底下，有的钻进柴堆里，有的藏在庵子里，有的钻进地洞里……。不管大家怎么躲，也没有躲过鬼子杀人的屠刀。他们把藏起来的人，统统地找出来，进行枪杀刀砍。

鬼子进村后，首先发现王家坑北边的地洞里藏着十几个人，在洞口架起机枪就向里边扫射，洞口的憨二第一个被打死了。因洞有拐角，其余人没有被打着。这时，鬼子就象疯了似的乱喊乱叫，打着手势强迫人们出洞。并在洞口架柴点火，用烟熏他们。后来熏得实在撑不住了，出来了十二人。鬼子就叫大家排队跪在洞口的地上，然后机枪对着他们‘嘟嘟’地响起来，十二人都倒下去了，躺在血泊里，打完后再用火烧。

与此同时，藏在西洞的六个人也全被杀害。在洞口的王德和听见北洞的枪声和人们的惨叫声，恨透了日本鬼子。正巧有两个日本兵伸头向洞里喊，他来个出其不意，猛地冲出来，把鬼子撞得仰面朝天，半天没爬起来，但别的鬼子向他开了枪。又有一人想冲出洞，也被打死。鬼子向洞里一看，只剩四个妇女了，发出了一阵狂笑，嘴里不停地嚎叫着什么‘花姑娘的干活’，然后让他们统统出来。其中有王子兰的母亲和妹妹，王德柱的妻子和一岁的女儿。上来后，子兰的妹妹先被刺死，她母亲拼命护女儿，也被刺死，尸首都被扔进水坑里。另一个鬼子去夺德柱妻子怀中的小孩，她死也不放，被鬼子们一步一脚踢到坑边，用刺刀穿死。把一岁的孩子摔昏在地上。后来孩子醒过来，爬回母亲尸体边，哭喊几天，因村内几天不见一个活人，无人过问，活活饿死。

还有藏在侯家坑西庵子里的七个人，也全遭同样杀害。当时庵子中的一人到街西买东西，被鬼子看见后，他拼命往回跑，鬼子在后边拼命追，刚跑到庵子，鬼子也追上了，开枪把他打死。当鬼子发现庵子里还有人时，开枪就向里边扫射，又死了五人。还有一人躲在庵子的东南角，在庵子口打不着，鬼子就拆了庵子口打；还是打不着，就又拆了庵子的东北角，伸进枪去把他打死。这死去的七个人当中，有个叫胡之启的，他被害时妻子不在家，事后知道了，哭得死去活来。想想自己一个妇女，在那样的年代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无法生活，便走了绝路。她先把大女儿和怀抱的三女儿扔进井里，再来捉二女儿，闺女知道事不好，撒腿就跑，没有追上，自己回过头来一头栽到井里。

罗斗一家被杀四口，鬼子先把他夫妇枪杀，然后把屋点着火，将两个孩子强行推到屋里，活活烧死。常金贵一家被杀八口，有他父亲、母亲、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娘、大爷。金贵母亲的两只眼睛被鬼子刺瞎，鲜血顺着两眼直流。王兴一家被杀四口，尸首都被扔进坑里。张秀喜的父亲和有病的叔叔，没来得及躲藏，被日军逮住吊在树上毒打，他父亲被开了膛，叔叔被打得血肉模糊，昏死几次，后来残废了。罗士宾、常宝平当时没有躲藏，以为鬼子来到只不过是要吃要喝，总得讲理。谁知鬼子见了他俩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叫他们说半句话，并威逼他俩去修公路。看到鬼子这样蛮横他俩明白过来了。当时日本鬼子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们怎么能同中国人讲理呢？讲理就不到中国来侵略了。在众多的鬼子面前，他们没有别的反抗办法，只好一人拿了个抓钩子，一人拿了个破铁铣糊弄鬼子。鬼子一看，这根本不是修公路的工具，就开枪把他们打死在沟里。王延苓一家藏在自家的枯井里，也被鬼子找到，他婶子、母亲被刺死，父亲被刺穿喉咙，刺刀从前边进，后边出，死去了。还有我奶奶打死在院子里，王子田的奶奶打死在屋里，侯广喜刺死在村东坑崖上，邱东

田打死在村东头。总之，遭事的人家很多，我不一一说了。

万恶的日本鬼子，真是吃人的野兽。为了发泄兽性，见妇女就强奸，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十一二岁的幼女。全村被奸污的有十一人，有的奸后再开膛破肚，惨景目不忍睹。

鬼子杀了这么多人，还不甘心。第二天又来抢东西、放火。进村后，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真是无恶不作。顿时浓烟四起，整个村子成了一片火海，除了张庆林家在村东头路南开店，店里住着暗藏的张姓汉奸，因而他家没烧外，其余所有房屋变成了一片灰烬，光剩下被烟薰黑了的屋框子。有的比较难着的房屋和树木，几天后还星星点点冒烟着火。鬼子并在放火烧村的同时，进行大抢劫，把各家在外逃时顾不得带走的贵重物品、衣服及其它抢劫一空，最后才开走。

真惨呀！全村遭杀害的有五十多户，八十三人；杀绝户的有十一户，二十五人；剩一口人的有四户，二十人。烧毁房屋二百四十余间，牲畜十二头，农具十余套，大、小车十五辆，粮食二万七千五百余斤。砍伐树木八十余棵，抢走猪、羊、家禽不计其数。被烧后，有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二人要了饭；有十七户，六十八人逃了荒；有二十四户，四十五人无房地靠背‘河脚’（背人过河）、拉车为生”。

讲到这里，侯大爷泪如泉涌。他镇静了一会，告诉我们现在北沙河人民吃穿不愁，也不受任何人欺辱了。但这笔笔血债斑斑血迹他们永远忘不了。并让我们写成史料，以传后世，让青年人了解一下日本侵略军的罪恶，老一辈受的苦难，更加热爱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

刘子衡先生史实述略

刘曾莹

苍天永恒，岁月无情。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日，我父亲刘子衡先生，被酷夏夺走了生命。

抚今追昔，父亲与世长辞三年了。三年里，我无不一时一刻在想念我“内无私心，外无私产”的父亲。朝思暮念，梦魂系之。……总觉得父亲仍活在世间，活在有正义、有学问、有道德的学者、文人、志士和亿万人民群众中间；或对后学循循诱导，或与宾朋侃侃而谈。父亲毕生视天下为已任，冀祖国的统一大业为未酬的壮志。所以，父亲生前在其《自诔》中写道：“眷眷乎九州之大同”。

父亲生于贫苦人家，自幼秉承先君的教诲：“人家开花，我作把，不是为了自已，而是为了人家。”父亲生前，一向严以律已，宽以对人。在生活上，终生淡食布衣；道德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他平易近人，无富无贵，无贫无贱，无长无少（男女），老有所养，少有所育，总是对人彬彬礼让；爱憎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学习上，在人，倡导“有教无类”，在已，主张“因学而明”。

我父亲辞世三年了，每当我走进父亲生前住的斗室，见到放在案头上的书、报，看到他亲手撰著的《孔子编年》、注释的《同文尚书》，以及他悉心研讨的《易经》，或校正过的《孔氏医案》，见到国内学者、教授、画家、文人同父亲来往的函件，

看到我党的创始人之一董老必武所赠之《列宁文选》等等，每每潸然泪下！特别是在我整理父亲生前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老伯、著名的作家老舍老伯、原山东省副省长李宇超老伯等的诗词遗稿时，总觉得物在人已古，触手泪簌簌，哽咽不能语。

今天，缅怀生我、育我的父亲，对我及我的家人来说，是失去了一位敬爱的长辈；对社会来说，是失去一位有着奇特经历，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和平，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过不凡的业绩，受到党的信赖和敬重，深得人民群众爱戴的战士；对呼唤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来说，是失去了一位团结的使者。

父亲生前一件件，一桩桩的往事，和终生的仁者胸怀，无私精神，都是使人永远不能忘却的。

敬爱的父亲，安息吧！

学 生 时 代

一九〇三年，父亲出生在滕县杏花村一个佃农家中。由于家境的贫困，使他无缘就塾为学。幸有一位粗通文墨的世代为人守茔的陈玉美先生，给了他文化上的启蒙。辛亥年，同村人刘蒲堂、颜兰亭、朱广森等高悬旗帜响应革命的行为，又给了他人生志向的启蒙。接着，在滕县书院学校，他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参加了由曲阜二师学生带头，响应“五四”运动的罢课游行。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中，他立志“长大要问国家事”。为此，一九二四年，在他二十一岁时，毅然放弃谋到不久的小学教师职务，考进了当时名闻遐迩的进步势力中心——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二师）。

曲阜二师，自一九一九年由山东著名的进步教育家范明枢先生执掌后，即被誉为“红二师”。在我父亲入校的第二年，发生

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在范校长支持下，全校师生停课举行反帝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支援工人的斗争。在高涨的学生运动中，父亲参加了举办平民夜校的工作，并从此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开始密切交往。二师最早的党组织成员之一杨荫鸿，一九二五年由中共山东省委派来开展工作，后来去广州参加革命，在蒋介石背叛后被杀害，他走时就是我父亲送离曲阜的。“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右派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二师的共产党员学生王泽新、刘德荣、张化恪、张育东等被捕。师生群情愤慨，我父亲被公推为代表，步行去兖州，找北伐到山东的国民革命军战地委员会副主任何思源和政治部主任仇鳌进行说理斗争，迫使他们释放了被捕同学。在坚持正义、追求进步的斗争中，父亲以其机智无畏受到师生的推崇与信任。因此，当被破坏了的学生会重新成立时，他被选为学生会学术部部长，不久又改任学生会主席。在此期间，一九二九年六月，他与王宗佩、仇森林、张继霖等学生会干部，在党组织影响和领导下，在校长宋还吾（范明枢先生时已为反对迫害愤然辞职）的支持下，主持了当时在政治上影响全国的《子见南子》案斗争。其详情当时虽有专文介绍详述，可在一九七四年，组织上曾要我父亲写他所主持经历的有关《子见南子》案的详细材料。近时，也有专文刊登，可详见《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中，高文浩同志写的《山东二师‘子见南子’案始末》及纪念鲁迅专刊（杭州大学学报增刊）——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王欣荣的《关于‘子见南子’若干史实问题的探究》文章。

《子见南子》案，发生在革命尚处于低潮，日本疯狂屠杀中国军民的“五卅惨案”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实行文化围剿的前夜。它是针对蒋介石加紧制造法西斯统治的白色恐怖中而发起的一场学生运动。它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山东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一页。参与这场斗争的师生，立即遭到反动派的大

规模迫害，为了揭露反动派的罪恶阴谋，由我父亲起草，向国内外发出了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一日的“真”日通电，迅速得到广泛的声援，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有两个月之久。鲁迅先生对斗争中的二师学生，也给予关注和同情，在他主编的《语丝》上及时发表了《关于‘子见南子’》一文，深刻揭露和斥责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无耻行径。

二师的斗争虽获全国各地的强大声援，但最后仍以校长宋还吾被撤职，我父亲和王宗佩（原任学生会主席）两人被开除，大批进步同学被迫离校而告结束。“调离”宋还吾的山东教育厅训令颁下后，二师师生又立即开展了挽留宋校长的斗争，公推我父亲和王宗佩为代表，去济南找教育厅说理挽留。当时，这则消息以“要闻”见诸报端云：“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会，闻该校校长宋还吾因演《子见南子》被孔氏控告一案，教育厅有撤职消息，大为愤怒，公推刘位钧（即刘子衡）、王宗佩等于前日来济挽留。据闻该代表呈文方到教育厅，而撤换校长命令已下矣。现在正通电全国，再接再厉云……。”父亲被勒令离校时，许多同学恋恋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互相勉励，互相安慰。他们还把“新文化街”四个大字，写在“考棚街”（二师校址）街头，以表达与反动势力誓不两立的决心。“新文化街”的名字遂沿称至今。

一九二九年，父亲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当时该校的筹委会主任蔡元培，听说我父亲是“子案”开除的学生，便找他谈话，询问了二师反封建斗争情况和进步学生被迫害的经过，表示了深切关怀。经蔡先生介绍，父亲结识了共产党员郑志雄（后曾为冯玉祥研究室人员）、张光侠（时因患肺病在青岛做地下工作）、汤美亭（1927年随鲍罗廷去苏学习，回国后被派到青岛做地下工作）等人，并时常在太平路天后宫联系，阅读党的刊物，听他们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理，以及苏联的革命与建国经验，使他的思想有了一个飞跃。经蔡元培介绍，父亲还

结识了我党的老朋友温起凡先生。温起凡，原名温燕斌，福建莆田人，早年毕业於保定军校，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参加过护国、护法反袁战争，因拒绝蒋介石的收买而与蒋反目，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十分同情共产党，与我党领导人林伯渠是老友。父亲与温起凡先生的相识，在其一生经历中都有很大影响，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讲学活动，大多是靠了温先生的联系安排。

不久，蔡元培、温起凡离青去沪，他们与我父亲常有书信往来。一九三〇年，我父亲的二师同学朱兴汶（名济民，中途辍学投考黄埔军校，曾参加北伐），被黄埔革命同学会全国行动委员会委为组织鲁南暴动的警备军总指挥，因参加反蒋组织，事露被捕，押在韩复榘的军法处监狱。父亲闻讯后，马上去上海，请蔡元培出面营救，朱始得释放。在蔡元培先生处，父亲还结识了章太炎先生。后来章太炎先生病重，父亲还到扬州看望过他。一九三二年，父亲按照张光侠的意见，在同学中鼓动学潮以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受到校方监视，不得已以经济困难为借口休学，移住崂山读书。然后又去即墨中学作英语代课教师。在那里发动进步学生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以后，蔡元培来信，跟张光侠的意见一样，劝他复学，勉励他一方面治理学术，一方面参加救亡斗争。并手书对联赠他，其一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则可以治天下。"其二曰："万顷波涛鸥境界，九秋风露鹤精神。"一九三四年，父亲被学校派往鲁南，参加中央研究院董作宾率领的考古工作队。其间，就滕县安上遗址的铜器、陶器、曹王墓和墓葬结构问题，父亲曾与董作宾进行论辨，《大公报》就此作了报导后，蔡元培先生亦曾来信鼓励。

在山东大学（由国立青岛大学更名），父亲与老舍先生，闻一多先生都有密切交往，与老舍先生还结成终生挚友。

父亲在大学学习期间，正是日本侵华野心日益膨胀，民族危

机步步加深的时候，而国民党政府却顽固地执行着蒋介石的安内攘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政策，正是“爱国者有罪，冤狱遍於国中，卖国者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亡国论甚嚣尘上。父亲不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而且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抗日宣传。一九三五年暑假，温起凡先生给父亲来信说，已推荐他去南京给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讲学。父亲不畏权势地位，毅然接受邀请。林森本来是要他讲《易经》的，但他到南京后，却拟定了另一个题目：“俱立则治，共同抗日则民族可兴；偏立则乱，内战不休则国家必亡。”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援引我国历代遭受侵侮的史实，归结到国内的政治问题，断言“国共合作抗日，则民族可兴；独裁剿共，则民族必亡”，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为剖析批驳。当时郑志雄、温起凡、罗家伦等也在座听讲。讲学之后的回返途中，父亲去泰山看望了老师范明枢先生。当时范老先生正受聘给冯玉祥将军讲《春秋》，并帮助冯将军举办“武训小学”。在泰山，经范老先生介绍，父亲开始同冯将军结识。回青岛后，父亲向张光侠、汤美亭介绍了给林森讲学的情况，受到他们的鼓励。他们说：“讲得大胆、讲得好，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完全合乎民族利益。只要有机会，还要扩大讲学的影响。为了发动抗日，上下一齐干。”

这次给林森讲学，竟成了父亲为抗日、为和平长期出游讲学的契机。

讲学春秋

一九三六年夏，父亲在山东大学毕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想到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看到国民党统治的重重黑暗，有的同学意志消沉，退隐深山出了家；有的则继续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或文艺创作。父亲决心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

去。为此，他应邀专程去上海同郑志雄与温起凡相商。温先生主张他留沪同蔡元培一起成立抗日学术团体，以扩大抗日影响。郑志雄起初建议他去广东，争取两广的军人。而在西安的学者王子端（原为张钫的秘书长）却有来信，邀他去协办国学讲习所，以阐发关中理学。郑志雄支持他去西安，认为借此可同“关中三李”（清康熙间陕西周至李颙、富平李固笃、鄠县李柏并称三李）学派展开论辩，影响和争取陕甘杂牌部队及东北军内的知识分子。他说：日军入侵始於东北，今后其侵略矛头必指向华北。红军北上抗日，旗帜鲜明，中华民族稍有爱国心者，无不向往，独蒋介石执迷不悟。因此，根据需要与可能，抓各方面的人事关系，选择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大力宣传抗日，不仅影响大，而且收效速。人人尽知，蒋介石已把手从江西伸到了陕西。如果环境得利，可以在西安继续呆下去，必要时再作联系，采取其他行动。这样，父亲便决定先去西安。

到西安后，王子端、景定成、黄谦、焦子静等人在“得明楼”设宴欢迎他，他和关中学术界人士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大家从筹办国学讲习所谈到三李学派，又谈到抗日问题。王子端盛赞山东乃孔孟之乡，文人代出，而关学自张横渠后，又出了二曲先生（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山东与陕西虽关山阻隔，但对祖国灿烂文化的创造与发扬，却有异工同曲之谐。接着，他向我父亲提出李二曲所讲“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的问题。父亲回答：“二曲的成就不独在学术方面，而在紧要关头不降清。”遂援古责今说：在今日，所谓“言有教”就是说日军侵华，中国人民应奋起抗击；“动有法”即是面对民族大敌我们应有抗日行动；“昼有为”，天天都要考虑如何取得抗日胜利；“宵有得”，夜夜要考虑抗日所获的成果；“息有养”，一呼一吸之间都不能忘记培养抗日的志气；“瞬有存”，一转瞬间也不能减弱抗日的决心。

不久，焦子静向我父亲提议，在西安学术界讲学，不如到南京去作用更大。焦子静是辛亥革命老人，一直从事反蒋活动，同孙中山、林森、茅祖权、柏烈武、刘蒲堂、刘冠三等早期革命者关系较深，尤其跟冯玉祥有着不同一般的交谊。他表示愿意出函推荐我父亲到冯玉祥、柏烈武那里去。父亲原已同冯玉祥相识，便欣然接受了焦的这一盛意，焦子静遂书函林森、冯玉祥、柏烈武等人，对我父亲的讲学中的抗日主张详加介绍。于是父亲重到南京，先住玄武湖柏园、陵园或头条巷，最后住在冯玉祥的晓庄别墅咏归斋。与郑志雄、温起凡见面后，他们对焦子静的主张也极表赞同。

当时的形势是，自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人起而拥护中共宣言，呼吁组织救亡联合战线，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共同对敌。据此形势，父亲在柏园给柏烈武讲学时，即以“公生明，偏生暗”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题，竭力阐发了凡主张抗日者必须具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大敌当前，绝不能再走党同伐异之路。给冯玉祥讲的主题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父亲曾劝告冯将军：“你不应该为副委员长的名利所羁绊，而应该本着在张家口抗战的精神，以民族利益为重，别就高明继续努力。”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到华北指挥抗战失利后，曾在晓庄克己斋招待于佑任、田雍南、刘聿新、陈哲甫等各界人士，当时父亲作了“亡国亡家、迫在眉睫，团结抗日、人人有责”的发言，呼吁“坚决抗战则民族可兴，不坚决抗战则民族必亡”。

“七七”事变前夕，范明枢先生曾到南京看我父亲，讨论如何在山东组织民众抗日的问题。父亲介绍他去滕县发动孔昭同、陈慕唐(二师同学)等组军抗日。后来，孔昭同果然受到范老先生的思想影响，起而抗战。范老先生北归时，父亲与朱兴汶曾过江

恭送。范老临别赋《南京赠子衡》诗云：

老眼昏花醉一歌，过江欲复旧山河。
要知吾道南行日，蔚起人才著述多。
龙蟠虎踞到心头，万古繁华入目收。
荡涤腥膻澄玉宇，百年大计与谁谋。
风云雨露耐心思，锦绣河山草木滋。
后乐先忧留意处，大同世界是无私。
海曙云霞日出红，樽前醉倒几英雄。
中原不少乾坤气，能定升平唱雅风。

上海失陷后，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我父亲与冯玉祥同到武汉，住在千家街福音堂。某日，在昙花村遇到老舍，谈及《大公报》王老向有意推荐老舍给冯玉祥讲抗日文学的事，父亲劝老舍可以考虑应聘。后来，老舍终于答应下来，帮助冯将军筹办抗日文艺刊物《抗到底》。转年，父亲应温起凡先生之邀，去西安讲学，遂与冯玉祥作别，冯挽留不住，与老舍同到车站送行，并惋惜地说："老舍先生来了，刘先生却走了！"

父亲这次到西安后，这里就成了他在整个抗战期间进行抗日讲学活动的中心地。特别是一九三九年春，他在小湘子庙街温起凡的家中与林伯渠同志相识后，他的讲学活动就更为直接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赋有新的意义了。林伯渠同志是温起凡先生在辛亥革命时的老朋友，经温先生介绍，林伯渠同志已详知我父亲同党的历史关系和他的讲学抗日主张，因此对我父亲的经济、生活至为关切。父亲向林老表示，想去延安看望毛泽东主席，林老表示欢迎。但次日林老与温先生一起到八仙庵来看我父亲时劝他说，目前抗日任务日益艰巨，如何动员一切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为急迫的问题，而据他讲学的条件和影响，继续和扩大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中进行抗日宣传和争取活动，要比先去延安更为有利。父亲同意这一主张。西安东关的八仙庵是父

亲常住之处，庵后有山洞，非常幽静隐蔽，且有道长周秋阳与方丈郭静阳的掩护，这里就成了父亲与林老经常会晤，纵谈天下的地方。父亲经常从林老那里得到中共中央的有关材料，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对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指示意见。八仙庵道长周秋阳，山东邹县昌平人，早年出家在济宁，后到各地云游，落足西安，是个爱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为了纪念他昔年的掩护，父亲去世前一年还写了一首《曳尾行》悼念他。

在西安的玄风桥、新化巷及下马陵等处，拜师听学的有胡宗南、顾希平、董钊、蒋鼎文、苏陆明、李观亭、肖湘、陶光鼐、沈克、白云芝、徐经济等人。讲学内容多以古代哲学为主体，凡有利引伸於民族抗日者即加以阐发，利用一切时机晓明大义，如父亲见下马陵胡宗南的办公处院内，董仲舒墓碑上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即反其意而用之，根据中共中央指出当前时局最大危险是投降、分裂、倒退，但为了民族大义，对国民党顽固派和动摇派仍要作竭力争取的精神，以“正其谊亦谋其利，明其道亦计其功”的说法，向胡宗南等人指出：“正其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国民党应当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并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这样才能挽救民族於危亡，才能谋得全民族的最大利益。“明其道”，就是指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只有坚持正确方针，才能使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为民族复兴立大功。这个方针，就是坚持团结、反对投降，这是每个爱国人士都应持的态度。

到一九四〇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已三年，而蒋介石与汪精卫却一直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实行两面夹击。在蒋的内部，却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许多司令、将军一个个投敌去搞所谓“曲线救国”。父亲睹此情景，万分愤慨，即把注意力转到利用蒋党内部矛盾，大力发动地方实力派起来制止蒋的投降活动方面来。在玄风桥、新化巷

给董钊、肖湘等人讲《春秋》《左传》时，父亲即利用“狄人侵邢”的史实，愤而直言：“今天的戎狄豺狼是日军和汪精卫，应该与他们势不两立。现在竟有人想投降到豺狼方面去，全体爱国力量就应该奋起痛击！讲到‘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一语时，父亲指出，我国各民族各抗日团体都应真诚团结，共同对敌，同时对民族叛逆分子群起而攻之”。老舍去延安慰问，返途经西安时，去看我父亲，父亲还特邀他同去玄风桥，给国民党将领和当地爱国人士讲了延安观感及八路军浴血抗击日寇的事迹。然后父亲讲话说：“全国各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应当一致奋起，为驱逐日寇，挽救民族危难，解除全国人民的痛苦而斗争到底！”

在这段时间，山东教育界人士及其他地方逃亡西安者不少，不少旧友曾找我父亲，征求对去向的意见。父亲总是鼓励他们消除顾虑，毅然到延安去。对去延安者，父亲都欢宴相送，并提供帮助。吴伯箫、王祝晨、张新舫、孙魁一、沈默等人，都是此时经过父亲处先后去延安的。吴伯箫去延安前，父亲还特地送他布鞋两双，说希望他能在延安坚持到把鞋穿破，然后再决定去留。解放后，父亲赴朝慰问志愿军路过沈阳，与吴相见，吴还提起这件有意思的往事。一九八〇年国庆节前五天，我姑表弟鲁在岭因公由京返滕经过济南，携来吴先生书赠所著《烟尘集》给我父亲。吴并给岭弟谈了我父亲送他去延安前，专门为吴熬的绿豆、红枣稀饭等详情，回忆中颇多感激之语。

父亲还利用与国民党一些军政大员的师生关系，掩护和营救了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他们工作提供方便。姜鸿玉在西安开设的“美记蕃菜馆”，是我党地下组织设立的一个据点，在这段时间即多由我父亲给予维护。卞之琳携带党的宣传文件由延安去四川嘉定，路过西安，亦由我父亲设法解决了乘车困难。特别是在延安工作的早期共产党员黄××（其父黄笏丞，老画家，是林伯渠同志的好友，时住温起凡家中），因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

系工作，被特务逮捕，也经父亲多方设法，迅速营救出来。此案当时轰动西安。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对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皖南事变”后，西安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也愈发气焰嚣张。父亲几乎在所有场合，对反动派投降活动都作严厉谴责，已使蒋方不能容忍，故特务便处处寻隙，欲加迫害，父亲的处境十分险恶。根据林老的意见，父亲跟温起凡商量后，决定暂去宝鸡。临行，景定成写了《长安赠子衡》的诗以叙别情：

君家饶侠气，求友远来秦。
师亡悲叹凤，道丧恸殇麟。
识怜窥管小，学耻治丝纷。
稷下轻方士，齐东笑野人。
孔林游鹿鹿，黉舍委荆榛。
抗志羲皇上，缅怀洙泗滨。
喜闻军奏凯，不让虏骄尘。
遥望明湖柳，相期共赏春。

父亲到宝鸡后，经孙墨佛先生的介绍，在十里铺给黄子芳、祝稚琴、杨静宇、翟鸿飞等人讲学。但不久，他的言行又引起了宝鸡警备司令部的注意，张学良原来的秘书刘笠泉来暗示他：“刘先生，收摊子吧。”温起凡先生也为此到宝鸡，商量对策，认为不可因小失大。最后商定，父亲南去汉中暂避一时。不料渡汉水时，身染伤寒，到汉中即住进了健康诊所。此时父亲虽已是贫病交加，处境困难，但他抗日之志穷而愈坚。出院后，又给西北大学王允明教授和进步学生董之麾等讲学，特地介绍了鲁迅先生在文化战线的斗争史实。

转年初，父亲在汉中接到温起凡先生的信，建议他去南方给李济深讲学。父亲遂返宝鸡，商定由孙墨佛留住清江益门镇作据点，他与温先生一同南行。自此，父亲离开西北，到西南、东南

讲学，一去四年。

父亲和温先生同车到成都后，住玉纱新街小花园饭店。在小天竺街闻宥、刘盼之的住处，他应邀向一些男女青年学生作了“读书莫忘救国”的讲话。顾颉刚、陈翔鹤、李长翼等友人先后来看他。从李长翼那里，他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老同学李鉴铭在道孚县突然被捕了，而且据说“案情严重，难以救助”。这位李鉴铭就是父亲在山东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出家当了和尚。李长翼也是父亲曲阜二师的同学。据李长翼说：日寇侵占华北后，李鉴铭着喇嘛服，携《光明经》，曾到陕、甘等地找我父亲，没能找到，又来成都，崇庆县蒙藏学院院长张煦，得知李精蒙、藏语，便邀李去该学院讲话，见李著有一部《蒙藏大辞典》，乃中国第一部有关蒙藏的文化汇书，张甚珍视，讨作参考，李欣然留下，即返成都。适有商人赴藏采购药材，李便伴随到雪山研究密宗。行至道孚县，遭警察盘查，以李形迹可疑而拘捕。李供称去雪山确为研究佛学，绝无任何非法活动，并指与张煦及文教厅秘书李长翼相熟可作保人。道孚县通过四川省政府转崇庆县蒙藏学院，查其来历身份，而张煦为窃取《蒙藏大辞典》，竟复电说：“此人行迹确乎可疑”，欲加以陷害。道孚县于是对李严加看管。李长翼自认人微言轻，无力可施，因此，请我父亲速设法援救。父亲与温起凡先生商议后，遂采取紧急措施，托张群出面，急电道孚县将李释放。但道孚县限令李不能继续西行，只可东返。李便去灵雀寺，后又到德格县雪山竹箐寺。一九五八年，西藏一位工委书记陈××去青岛疗养，路过济南时，还曾捎信给我父亲，说李在我军进藏时，对解放西藏事业有一定贡献，李的事迹还曾在《人民日报》刊载过。

此后不久，温起凡先生先去桂林转金华，为我父亲的讲学预作安排。父亲去重庆探望了老舍，又去遵义探望了王驾吾、费巩、张荫林等，同他们交谈了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然后于是年夏

到桂林。李济深已从温起凡的介绍深知父亲的抗日主张。因此父亲到后，李热情接待，即住七星岩附近李先生家中。父亲给李讲的专题是“志存社稷谋匡复，要与斯民乐大同。”因李先生喜研《易经》，所以又请父亲讲了乾、坤两卦。

秋初，父亲离桂林，经衡山，到浙江金华与温起凡先生相会，并经陈又新的介绍，给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讲学。因当时民众中流传着歌谣说：“深宅大院，不愿抗战；有吃有穿，抗战不坚；少柴无米，抗战到底。”形象地反映了各阶级和各阶层对抗战的态度。父亲为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于是在给王讲学时，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题，竭力主张为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抨击了一班认敌作父的地主、资本家和袖手观战的国民党将领，呼吁孤立一小撮汉奸走狗。

一九四四年春，父亲与温起凡同车到上饶，经温先生介绍，给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讲学。其中有题为“欲致升平，背私是本；复兴民族，抗日为先”。指出我中华民族之所以遭致空前浩劫，完全是由国民党政权要实行一党专政所造成的。孙中山先生提出要全国各阶层联合起来，共同奋斗。但自一九二七年后，国民党专以一党一派之利益为依归，新旧军阀混战剧烈，又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陷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中，这是全国人民万分痛心的。今天欲使我中华民族出水火而登于衽席，就首先应当背私利，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去打倒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倘在今天局势下，仍不顾全民族利益而一意孤行，则必将受到历史和人民的惩罚。顾祝同曾得温起凡的提拔，对温怀有知迁之恩，又敬服温先生的品德，而拳拳服膺。他曾多次向我父亲表示：“对温先生的隆情高谊，我至死不能忘记”。父亲以师生关系，对顾跟随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多有非议。

给顾讲学告一段落后，父亲与温起凡同去福建莆田看望温先

生的老母。行前，原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馆长柳翼谋有诗赠他：

刘生讲学信江春，又携囊书走八闽；

踏破铁鞋探道妙，武夷请更访邹诉。

父亲原计划是在莆田住至中秋，再回程返西安向林老汇报的，不料温先生却在莆田突然病逝，弥留之际，温先生沉痛地说："不能见到驱逐日寇，还我大好河山，虽死不能瞑目！只有依靠共产党、毛主席才能救中国。刘先生孤身回西安后，请把我死的情况转告八路军办事处。"

温起凡先生的突然逝世，是父亲一生极为痛心的事。温先生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为追求革命，奋斗数十年，敢於坚持正义，服从真理。在十四年的交往中，父亲与温先生情谊深厚，互相支持，而温先生终竟未能看到民族的解放含恨而逝。

父亲忍悲痛，乘酷暑离开莆田，到南平之日，正是日军大举进犯上饶、金华之时。顾祝同从福建建阳赶到南平看我父亲，知温先生去世，不胜感叹。面对上饶、金华的失陷，父亲愤慨地说："这就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造成的。"数日后，父亲经南雄到衡阳，国民党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十军军长李玉堂、方先觉等先后欢迎他去讲学。父亲以"舍身抗日争此义，众志成城固吾疆"为题，不客气地揭露了他们分裂抗日力量，是坚持妥协投降的政策所驱使，所从事的是不光彩的活动。并说："今天我们都应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去求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复兴大业的成功。为此，大家必须一致行动起来，用坚定的抗日意志，筑成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应方先觉邀请，父亲到衡山向第十军全体官佐讲演时说，大敌当前，全国人民应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不应排斥异己，分散抗日力量。"政府"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限制和压迫方法是危险的。共产党、八路军虽然装备低劣，人数较少，但他们能联系人民群众，组织力强，"蒋先生"不团结他们，而采取削弱限制的办法，无异是剖肝引

狼，自速灭亡，太不明智了。但话音未落，该部队政治主任朱岳就大声喧叫起来，说这是“诽谤政府”、“诋毁领袖”、“为共党张目”、“扰乱军心士气”，阻止他继续发言。方先觉见朱如此无礼，即大声对朱申斥一番，说：“刘先生学问渊博，是当今有名人士，林主席（林森）、顾长官（顾祝同）都请他讲学，我们许多人都请他讲过《大学》、《中庸》。他讲得的确不错，很有见解。你为什么还没听完，就讲刘先生如何如何，实在太无礼貌了。你不要多管，好好听着！”并说：“刘先生不要介意，请继续讲下去。”父亲表示：“无论何人采取何种方法，绝不能损害我为团结抗日而奋斗到底的决心。”事后，朱岳不仅对父亲进行多方监视，还暗中向蒋介石告密，说父亲“有共产党嫌疑，在衡山讲演煽动军心”。蒋即电令方先觉查复此事。方接电后非常担心，怕惹出大祸，乃请顾祝同、王敬久、王耀武和李玉堂等分别给蒋打电报开脱，才不再深究。

一九四五年春，父亲重到桂林，先住李济深家，后移住李玉堂家。李济深先生询问了温起凡逝世的经过，对温先生的一生言行作了较高的评价。在这里，父亲给李济深先生讲了全部《易经》，两人着重讨论了如何动员民众，以及争取抗日胜利的问题。（参看附图1）一日，父亲还邀李济深、李玉堂、王敬久、方先觉等到桂林郊处义冢，凭吊了革命青年傅埙之墓。傅埙，即傅亚坪之胞弟，字伯侠，当时不知由何地乘飞机来桂，下机后被警察检搜，发生冲突，当场气疯，后被押至白桂公安局杀害。

父亲离桂林后，与王耀武同车去重庆。路经贵阳，留住一日，独去花溪探望了柳翼谋，并应邀向学术界人士讲了话。翌日，又与王耀武同去遵义，探望了王驾吾教授。到重庆后，即接到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电邀去讲学，遂飞兰州，先住五泉山，后住贤后街朱兴汶家。给朱绍良讲的题目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强调了大敌当前制造摩擦分裂的危害，指出凡

有民族气节者都应奋起抗侮，投降和反共都是死胡同。在兰园由水梓召集的各界人士欢迎会上，父亲发表了“反对投降，坚持抗日”的讲话，水梓和范之杰、傅伯愚等均表赞同，而个别国民党死硬分子都极为反感。这时，父亲除患伤寒后所遗筋骨疼病不时发作外，又突然严重咳嗽，在终年奔劳之后，于处境孤艰之外，复遭疾病纠困，遂经六盘山华家岭返回西安，结束了他四年的江南讲学之行。

返西安后，父亲先去八仙庵探望郭静阳方丈，殊料郭已去世，未便停留，便去宝鸡。行前留一秘函托周秋阳道长转交林老，意谓：自西安别后，遵照指示，与温起凡先生历游江南各地，利用各种历史关系，开展了抗日讲学斗争。不幸温先生病逝莆田，在广化寺火葬，骨灰即停放该寺中。实乃“抗日未成温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到宝鸡后，父亲仍住十里铺崇圣园。先后给黄子芳、杨静宇、翟鸿飞、祝稚琴、关青石、范逸、周克明、严孝东等讲学。四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经十里铺肥皂厂的吴某秘送给我父亲后，被宝鸡警备司令部发觉，便直接向父亲质问，企图以此为柄，施加迫害。经父亲利用顾希平（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的关系，与之周旋，始得了结。

这年八月十五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人民在欢悦中，无不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但此时蒋介石却急于策划大规模的内战阴谋。恰在此时，周秋阳给父亲转来林老的信，说：

“子衡先生：方今举国上下，切盼新政府早日组成，新中国及早建立。不过，某某正向华北调集部队，有意发动内战。希望先生利用讲学活动影响，积极投入反内战斗争。你家生活所需，已电山东党委派人予以照顾。涵。一九四五年九月×日。”

林老的信，给父亲及时指明了今后斗争方向。抗战八年间，父亲借自由讲学的形式，以当时所可能利用的关系和场合，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和团结抗日的各种主张，揭露反动势力的投降阴谋，为实现党提出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伟大理想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中间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和影响，同时也与这个特定的阶层产生了一些历史关系。他是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老师，这正是林老指示他要继续更好地利用的一点。

济 徐 之 间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力主和平、民主、团结，以求避免内战，实现全国统一。本着这一精神，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也在此时，俞飞鹏、顾祝同、林蔚等人忽派“黄埔号”专机到西安接我父亲，名义是邀他“商谈国事”。父亲知道，这实际上是以一种恭维的方式，束缚他反内战的手足，但父亲想到林老的启示，便毅然而去。在重庆一下飞机，父亲即以毛主席的安全为念，同时就蒋介石运兵华北，布置内战活动的问题，向前来迎接他的俞飞鹏、顾祝同等人提出严诘。随后，在他们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又借孙中山提出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方针，指明中华民族遭到空前浩劫，实现国内和平是刻不容缓的事。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是当前形势所必需，国民党应真诚响应共产党的呼吁，与之合作，以不违民众所望。父亲看到，美帝此时急欲趁火打劫，独占中国。且蒋介石绝不会容共产党的存在，即使有某种形式的临时性妥协，也不会改变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野心，内战必不可免，所以极力呼吁蒋党军政人员拒绝内战，反对美国政府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并当场发表了《救时纲要》。其具体内容可参阅《滕县史志》第一期。

十一月，父亲与方先觉同去汉中，住方先觉处。在这里他得悉，在他飞渝后，宝鸡大新公司经理杨静宇、副经理翟鸿飞突因“通伪亲共”罪名被逮捕入狱，公司被封。这实为对父亲先后两次在宝鸡讲学的仇视和加害未逞的又一诡计。父亲遂通过方先觉与顾希平的力量，把杨、翟营救出来，使大新公司重又开业。

在汉中，父亲曾给方先觉的青年师讲“诚明两进，敬义偕立”的现实意义，呼吁上下都应竭力维护“双十协定”的执行。还以“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不从”为题，给方先觉、蒋纬国等讲学。

年底，父亲与方先觉同去宝鸡，春节后去西安，顾希平、董钊、李观亭、徐经济等人都来看他。然后，转年春，与方先觉同去徐州。自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又以徐州为中心，作争取、策反、掩护、营救工作三年。

这段时间，全国的形势动荡不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不失时机地申明大义，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量；一方面，蒋介石口是心非、玩弄伎俩，“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即悍然发动向解放区的进攻，挑起内战祸端；同时又对蒋管区的民主运动实行残酷镇压。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后，把军事中心设在徐州，扬言要用三个月至半年时间消灭共产党。一片浓重的战争烟云，又笼罩全国，压在人民头上。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倒行逆施，父亲感到无比愤慨，决心遵照林老的指示，充分利用与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师生关系这个条件，为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作殊死斗争。他到徐州后，即按照林老的意见，集中精力，进行反战策降工作。他先后同顾祝同、王敬久、方先觉、徐经济、谭漫浦等人作了多次反内战谈话，并动员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八十八师师长兼徐州守备区司令官方先觉等署名发表了“拥护民主、和平、团结建国”的主张。一九四六年夏，他应李济深之约，去南京共商反内战活动计划时，在南京湖南路三十六号王耀武住处，曾与

刘仪长谈，劝他："你过去既与共产党有过联系，今后则应加强联系，争取参加革命工作，万万不可一错再错。"又曾与吴化文多次谈话，以吴请教的孔子许子贡为"瑚琏"的旨意为题，以器喻人，启发他可以做到"大器晚成"，甚至"君子不器"，走人民的道路。后来，在一九四六年冬，父亲由曲阜去兖州途中，吴闻讯还特意赶到泗水坝上来见父亲，父亲向他谈了国内外局势，对他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人心丧尽，灭亡的命运已迫在眉睫。象你这样的部队和其他杂牌部队，要下决心投靠人民。人一生做尽了坏事，最后做件好事，也不枉此生。"又说："今天我向你说了这些，回想我们在南京见面对你讲的'君子不器'，在你来说，于今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有更深刻的理解了。"吴回答："我是有进一步领会的。在抗日时期，中共方面黎玉曾派人与我联系过，当时我思想上动摇，而今追悔莫及。"最后他表示："现在我已与中共取得了联系，为了扩大影响，到一定时机，选一名城，伺机采取行动，请先生相信。"

一九四六年秋，父亲去济南，在王耀武举行的宴会上，当面向王耀武说："你来山东时，我教你到山东后，要做到'少得其教，老得其养'。你做的如何？在坐的做得如何？"继之向白崇禧、顾祝同、韩德勤及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山东省议长裴鸣宇等人作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讲话，强烈谴责了美蒋制造内战的罪行。他愤慨地说："抗日开始，韩复榘不战而走，不走的则认贼作父。山东人民不是靠你们，而是靠共产党的领导，经过八年艰苦奋战，才打败日寇、获得胜利的。如今，你们倒来夺取胜利果实。我向你们提出：今天，山东人民要的是小米，不要战争。"他的话虽然惊动了这些要员，但他们却拿不出反驳的理由。随后，蒋介石一边同中共重开谈判；一边派军侵占张家口，并利用美机向华北、东北、山东大批运兵，在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父亲于十月三十一日在《山东公

报》署名发表《打不得九论》一文。据理力辩，以指明发动内战，排斥异己，实为祸国殃民，无异自取灭亡。内战阴谋为民族、国家、大众利益所不容，内战祸魁必将成为历史上的千秋罪人。上海《大公报》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七日转载时改题为《打不得》。（参看附图2）

文章发表后，庞镜塘、裴鸣宇立即上告南京，蒋介石下令严予查处，王耀武知系我父亲所为，曾专机飞南京向蒋汇报并力求开脱，但终因迫于蒋的压力，回济后即将《山东公报》改为《山东新报》，社长、总编辑吴忠匡撤职。父亲处在遭受热衷内战分子的攻击谩骂声中，随时都会被特务暗算的紧张事态中，得到王驾吾、柳翼谋、孙墨佛、颜兰亭等许多进步人士的纷纷来信支持。尤其是董必武同志，还为此由沪亲书长信鼓励，说："方今主战之声盈廷，杀伐之残横野，独先生高瞻远瞩，发为宏文，真乃一片仁者之声，有民胞物与之怀，此乃《打不得》之真谛也。"

在济南，父亲还公开在绥靖区青年队及一些中等学校作了反内战讲话。同时，他还把王德懋先生（昭建）安排为王耀武的机要秘书，利用王先生在山东省府的办公室，把敌人的活动情况，交王大彤的父亲（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监印），再由后者同当时活动在历城锦绣川一带的章历大队及地下党领导人丁梦荪、王大彤等进行秘密联系，并通过他们把从狱中营救出的同志护送回解放区，并对来蒋管区工作的同志给予掩护。济南解放后，市公安局长凌云同志还宴请过王德懋，了解他与我父亲当时在济是如何见面，又采取什么方式同敌人斗争的。

在此期间，受中共华东局所派，随同军事调处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邝任农来济南的王道工作组，因被何思源指为"别有企图"，而全部被捕，押在经二路纬六路的监狱，虽经邝任农多次交涉，未获释放。王妻孙玉辉由青州化装去蒋管区青岛，求其乡亲王景阳转托范予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营救，未成。我父

亲知此事后，去狱中看王道，并认识了同狱的中共党员傅迺剑、王桂金、新四军某部指导员姜焕美及侯静等人。经过父亲斗争，王耀武无可奈何将王道释放。父亲通过王耀武硬把傅迺剑要出，并把她接到自己的住所，对她的安全及返回解放区的问题作了妥善安排。为此，便把潍县乡师校长调到济南任中正中学校长，以利傅迺剑到该校图书室，以便伺机送傅回解放区。当时还把王桂金、姜焕美、侯静等营救出来。傅迺剑见到我父亲对营救工作的勇气和决心，便向他提出营救马云涛（张建华化名，一九四五年十月被捕后判死刑）的问题。当时王耀武的副参谋长罗幸理、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秘书徐庆誉及军法处的人坚持马已判决，应当执行。父亲便以更严肃更坚决的态度向王耀武要人，经过不少周折，终于把马云涛也营救了出来。另外，经我父亲设法营救出狱的还有某电料行曾华新的以“私藏电台、通共”罪名被抓的两个儿子（一个判死刑，一个判无期徒刑），以及党从某地派到济南的“经济组”八九人，至今仍不详其姓名。

父亲在济南的活动，使王耀武感到了为难，虽在表面上仍礼遇有加，但内心却为因此而造成他各方关系的不好维持而深感不安。于是，他决定派他的处长卿云灿送我父亲回老家滕县“省亲”。父亲明白，这是一种变相的驱逐。但这却给了父亲一个争取卿云灿的机会。一路上，父亲与卿畅谈了儒家“大同小康”的学说，话很投机，到滕县后便向卿深入地谈了反内战问题。使卿思想转化颇大。

在这时期，父亲还负责安排来往鲁南与徐州之间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在徐的一切活动、食宿和安全问题。因地处鲁南的滕县，是抵制蒋军北上的重要战略基地。为了摸清敌情，对蒋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傅秋涛）及鲁南军分区（司令员张光中），情报站（站长徐源湖）通过鲁南商业局，首先与我伯父刘位庚、叔父刘位东取得密切联系，组织了这个工作组，数

次打入徐州了解敌情和购买解放区所需物品。当时国民党军在徐州以北的平山口盘查极严，关卡林立，出入不方便。为此，父亲派秦鸿勋、秦鸿恩（文惠）、张知寒等穿敌军装，负责护送，后来，张知寒曾因此遭敌追捕，幸逃匿滕县得脱；秦鸿恩亦因“通共嫌疑”，被敌拘押于徐州云龙山兴化寺的大钟下面，几乎闷死。父亲把秦鸿恩救出后，得知解放军某部敌工部长李天民被捕入狱，即又把秦鸿恩派往郑州，插入敌军事机关，作为联络点，以便掌握蒋军活动情况，并为日后营救李天民作好准备。不料秦鸿恩因被认“行动可疑”亦逮捕入狱，父亲获悉此事，亲自于一九四七年春末由南京赶赴郑州，先住绥靖公署兵站司令苑泮林处，向苑了解秦、李被捕情况后，又移住顾祝同（时已调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招待所，正言向顾提出秦、李的事，顾考虑后，将二人释放。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军分路进攻山东。是年冬，于兆龙、杨干才部及“佛山”、“南海”等部抢占滕县后，他们扶持反动政权，组织还乡团，到处抓“八路皮”，退租罚款，杀人倒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滕县人民重又陷于黑暗。我父亲得悉家乡人民惨遭祸害的情形后，曾先后两次回到阔别的故乡，跟群众一道同反动势力斗争。先是这年冬天，他从徐州回滕县，在北关基督教礼堂的千人群众大会上，他讲话说：“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一直未能实现。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才做到了这一点。今天，绝不容许反攻倒算！”在高中街、文庙广场等处举行的群众集会上，他呵斥了滕县的反动势力的所作所为，并公开提出：“共产主义是个世界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洪流，谁要抗拒这个洪流，谁就将被这个洪流淹没。”当时，徐兖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副司令汤位东和滕县的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参加了这个反内战群众集会。当地反动头目见李玉堂没有什么表示，便联名密电济南和南京，说“刘子衡通

共”，但在李玉堂、王耀武的屏障下，他们没有得逞。父亲于是借机发动受迫害的群众和其他可利用的力量，支持杏花村农会会长刘位坤、西关街长彭寿和、妇联蔡主任等人的工作，向滕县反动势力反击。同时，又营救出了被捕入狱的中共地下党员孙殿荣、吕复胜，以及张传相的儿子张大元和二元、段正学的妹妹段正蓉等。

转年初，父亲因接李济深函约，离滕县赴沪。过徐州时，他向江苏学院及各中学师生发表了反内战讲话。到沪后，住上海饭店，旋即参加了李济深举行的宴会，这实际是个民主团体反美蒋斗争聚会，出席的有董必武、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王云生等多人。父亲在会上发言时曾着重说到：“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一贯做法。美帝为了这个目标，一意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因此我们说，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和袁世凯、汪精卫集团是一丘之貉……”。会后，在冷风凄雨中，父亲送郭沫若到北四川路。临别时，郭沫若对我父亲说：“这次反蒋宴会很值得纪念。”董必武同志见我父亲在蒋介石控制如此严酷的上海，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横眉冷对，给了他大力支持，特电告中央。为此，林伯渠同志也曾来电表示关怀和鼓励。董老飞返延安之前，对父亲今后的斗争，又作了指示。董老曾代表党中央资助我父亲一笔款项，但他个人一文未用，全部用于营救我方被捕人员方面，表现了他一贯的不谋私利的高尚精神。

参加聚会后，父亲与李济深又作了多次长谈。前次见面，父亲曾邀李济深先生到北方走走，联系一些北方军人共同反蒋。在北方军人中，父亲有不少学生，可作联系工作。但李先生终未能成行。李先生曾表示，蒋介石为本性使然，已无挽救可能，因此他打算先南去香港，发展组织。然后再待机到解放区去。父亲支持他这一主张。这次，他们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建国，决计在李济深先生去香港前，找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的当面相

争。随后，父亲即随李济深夫妇同车去南京，约定由李济深夫妇去见蒋，我父亲在紫金坛二十四号等候。蒋介石设宴招待了李济深夫妇，作陪的人象一九二九年蒋扣李在汤山前那次一样，仍是戴传贤、宋美龄二人。李济深重申了要蒋立即停止内战的主张。蒋辩解说："自总理死后，北伐以来到今天，由于我个人的支配欲太大了，造成了国内不能合作。实际上我也不愿打仗，但是现在共产党眼看打到江北，我有责任去实现总理（指孙中山）遗教。"李济深斥责他："你的话说错了。你不是支配欲太大，而是完全被欲支配了。你说什么有责任实现总理遗教，事实是我们早已违背了总理遗教，追悔莫及！"并以汪精卫的事例讽喻他说："记得总理逝世前，曾教育汪精卫：'我死后，你必软化。'汪说'我跟总理革命多年，不会软化。'总理说：'你不软化，敌人必向你进攻。进攻，你必软化。'总理最后说：'我死后应以俄为师。组织革命委员会，汉民、精卫不能参加。'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国共合作，抗日胜利了，能做到以俄为师，才真能实现总理遗教。事到今天，望你要悬崖勒马，万万不可悬崖撒手，粉碎虚空！"李济深见蒋介石仍执迷不悟，便愤而告别，到紫金坛向我父亲详谈了见蒋经过。这其实是李济深先生给蒋介石的临别"赠言"。父亲与李济深随即同车返沪，在上海饭店他代李济深先生修订了反蒋宣言，便返南京。李先生全家乘船南去香港，以后在那里发表了反蒋宣言。

父亲在南京分访了王驾吾、柳翼谋、颜兰亭等，商谈了在学术界著名人士中推动反分裂、反内战、反独裁、扩大和平民主运动的问题。然后，为营救秦鸿恩，李天民而又去郑州。是年夏，他由郑州回到徐州后，得悉江苏学院的"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遭到徐州警备司令部镇压，五名进步学生被逮捕，该院支持学潮的黄淬伯教授受到追查和恫吓，当即对学生运动表示大力支持，并通过顾祝同把全部被捕学生救出。

在父亲离开滕县的半年时间内，驻防该地的二十四军杨干才部，遭解放军打击后，便遍地构筑工事，企图负隅顽抗。当地的国民党顽固派，也对杨大施贿赂，紧密勾结，利用杨的军事力量，对人民群众又施迫害，搞得民不聊生。同时，他们再度挑起对我父亲的攻击，以“山东同乡会”为据点，从南京到济南，到处散发传单，散布“刘子衡是共产党的外围，在滕县多次煽动群众，策划暴动”。扬言“如果刘某胆敢再来滕县，我们一定要搞掉他”。父亲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震怒，决定再返滕县斗争。这次他根据所掌握到的情况，适当改变了策略，预先邀同新委任的二十四军副军长方先觉伴他同行。回滕县后，首先通过方先觉向杨干才方面打开一个缺口。同时，李玉堂又专程从兖州赶来看望我父亲。杨干才见势头不利，先自软下来。父亲经与李玉堂和方先觉交谈，认为此次环境已变，蒋介石发布了“戡共”总动员令，反共反人民的气势十分猖獗，而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救大批被捕群众。经与李、方商议，采取了紧急对策：一方面，把王起太、赵正卓、张贻亭、席小秀、李殿清、张传前、赵世坤、张恶应、杜恶应、倪成彬、孟庆路、孟宪敏、邱灵才、宋金宽、宋德金、仇有起、于学德、胡昭乾、郭清贵、苑荣江、李应本、魏希金、张云居等多人，陆续都从狱中释放出来；另方面，在李玉堂离滕返兖之前，召集县党部主任和县长，警告说：最近接到民众控告，说这里发生了巨大的贪污行贿案，你们要负责查明，据实呈报，定加严惩！他们本来心中有鬼，唯恐真的揭破脓疮，闻言自然惊慌，于是四处求援解脱。杨干才也怕事态激化，自陷不拔，便托徐兖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冀某从中说情周旋，才使风波稍有缓和。但滕县的群众却并不就此罢休，在我父亲与方先觉回徐州后，他们纷纷起来向省府主席王耀武控告杨部受贿丑行，案情揭发出来，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杨部从此调走，由于兆龙师接防。

在这段时间，对敌斗争能够比较顺利地开展，我党地下人员来往比较安全，与李玉堂的态度有一定关系。我父亲原为李的老师，在李任徐兖绥靖区司令官后，父亲曾专程去兖州找李面谈，让他看清，不管蒋介石如何打算，已经不能逃脱即将灭亡的命运。向他指明“识时务者为俊杰”，阻止他充当南京政府的殉葬品。从此，李开始与我党联系，并逐步做反蒋工作。解放后，在北京，李济深告诉我父亲说，李玉堂去台湾后，竟全家被蒋杀害。

父亲在兖州得知，自夏季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以后，被俘的中共干部和群众，押在曲阜玉虹楼临时监狱的还有三、四百人。便赶往曲阜看望了这些被拘押人员，又召集他们和曲阜师范师生共五、六百人，在曲阜二师当年上演《子见南子》话剧的大礼堂，作了反内战讲话。当时在场的有李玉堂、汤佐东，国民党曲阜县长王震宇等。父亲的讲话虽遭到了黄元庆的反对，但因群情激昂，又有李玉堂等的公开支持，仍取得成功。会后，在曲阜师范的荷花池畔，父亲就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消极抗日事实斥问黄元庆，黄无言以对，只好悻悻而去。会后，李玉堂回兖州，我父亲特意留下找王震宇谈话。得知他原为于学忠部下，又是杏花村刘姓门婿，便向王密示：“你要相机把押在玉虹楼里的无辜群众释放出来。”王表示愿尽力而为。但黄元庆知道后，便控告“王震宇勾结共产党。”山东省政府决定把王免职，调泗水县县长来接任。王在我父亲支持下，抗不从命，拒绝交任。随后，省府又派民政厅长刘翔的表弟某接任，又被顶回。这样一来，就惹得在山东尤其在曲阜的国民党一阵骚动，说“刘子衡煽动鲁南独立”云云。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并开始攻克重要城市。不久，我父亲由徐州送苏陆明（时衔蒋军陆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去北京策动傅作义将军起义到济南后，住在王耀武的招待所。王耀武来看他时，

曾对他说："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省参议长裴鸣宇、省府秘书长刘玉田、绥靖区参谋长罗幸理等人曾向我提出：'省府秘书王昭建是个危险人物，用他当秘书岂不是引狼入室？'我对他们说：'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王耀武还说，庞镜塘等人又到处放风说，撤了《山东公报》社长吴忠匡的职，换上个杜若君为社长（同时为二绥区顾问），还是换汤不换药！这就说明，这些人必欲把杜若君和王昭建赶走。因此，父亲对王耀武正言以告："王昭建、杜若君过去和我虽是一般同学关系，但他们现能趋向革命，是件好事。庞镜塘等人对他们两人寻隙攻击，还涉及到我，显然是别有用心。你应当明辨是非，并为你个人着想。对杜和王，我们要支持到底。"所以，王昭建、杜若君来看我父亲时，他便对杜和王说："要不怕艰险，胆大心细，跟这伙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恶棍斗争到底！"

中共鲁南军分区副政委兼《前卫报》总编高峰同志，是一九四八年夏初到徐州的。先是我父亲由滕县返徐州后，为与中共领导取得联系，经王道同志同意，派培正中学教员秦鸿勋去华东局，并有王道同行。他们着敌军装，通过了封锁线，到达鲁南军分区驻地费县孔旺村，受到司令员张光中、政治部主任张雄、鲁南行署副主任张劲夫等同志的接待。经他们研究认为，去华东局路途较远，不如通过电台请示。中央复电华东局，要加派坚强干部前往徐州，与刘子衡联系。高峰同志遂奉华东局所派，偕同王道先到滕县，然后由我伯父刘位庚护送深入徐州。

高峰同志到徐州后，我父亲在花园饭店欢迎并宴请了他和王道，由朱兴汶、苏星五、倪润甫作陪。父亲向高峰同志询问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近况，对中央给予的支持与关怀表示感激，同时表示，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一定要协助高峰同志把工作做好，以不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当时，高峰同志得知，在二月二十四日夜，武装特务向我父亲和孙墨佛先生在云龙山花园招待所的

居室乱枪射击，企图加害他们（当时守卫者李守义在抵御中死亡，彭云鹤受重伤，二人皆江西上饶人）。后在孙墨佛先生祝我父亲六十花甲的《赋柏梁体六十韵》中还曾追忆此事说："八载御寇抗东胡，云龙厄遭鬼揶揄，深幸我亦与之俱，一时风声遍三徐。"高峰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与关怀。高峰同志代表华东局对我父亲说："此处环境异常危险，希望刘先生和我一同回解放区去。"这个意见高峰同志曾多次向我父亲转达，但父亲表示，据他的条件，留下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与党比较有利，而绝不能为个人得失安危而过虑。高峰同志同意了父亲的意见。为了确保高峰同志的安全，父亲让他到地藏里同住一室，并让秦鸿恩、张知寒、倪润甫、鲁在中等昼夜轮流守卫；让我陪高峰洞察社会动态。此时正值淮海战役爆发前夕，敌军溃集徐州，惊恐万状，又极疯狂，然而高峰同志却能从容不迫，应付裕如，冷静地对敌在徐州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动向，作观察调查和深入分析。父亲每晚与高峰同志对榻而谈，高峰同志详细介绍了党的统战政策和斗争策略，他们二人共同议论了进军徐州所应做的全盘考虑。六月二十四日，高峰同志任务完成，离徐州时，我父亲写给董老、林老的信以及对党中央的各项建议，托高峰代达，并为行旅安全，仍由我伯父刘位庚陪伴护送，经滕县转回华东局。

因工作需要，王道与高峰商定，他拟由徐州经南京、上海转青岛，再返华东局。不料，就在高峰同志离徐州的当晚，国民党特务突将王道逮捕。王道在济南陷狱时的难友侯静立即跑来告知我父亲。父亲当即去打听王道的下落，果然是密不透风。后经方先觉了解，才知是由南京派来的特务拘捕的，而徐州警备司令部只受命关押，却无权释放。于是，父亲马上赶到南京，找到蒋军总参谋长顾祝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和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做工作，再返徐州把王道营救出来。随后，又亲陪王道乘

快车再去南京，住方先觉家，与顾祝同见面，由顾赠王路费，离开南京，经上海、青岛，返华东局。

不久，李济深的使者董致和从香港到南京，见我父亲，带来李化名“仁超”（李济深字任潮）的一封亲笔函。函谓：

子衡先生道鉴：

拜别春风，又更一载。覩兹率兽食人之世，弥垢饥溺之怀。长者抱道在躬，必有安怀之愿。尼山远仰，引领无穷。兹以董君北来之便，托陈下悃，并叩道安。

后学仁超百拜上四月二十日

董致和向父亲详谈了是年一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香港合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被举为主席），号召打倒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及其后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建立民盟领导机构，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在国内外积极组织，扩大反蒋力量等活动情况。父亲亦向董介绍了国内斗争形势，以及他的打算，并即复一函，请董奉达。意云：“仁超先生：读先贤书，‘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任重道远，深愧食而不化。忽奉手书，恍然如有所悟。简此奉书，愿共勉之。”

待董致和南返，父亲即回徐州。不久，山东境内昌潍、兖州、济南相继解放，蒋介石命运已是日簿西山，而徐州警备司令李锦源部困守挣扎。父亲料定，徐州解放已指日可待，在此地的工作已可结束，便举家迁往南京。

奔走和平

父亲到南京后，住中央门里筹市口。顾祝同、吴忠信、童钊、王敬久、李玉堂、方先觉、徐经济等先后来访时，都流露出

走投无路的惶悚，父亲针对他们的疑虑不安，都各指以前途，促他们猛醒。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佑任，以及一些文化界人士如柳翼谋、黄淬伯、田雍南等亦相继来看我父亲，他们却是另一番心情，都在急切盼望共产党、解放军的早日到来。

这年秋冬之交，朱兴汶奉华东局所派，来到南京。在筹市口见到我父亲后，他说了华东局交代的主要任务：一、舒同、刘贯一同志请朱转告：中共中央电华东局，邀请刘子衡先生即来华东局，再转北平。此前，林伯渠、董必武同志曾派中央社会部薛子正为代表，专程到济南，与凌云同志共同委派王德懋南下，传达林、董二老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刘子衡先生去北平的代电。王送交南京其叔王朝干，王朝干在挹江门里邮电新村面交我父亲。二、继续开展瓦解工作，宣传起义不分早晚，敦促他们投靠人民。三、利用各种旧关系，抓武器好的部队。四、华东局领导一再叮嘱深入敌区活动，务必特别谨慎小心。

一。去解放区的问题，我父亲向顾祝同提出后，顾祝同表示支持，并对他由南京经上海去青岛的沿途食宿，全部做了安排。顾祝同亲笔写信给青岛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

寿如（刘安琪字）勋鉴：

滕县刘子衡先生，道德学问为同生平最为欣佩。其太夫人不惯江南生活，待机北返，同行者尚有孙墨佛先生及亲戚十余人，到青后，一切主食品燃烧等，要源源供给。如有其他所需，亦应照顾，此颂

勋祺

顾祝同

二。此时山东省内蒋军据点仅存青岛，朱兴汶意欲打入该地军内。对此，顾祝同亦表示全力协助，并函令刘安琪予以解决。信谓：

寿如弟勋鉴：

兹有黄埔同学朱兴汶，北伐以来，历任营、团长及陆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谋等职，根据工作需要，可适当予以安置。

顾祝同

三．在策动蒋军方面，由我父亲对徐经济、董钊、卿云灿等人又进一步分别作了诱导。后来卿云灿在我军进军西南时，在四川率一个军一个师起义。

四．对中共华东局派出的以对知识界做争取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工作人员齐志恂，给了全力帮助。

任务大体完成后，朱兴汶与对父亲和我全家老少亲朋，於一九四八年末由南京乘车赴沪，转乘“景兴轮”去青岛。到青岛后，住在龙口路一号。刘安琪闻讯，举家来探，说：“刘先生全家来青岛，顾总长已有电报来告诉，食宿方面都已预作安排，指由黄树森副官负责”。关于朱兴汶之事，父亲把顾的信给刘看过后，刘对朱说：“我们是同乡、同学，不比一般关系。对你的工作，顾总长也有电告，委任明天即可送来。”随即，朱被委为青岛港口司令部参谋处长。因当时青岛的陆海交通皆处战备势态下，胶州海上戒备更是森严，故由朱兴汶预备了船只，首先渡我伯父刘位庚等过了胶州湾，由红石崖上岸，又向华东局报告。然后，我父亲、祖母、母亲及兄弟姊妹全家人、及亲朋、杜若君等，依相同路线离青。到达红石崖的当晚，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并於次日备车，送我们一行经胶县到坊子，又转乘火车到济南。在济南，由王德懋约凌云同志与我父亲见面后，电告华东局，当天接舒同回电说：“电悉。饶政委在支前，刘先生既已到济，已派秘书艾森前往迎接。翌晨，艾森同志到济，陪同我父亲前往益都，杜若君亦随往。父亲受到舒同、刘贯一、许世友、袁也烈、袁仲贤诸首长的欢宴接待，舒同主任还特地约王耀武来见了父亲。宴

会后，舒同主任与我父亲作了长谈，父亲就许多问题畅述了意见，谈到朱兴汶已打入敌军机关，但环境险恶，孤军为战，恐难免遭到意外，为此应加派人员前往协助。

父亲在青州停留约一周时间，刘贯一部长告诉说："党中央有电报来，希望刘先生到北京去。"遂由管易文同志陪送，乘汽车到达天津，住襄阳南道天津军管会招待所，受到军管会主任黄敬的热情接待。华东局给天津军管会黄敬、黄松龄二位主任的信说："兹有刘子衡先生，过去系顾祝同等之老师，其在蒋管区时曾做过有益于革命工作，其与我党中央董老亦曾有过联系。去年冬中央电嘱邀其来解放区，刘先生最近始抵达济南。近得中央电示，着将刘先生送去北平叶（剑英）参谋长处。兹介绍刘先生至你处，请予招待，并车送北平为盼。此致布礼。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天津稍停，父亲即去北平，中央统战部齐燕铭同志迎接，送他住六国饭店。林伯渠同志随即来住处与我父亲畅谈，翌日，父亲又去中南海林老住处长谈，并共进午餐。在中南海，朱德同志与我父亲谈话时说，淮海战役时他即在曲阜指挥作战。朱德同志笑问我父亲，在曲阜读书，受了孔孟哪些影响？父亲答道："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此后，父亲又与董必武同志及李济深先生、沈钧儒先生见了面，叙谈了上海分别后的彼此情况。四月初，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到京后，也访晤了我父亲。

此时的北平，正沉浸在获得解放的巨大欢悦之中。而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前途日夜操劳不辞辛苦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又在运筹着伟大的计划。父亲到北平於中国大地是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也正有一项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去执行。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南京政府由代总统李宗仁"主政"后，作出了种种求和的姿态。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人民利益为

重，为了减少战争伤亡损失，同意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双方很快派出了和谈代表。但由于蒋介石的幕后挟制和操纵，由于南京政府的缺乏诚意，使谈判受到了阻碍。党中央为了促使退守江南的国民党残军早日放下武器，减少流血牺牲，一本仁至义尽的精神，决定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南京，推动李宗仁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我父亲接受了周恩来同志这一委派前往南京。

这次去南京前，周副主席在北京饭店就推动和谈问题，与我父亲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周副主席说，当前国民党反动派虽然退缩江南，但仍有不少幻想，幻想在国际反动力量的支持下，作最后挣扎，因为敌人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党顾念江南人民，为了减少流血牺牲，仍愿对残喘在南京一带的国民党政府以最后的弃暗投明的机会，因此中央决定请朱蕴山、李民欣和刘先生，还有刘仲容先生，去南京敦促李宗仁等人悬崖勒马，立即放下武器，在我们提出的八项条件上签字。只有如此，才能说明谋和的诚意。周恩来同志强调说："不过要向他们表明，他们签字我们也要过江，不签字我们也要过江。"我父亲插言说："国民党的军队虽已如惊弓之鸟，但仍须审慎。"周恩来同志剀切地指出："对，国民党的军队尽管象豆腐一样，我们也把它当成钢铁来打。"

四月五日上午，专机起飞之前，周副主席与几位先生一一握别。他握着我父亲的手说："责任重大，处境险恶，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还望刘先生虎穴之中注意安全，一切请相机行事。"

下午，专机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李宗仁派参谋长黄宇清、秘书长邱昌渭及程思远等人迎接，先到梅园，稍事休息后，我父亲移住中央饭店，李宗仁又派邱昌渭来看他。经过一些紧张的接触后，便在李宗仁私邸进行会谈。北平去的朱蕴山、李民欣、刘仲容、刘子衡参加，南京方面除李宗仁及其他首脑人物外，还有

陈启天、张东逊、张君迈等人参加。因为有顽固派分子从中作梗，此次会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另一次重要会谈在顾祝同住宅进行，南京方面参加人员有何应钦、吴忠信、张群、白崇禧、吴铁城、于佑任、顾祝同等。

无论在会谈中，还是在私下接触时，对于国民党政府提出的种种阻挠国共和谈的借口，都义正词严地进行了详细剖理和强烈谴责。在与李宗仁会谈时，他们拒绝接受关于惩办战犯的主张。我父亲愤然指出："战争是国民党挑起来的，战争的责任就应由国民党负责。现在的局势很清楚，国民党军是'无边落木萧萧下'，而解放军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而应当机立断，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经过一再论战，李宗仁终于表示，关于战犯的处置问题，为免和谈受蒋介石的破坏，一切责任他愿一身受之，而要求达成豁免蒋介石的谅解，以使北平和谈能够进行。我父亲遂向他建议，可直接向毛泽东主席去电，表明此意。据《中央日报》四月七日专电称："李代总统今晚七时，在官邸宴请日前由平抵京之第三方面之神秘客三人，程思远、陈启天等应邀作陪。"宴会后，李宗仁请他代拟了电稿，李阅后未易一字（上海《钮司周刊》17期大千报导，此电系由刘子衡代拟），当晚即向北平发出。

次日，毛泽东主席即复电李宗仁。新华社将"卯阳电"全文刊发，并发表了评论。《申报》于四月九日刊载如下消息：

访晤南来神秘客

与本报记者长谈一时半

〔本报南京八日电〕：五日由刘仲容陪同来京之三位人士，对和谈问题之重要性，已于三日来之发展中获

得证实。此三人士在京行动极为神秘，官方人士对此讳莫如深，目前可以透露者，为该三人士系代表三个不同之立场，其中一人为李济深代表李民欣，另一人据称自身身份甚高，有其个人之地位，系以个人身份从事和平运动，与李民欣及其他一人并无任何关系，此三氏在京被目为政治空气中之神秘人物，但彼此除曾在代总统七日晚之宴会中同席外，并无聚会，唯在记者三日苦追之中所获得之成果，已瞭然于彼等之政治环境，故其神秘性在记者心目中除不便代为宣布其姓名外，已成为重要之政治性矣。八日深夜，要求在某一并非官衙私邸之屋宇中，访晤三人士中之一不愿宣布姓名之某士，达一小时半之谈话，使记者能获悉三人士在和谈中之努力与成就，某氏身份甚高，曾为林森、李济深、顾祝同等之师友，有一贯之和平主张，渠於北平“局部和平”后赴平，此次南来系“代表其个人”，为救人民求和平而来。某氏一再表示渠与同来人士无关。据称：渠在专机内与其他人士未交一言，下机乘迎接之汽车离开机场，中途即单独下车，在夫子庙小店吃面及理发，并未为人注意。某氏着蓝布长袍，中等身材，年龄在五十左右，双目炯然，执杖而行，精神极佳，当渠於八日深夜返其寓邸发现记者时，颇现惊诧之神情。渠对记者所询实际问题，均避不作答，并综合一小时半之谈话，可以为读者告者，乃某氏来京为和平奔走之意见中，包括代总统对毛主席通电之意义，此为三日来之成就，但并非其目的。彼等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目的。某氏并称：如不达目的不至於十一日前返平，询以此种目的是否可以达成，某氏称，将视大家之努力。在某氏之谈话中，显示和谈之困难甚大，但同时显示和平并未绝望。渠於五日抵京后，

曾于六日晚应李代总统邀，长谈二小时，七日复应李代总统邀宴，与其他二人士同席。此处，渠与在京要员，亦接见甚频，顾祝同八日午曾设宴招待。

阳电发出后，南京政府行政院、立法院竟分别召开紧急会议，对李宗仁提出弹劾，说是国共和谈乃事关重大，未得行政、立法两院同意，擅发阳电系越权违法行事。弹劾的内容，俱在各报公开发表。不仅如此，顽固派甚至派出特务对朱、李、刘几位先生盯哨，寻机迫害。父亲邀请南京中央大学医务主任刘华阳陪同到各医院慰问“四·一”学潮受伤学生，并到中央大学礼堂参加了在“四·一”学潮中被杀害的学生的追悼会后，顽固派也在报纸上进行了攻击。

朱蕴山在先行返平之前，托我父亲营救羁押于上海狱中的王葆真、张克强、夏琤瑛等进步人士。为此，父亲不仅向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当面郑重提出，以作为国民党政府和谈是否尚有诚意的一项表示，促使他们去电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负责设法将王葆真等人解往南京以备释放，并且亲赴上海承办此事。《申报》四月十日以《三神秘客之一刘子衡来沪》为题报导：“一度引起首都政界人士兴趣之自平来京三神秘客，经记者连日采访，已获悉其姓名为刘子衡、李民欣及朱蕴山三氏……又在三客中最具神秘性之刘子衡氏，九日夜十一时乘京沪夜车赴沪。据刘氏行前语记者，此行系‘访友’，留沪一日即返京。”该报十一日又拍发“神秘客刘子衡在沪北站与本报记者谈话”照片，以《由平南来神秘客之一刘子衡昨晨抵沪》为题报导：“自平来京神秘客之一刘子衡，昨晨由京抵沪。刘氏四十许人，衣黑色旧棉布袍，戴灰呢帽，极似内地之乡村教师，绝不类奔走南北之政治使节。刘氏表示在沪仅有一日逗留，对居处及拟访之友人，均不透露，唯一再郑重申明，‘此次到上海，完全是个人的

行动，不代表任何方面的意见’。又刘氏自称山东滕县人，华北解放后，自某地抵平。”（参看附图3）

四月十五日，《申报》与《大公报》同时报导《刘子衡发表和谈声明》：（参看附图4）

刘子衡发表和谈声明

〔本报南京十四日电〕神秘客之一刘子衡，自平抵京后，奔走和平，数度与代总统会晤，提供意见，顷以任务达成，日内乘赴平专机返平。十四日晚记者往访，承发表为国共和谈声明如次：“当抗日胜利政协决裂之时，本人即坚决主张和平民主，统一建国，并反对同室操戈致危国本，发表《打不得九论》，宣告天下，然考诸事实，竟为三年之内战，主战之声盈庭，杀伐之祸横流，卒也天下相感，元旦文告应时而出，八项条件相继而来，海内苍生，久郁不宣，望和之深情，得以稍抒，本人足迹所履，几遍全国，凡有血气者莫不思治，自到北平以后，与周恩来、李济深、董必武、齐燕铭、季方诸先生，先后晤谈，无一不异口同声，诚意谋和，及到南京以后，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吴忠信、顾祝同诸先生先后晤谈，亦无一不异口同声，诚意谋和，准此，则国运将由否而泰，民命将由死而生，契机已显，虽愿群策群力，互相激励，促和平大业早日成功。子衡默察现势，舍和平而外，实无法谋团结，舍团结而外，实无法救人民。瞻望溪口春光明媚，翘首北海，绿波荡漾。毛泽东、蒋介石两先生虽与本人素昧平生，但想见其谋和之热心，必能使和祥之气，充满天地间也”。

四月十六日，南京和谈代表黄绍竑、顾问屈武，携《国内和平协定》飞返南京，以二十日为期，征求签字。而在此严重关头，李宗仁阁僚仍内部矛盾，争执不休，迟迟不决，父亲遂邀吴忠信或顾祝同相陪，一再找李宗仁，力促其毅然在协定上签字。直到十九日，李宗仁还请我父亲代拟电文，表诉苦衷，以求将签字日期再作延缓。父亲给李起草了第二电文稿，未果。

此已是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南京政府早已丧尽一切资本，而仍自不量力，讨价还价。就李宗仁个人来讲，此电文中所用“疏理未善，徵询未周”的话，确也反映了其当时的窘态。但就是这样一份电文，由于遭到行政、立法两院的抵制，也未得发出。他们对时局估计之谬误，妄图凭借长江天险与残兵败将阻抗覆灭的幻想之荒唐，及其顽固不化与民为敌到底的立场之反动，由此可知。

四月二十日晚，解放大军开始渡江。南京当局举座皆惊，政府大员各作逃跑准备，李宗仁在作最后打算。在一片混乱之中，父亲听到汤恩伯奉命要对南京进行大破坏的消息，立即向何应钦、顾祝同提出警告：“决不容许任何死硬分子破坏南京的一切建设！”他对李宗仁、吴忠信、顾祝同等指出：“时至于今，还有些人不能自拔。何去何从，应当认真地考虑。”又特别问李宗仁：“你个人最后采取什么态度？”李表示，“我胸中自有主宰，决不负先生的好意，到一定时机，即到北平去。”可惜李宗仁此话的实现，已是在一十六年以后。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到北京后，不久给我父亲来信数次，深悔当时不听先生之言，父亲多次回信有“革命不分早晚”及“来了总比不来强”等语，给予安慰，祝其珍惜有生之年。（原信及其照片，在“文革”初随《花甲集》一并交省政协……）

四月二十二日晚，国民党在南京的党、政、军人员纷纷逃窜。二十三日清晨，在解放南京的隆隆炮声中，父亲邀李民欣从明故

宫机场乘机北返。

飞临泰山上空时，驾驶员林某通知："北京机场不能降落，必须飞往上海。"经父亲与其商议，林某同意改飞青岛，着陆于沧口机场。机场蒋军宪认为该机来路不明，便对他们严加监视，见此形势，父亲即与青岛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电话联系，不意刘去崂山；又给港口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朱兴汶去电话，朱即刻乘车来接。军、宪见朱所乘汽车插有特别旗号，态度才缓和下来。朱把我父亲和李民欣接往市内瀛洲旅社附近一幢楼上住下，由朱亲自护卫，并及时与驾驶员林某取得了联系，林某告知："北京军管会叶剑英主任已有电来：请先约定，明晨何时启程和到北京降落时间，随到随时即可降落。"次晨，朱兴汶又用原车将我父亲和李民欣送至沧口机场，适逢张治中的眷属乘机由沪飞至机场降落，少顷，他们便同机飞往北京，王炳南等同志在机场迎接，并仍安排住在六国饭店。当晚，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庆祝南京解放大会。在会上，父亲兴奋地发言说："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内，我在南京亲眼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溃逃，又在北京光荣地参加了中央举行的南京解放庆祝大会。为此，我热切希望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挥下，乘胜追击，早日解放全中国。"

四月二十五日，林老到六国饭店看望我父亲。父亲与林老在西安第一次见面至今，已整整十年，这十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今日共庆胜利，自然十分喜悦，且无限感慨。林老详细询问了他去南京的斗争过程，父亲作了详尽的汇报，并对李宗仁政府内部情况作了分析。林老说："先生冒着危险去南京，推动李宗仁签字虽未能实现，但在某些方面还是起了促进作用。"

自解放大军渡江之后，横扫蒋军如风卷落叶，战戈指处，苏、杭、沪、汉、九江、南昌等城市相继解放。北京城中，捷报

频传。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新政治协商会议加紧筹备。在这庆祝胜利的一片欢腾中，父亲先后应邀参加了董必武、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欢宴，同林伯渠、冀贡泉、杨秀峰、于力、樊弘、沈钧儒、柳亚子等进行欢叙，应柳亚子所聘，为北京文献委员会顾问（柳亚子为该会主任）。六月七日，又应董必武、吴玉章、成仿吾同志的邀请，到华北大学（后改中国人民大学），为该校干部和政治研究所人员，以其校训“朴实、虚心、忠诚、团结”为题，作了即兴演讲。在同庆胜利的欢悦中，党中央领导同志一如既往，给父亲及时指明了前进方向。六月十三日，董老与他再次长谈后，赠给他亲笔题名的《列宁文选》和《列宁主义问题》，以供学习。七月一日，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三万人盛大集会上，叶剑英同志在天安门给我父亲专门谈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指示，启示他以今后继续努力奋斗的方针。尤令父亲难忘的是，在当天中央统战部在怀仁堂举行的盛大晚会上，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渴望统一

建国以后，中央一再留我父亲在京工作，父亲坚决不肯。当时他表示革命成功我还乡，和家人团聚，为桑梓效力。到山东后，经原山东省党、政、军负责人的挽留，同意留山东工作。父亲在山东，曾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山东省土改委员会委员和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并历任省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等职。（参看附图5）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父亲象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一样，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敬爱老一辈革命家；并同

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各界的故友，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和交往，时时关心着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同时经常同董老、李济深先生互通函问，交流看法和意见。他在工作上勤勤恳恳，积极努力，开诚布公，待人以诚。在生活上一贯俭朴，布衣粗食，从来未向组织上提过个人要求。更可贵的是他相信党、热爱人民，深刻了解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即使在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中，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目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更感欢欣鼓舞，表示竭诚拥护。象他不畏艰险，在严酷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度过了他的中年时期一样，在竭诚努力地完成党交给的每一件工作中，度过了他的老年时期，保持了晚节，受到党的敬重，得到人民好评。

父亲对经学素有研究，章太炎在临终前曾对他在这方面有过高度评价和嘱望。一九三八年，在奔走抗日的间隙，他撰写了《老子注疏》，由景定成为序，同时还写有《大学正义稿》。解放后，他曾先后在北京、济南为古籍研究者讲解《周易》，并写成《周易正义稿》。当年蔡元培先生赠他的一部《同文尚书》，他一直带在身边，经多方校订，终于写成《同文尚书校注》。他还在同董老、卢松安、王驾吾、顾颉刚、黄淬伯等经多次研讨后写了《孔子编年》，并三修其稿，在“批孔批周公”的喧嚣中，以为孔子的历史贡献正名。他在任全国文献委员会顾问和山东历史学会委员期间，曾多次参加有关学术会议，就许多问题发表了学术见解，受到知识界著名人士的敬佩。到晚年，他尤其重视对后学者的提携与指导，诲人不倦，细致入微，使聆教于座下的许多同志在学术知识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使人特别不能忘记的，是父亲对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殷切关怀，为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所做的巨大贡献。尤在他的晚年，更是对此朝暮萦怀。为了说明这一点，也为了表示对他的纪念，我可以择出父亲生前写的怀台旧友诗的其中几首，稍加说明，以见其

爱国主义的情怀。

一九七九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一周年之际，父亲发表了对台录音谈话。最后，他赋诗道：

“去年大酺玉楼春（当指全国第五届人代会和第五届政协会议召开），好事近时思远人。本是同根生故土，何曾爱国问疏亲。欣看佳节百花放，忍使弟兄一水分。盼得画堂重握手，鹿鸣早唱宴嘉宾。”他在这里说道“好事近时思远人”，平时确是如此的。每逢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大事件，以及万众欢渡年、节之时，他总是更加牵念虽一水相隔但不能往还的在台故友和亲人。此时，吟诗以抒胸襟，著文以论明义，启以爱国之心，晓以明达之理，召唤彼方归来，就常常成为他享欢乐、渡佳节的一种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在欢悦中，忆起往昔与故旧的交往，写了一首《长相思——遥寄张岳军和在台诸友》的诗。他在序中说：“罪宣四丑、会庆三中，举国同欢、薄海共贺。当四化举国之际，万众协助之机，凡我同胞志士，医国虽各有方，爱国则无二致。统一在望，遐迩一体，每读陈思其豆之句，体放翁嘱祭之情，遥念去台老友，辄不知泣涕之何从也。爰缀词名，组成小诗，寄呈张岳军、张励生、张道藩、罗家伦诸先生暨诸友好。想诸公读之，抚今追昔，亦有同慨。深愿同本先贤礼运大同的思想，及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主张，以天下为公为怀，‘同志仍须努力’惠然肯来，易长相思为相见欢，快何如之。”诗曰：

当年忧国话同心，可惜分飞直到今。
鸟夜啼时月下笛，含悲忍听水龙吟。
乐园天下亦同忧，如梦前尘忆旧游。
南浦阳光曲有恨，等闲白了少年头。
小重山外水迢迢，独倚楼头望海潮。
深巷卖花声声慢，凤凰台上忆吹箫。

丑奴几灭定风波，宝鼎现来喜事多。
大浪淘沙泾渭别，沁园春色今如何。
探春信有隔溪梅，疏影暗香冒雪开。
海内尽多知己在，应随皓月伴云来。
休将萁豆怨相煎，爱国何曾分后先。
四海一家今日事，神州九亿盼团圆。

中秋月圆，象征着骨肉团聚，历来分离的亲人常由此触发离愁别绪。父亲的仲秋诗，正表达了他思念台湾同胞的情怀。一九七九年中秋，他到济南名胜地大明湖赏月。晚风萧爽，柳丝荡波，月明天净，山影重迭，轻歌流连。这祖国的美好风光使他油然想到如水月光同照下的台湾，不知有多少人远望大陆，对月长吁，黯然神伤。他衷情难已，归来后，便写了《中秋月下怀台湾友好》诗：

西风惊客梦，独眺明湖边。
人间他乡老，月仍往岁圆。
晴光接台水，秋色淡齐烟。
怅望增离绪，归来忆昔贤。
历下多名士，古亭阅岁年。
开筵传北海，引领望南天。
杜句原铿尔，辛词亦焕然。
神州人九亿，何事不团圆。
卅载离群感，今宵倍惘然。
相思应白首，举酒问青天。
爱国原同德，金瓯愿早全。
何当重聚饮，人月庆双圆。

“金瓯愿早全”，这正是父亲的极其殷切的愿望。一九八〇年中秋之夜，他仍然是在怀念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中渡过的。这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中秋佳节。他在这天写的《中秋月下对

竹怀台湾友好》。诗中说：

几处龙吟有共鸣，森森凤尾同根生。
虚心久许松梅友，直干惯和霜雪争。
情自死生别后见，月曾三百六回明。
山重水复岂无路，一夜秋风万里情。

随着整个形势的好转，我国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日俱增，思想学术界也出现了活跃繁荣的局面。一九八〇年春，几位同志请我父亲介绍孔、孟、老、庄学术思想时，曾就儒家“仁”的观念展开讨论。父亲结合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谈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讲学活动中，面对时代、环境和听者的身份，他即多以阐发“仁”的思想为主要内容。他说，因为“仁”的根本问题，即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一点，是任何人无法拒绝的。往事之鉴，今日之师，“仁”的思想仍有其现实意义。今天的“民之所好”为何？“民之所恶”又为何？自然是身居台政而执其要者亟应审情考虑的问题。就这年三月四日，他写了《寄奉化蒋纬国连长》诗：

忆昔论文客漠中，流离颠沛讲中庸。
惟精惟一谈忠孝，久执厥中欠权衡。
舜禹堪称大孝人，疏河焚廪试重论。
顺亲干蛊皆因孝，务孝作忠总为民。
爱国爱民各怀忧，胡不归来共运筹。
试看五洲方震荡，应为人类赋同仇。

父亲一生以国家民族大业为己任，老来不能亲睹祖国统一，终为憾事。由己及彼，他曾感慨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渡海到台湾，胼手胝足，开垦建设，并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这块宝岛，这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说明了中华民族的生存领域不容割裂。近三十年的不幸分裂，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其中台湾人民在精神上承受的负担和损失最大。随着岁月的流逝，台湾同胞怀乡思亲之情与日俱增，我们也更加想念台湾骨肉兄弟。人生易老，时不我待，回想多少爱国志士，未能亲见祖国的统一，饮恨长逝。言念及此，怎能不振臂高呼！对于海峡两岸人民“生死家书无一字，少陵来识此重哀”的痛心局面。父亲总是瞩望在台的明智之士适应潮流，顺乎民意，以大智大勇的精神，早作决断。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南京“同李宗仁、顾祝同、吴忠信先生的一次会晤中，我曾直言相告：‘未有弃亲即异，危其根本，而能全躯长世的。’这是从我国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真理，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先生归国后，与我曾数通音问，他在实践中，对这条客观真理有了深刻感受。……现在，国际局势的变化，需要我们尽快的统一；国内四化建设，需要我们尽快的统一，没有任何理由再迟误不前，坐失良机。我们应以国家民族为重，要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建树新功，作民族统一的功臣。这样，才不愧为炎黄子孙。”他在一九七九年，《给何敬之（即何应钦）的信》中，发出同样的劝告和敦促。直到父亲去世前不久，他在游杭州西湖后，还写了《重谒岳墓有怀寄台湾诸友好》，表达了这种愿望，呼唤旧友早日归来看看祖国的新貌：

平生母训在精忠，爱国从来古今同。
虽说浮云能蔽日，英雄毕竟是英雄。
抗日当年如抗金，救亡本是有同心。
阋墙纵误一朝忿，兄弟忍看异族侵。
依旧西湖似美人，浓妆宜夏更宜春。
思乡老友情何限，愿睹江山面貌新。

统一祖国，实现四化，这就是父亲的遗愿。追念父亲的一生，他实现了少时所立“问国家事”之志，自始至终都在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地追求真理，自始至终都在苦以砺志，乐不忘本地

为民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想起这些，我们更应以先辈的遗愿激励自己，肩负起他们的未竟事业，去继续努力！

溘然长逝

前面所写，是我父亲生前在党的领导下的略历。现将我父亲与世长辞后，组织上给了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刘子衡同志是我党的老朋友，是革命队伍的老同志。"

父亲生前友好发来之挽联、唁电、唁信等简列于后：

就山东省来说，父亲追悼会时，以中共山东省委为首的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领导同志以及省委各部办、省政府各厅局、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均送了花圈。就济南市来说，以中共济南市委为首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也送了花圈。此外，山东大学、山东师大等院校的负责人、教授、专家、学者除参加追悼会外，并送了花圈。

全国各地敬送唁词、唁电、唁函、挽联的有：浙江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著名教授王驾吾（字焕镳），老伯的挽联是：

贤契兄子衡先生　　安息

以余年治学以余年著书策己励己

为人民讲和为人民非战念兹在兹

契愚弟　王焕镳哭挽

北京，全国著名书法家，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百零四岁老人，孙墨佛老伯的挽联是：

追悼老友日观峰道人刘子衡先生五律二首

其　一

日观峰头鹤，长鸣不可闻。穷经尊贾郑，研易仰周文。立志追五典，决心续三坟。十年未见面，洒泪吊斜曛。

其　二

噩耗断瑶琴，失声痛在心。闲话言充耳，感怀泪满襟。痛哭孤鹤唳，悲歌老龙吟。天开文运日，何处访知音。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百岁老人孙墨佛哭挽于北京

山东省体育学院付院长，曲阜二师的同学田友龄叔叔的悼词是：

学者之师心存人民同此喜怒哀乐

大地之子身卧大地仰观日月星辰

田友龄　敬挽

天津，书法家王侃如老伯和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会员王梦仁伯伯弟兄俩书送挽语：

子衡如兄　千古

学术称大师立德立言声望允孚君不朽

交谊逾手足为师为友哲人其萎我何堪

弟：王梦仁鞠躬敬挽

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文献研究室主任，著名教授，我父亲的同学王先进老伯等借蓄阳山、水、人、物而抒怀言道：

百泉滕涌山水秀，物产富饶古乐园。

人才横溢泛天下，吾与斯人话尧天。

敬致唁电、唁函和挽联的还有：

江苏省徐州市，鲁迅先生生前好友时有恒先生；

北京，书法协会主席，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

山东省滕县，著名中学教师，抗战老人，擅书法、篆刻，父亲曲阜二师同砚，陈慕唐老伯；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负责人之一，中华书局副总编，“二十四史”的标定者，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的夫

人张静秋伯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书局党组负责人，原东北人民大学校长，《歌声》、《北极星》、《记一辆纺车》、《烟尘集》的作者吴伯箫老伯；

黑龙江省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教授吴忠匡老伯；

山东省政协常委，原山东大学副校长，父亲青岛大学同学杨希文老伯；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外文社研究员，《王子复仇记》的翻译者卞之琳老伯；

北京，《诗刊》顾问，全国著名诗人，父亲生前青岛大学同学臧克家老伯；

全国鲁迅研究会会员，全国茅盾研究学会会员，全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杭州大学的王欣荣老师并送挽联；

杭州市，美术协会会员，画家潘渭滨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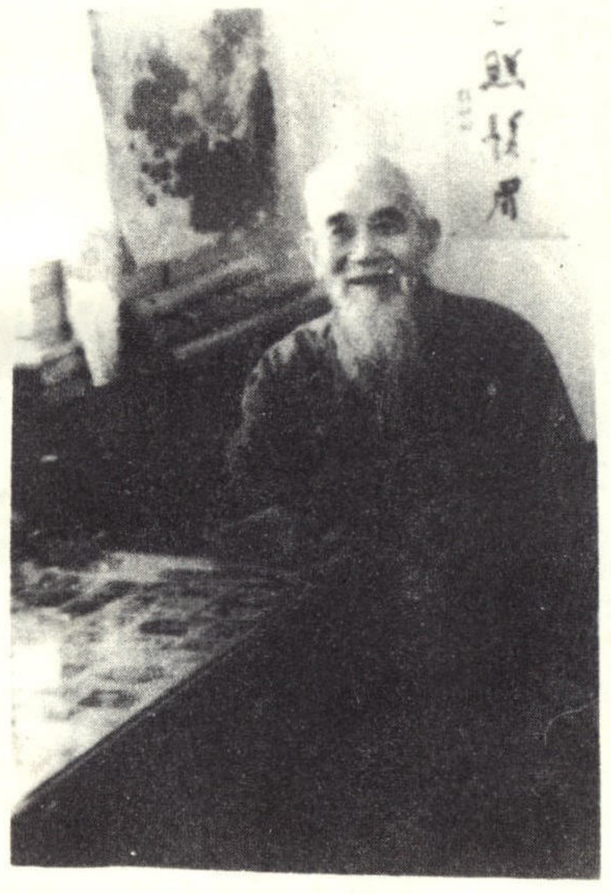
编后附言

刘曾莹，滕县人，现居济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刘子衡先生长女。应本刊特约，刘曾莹同志抱病撰写了这篇感情真挚、内容翔实的回忆文章。特附笔致谢。另，刘曾莹同志期望深知刘子衡先生经历者，对本文多提补正意见。文内标题是编者加。



（图一）

右一李济深　　右二刘子衡



（图五）　刘子衡先生遗像


大公報
中央銀行應如何對付
打不得！
英蘇反對美代管日德島嶼

（图二）

《打不得》一文，发表于1947年2月7日的上海《大公报》上。



由平南來神秘客之一

劉子衡昨晨抵滬

據稱此來係私人行動擬留一日

（三图）

1949年4月10日，由平南来神秘客之一，刘子衡（左）抵沪，在上海北站与《申报》记者（右）谈话。

和談進行情形良好

劃江分治問題尚須續

于右任等一行今午

劉子衡發表和談聲明

在京國民黨立委集會

討論組聯合機構

（图四） 1949年4月15日，刘子衡在《申报》发表和谈声明。

清末翰林高熙喆

高竹澳

今年是高翰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这位老人是清朝末年的官吏。他为人刚正不阿；为官克勤克俭。至今，他在宁夏、宣化、大名出任知府的事迹，还被群众广泛地流传着。

高翰林，出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三八年，名熙喆，字仲瑊，滕县人（先世自浙江会稽迁滕县）。一八八二年中举，一八八三年中二甲进士。曾任国史馆协修；甲午科山西正考、御史；一九〇四年后历任甘肃宁夏知府，直隶宣化知府，大名知府。民国成立，挂冠而去，在家隐居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八月病终于县城东小北河村，享年八十五岁。

一

一八九九年底，翰林官御史。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除了根据它们在中国划定的势力范围，继续从政治上、经济上疯狂进行侵略而外，更加恶毒地利用教会作为侵略的工具。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以传教做幌子，拉拢引诱一些豪绅恶霸，流氓无赖入教。这些所谓“教民”，又倚仗着教会的侵略势力，为虎作伥，欺压人民。因此，山东人民奋起反抗，这就爆发了震撼中外的由朱红灯和心诚（本明）和尚领导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清政府大力镇压，又派遣了大刽子手袁世凯来山东任巡抚。他屠杀了无数无辜的人民，给山东带来了极大灾难。正值袁世凯祸鲁之际，翰林曾

向皇帝屡上奏摺，痛揭袁罪。当时有四份御史奏参袁世凯的奏折抄件，黄桂钧的奏折中说："……若袁世凯此次到任，开诚布公，持平办理，民心既服，教案可迎刃而解。万一稍涉张惶，激之生变，则拳民铤而走险，势所必然。"奏折请求皇上颁发电旨，饬令袁妥筹办理。（摘自《庚子风云》）

"如果说，黄桂钧的奏折语气比较温和的话，那么，御史熙麟、高熙喆、许祐的三份奏折，完全是撤换袁世凯了"。又写道："但是熙麟、高熙喆、许祐几个人，……他们是恣意与抚院大人为敌，真有不相两立之概"。《庚子风云》

由此可见，翰林为了解脱山东人民的灾难理直气壮，伸张正义，敢于驱逐奸佞。

一九〇四年，翰林接受吏部按例放任甘肃宁夏知府之职。主裁严峻，下车伊始，即先将署内一切门包陋规革除尽净，减裁旗锣仪仗，严禁胥吏敲诈。历年来，地方弊窦丛生，翰林上任后，明查暗访，赏罚兼施，倡讲学，易风俗。号召养马采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后来，冯玉祥先生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有所记载："我到宁夏，就问邵道尹曾听说这里从前有些什么好官和坏官？他回答说：'还没有打听过'。他道：'志书上没有'？我向地方父老问悉，民国前有山东滕县人高熙喆老先生为翰林出身，任此间知府，上任时，两匹骡子，拉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的夫人，他自己跨在车子外边上坐着。在任数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是他夫人做的。这里所筑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黄河年年成灾。高老先生着手改造，每日带些干粮及待批阅的公文，打成一个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监导民工筑渠。一连五、六个月，不问风雨，从不间断。渠成，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真是万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罢官归田，百姓送行数十里，依依不舍。此为宁夏百年来最好之官。后来我到泰山住，曾与高老先生见面。那时他已八、九十岁，身体

很健康……”。

宁夏地方回汉族杂居，常起事端，尤其在左宗棠抑回政策的影响下，经常引起回汉斗殴，翰林尤致力于教化。在宁夏谋兴学，择官地，起学舍，捐贮书数百卷，亲临讲坛，向回汉学生讲书，沟通回汉族感情，共同守礼守法，消除民族间隔阂，也是宁夏兴办学堂之始。

宣统元年，翰林调大名任知府，性节俭，好读书，不携眷属，不用门丁，唯一老人供使之，皆称为廉吏。后来又调宣化任。所至，除积弊，去仪仗，劝学倡俭，奖励生产，各地方志皆有记载。民国诞生，因避袁世凯之报复，隐居胶东，直至袁死，他已年逾花甲，方始专心著述。其著《诗迹》是考证《诗经》的。当时交上海商务印刷馆排版，正值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炮击东方图书馆时，同被炮火毁烬。

二

翰林归隐著书，正值连年歉收，每逢春荒，饿殍载道，翰林独资煮粥赈饥，每天门前聚饥者分粥散饼，从早到晚未有间断。直至麦熟，才停炊粥。

抗日战争爆发了，韩复榘闻风弃济南而逃，日军从济南不十日达邹县，进驻两下店。滕县形势日益紧张，地方绅士惶恐不安。他们聚集在商会里讨论应付即将面临之势，议论纷纷，各抒己见。“抗”、“顺”如同冰炭，久久不能统一。翰林舌战群绅，绝不当日军的顺民，发言后，拂袖而去。一群肥耳凸肚的大亨和醉生梦死的财东们为了保命，擎旗担酒，前往邹县迎接日军。翰林听说了，勃然大怒，斥责奸邪，愤然而起，立命子延柳，即时备车，弃家远避。这些劣绅安心做日军的顺民了。唯有翰林实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言。

当翰林率领全家逃避日军起程时，有轿车、手推车、二把手车，还有骡马运输工具，已是浩浩荡荡的行列了。一家在前，各户效尤，乡亲邻闾，尾随其后。顿时全城沸腾，四散奔逃。车马衔接，彻夜不绝。远近村庄，星火点点，犬吠鸡鸣，夜行道上儿啼媪泣，人喊马嘶……。这就是四十七年前，滕县城居民逃避日军残杀的——俗称“逃难”离城的凄凉景象。

翰林携眷逃难，进入深山，遥望故乡，烽火蠹天。守卫家乡的英雄们实践了“与城共存亡”的誓言——拼死杀敌，荣为国殇。翰林痛国土沦丧，悲乡亲遭难，徒恨自己髦髯龙钟，难酬疆场报国之愿，呜咽涕泣，悲不胜悲。年高八十五岁的老先生由于过度悲痛致病而逝世了。在他弥留之际，遗命子侄对日本侵略者永不妥协，衔恨而死。正直爱国，大气凛然的高老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

（高竹澳，滕县曹庄人，系高翰林后裔。退休教师）

滕县医林人物史略

滕县卫生志办张存明、马同如

我县地处黄淮平原，依山傍水，气候温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据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证实，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里和中原地区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人类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生产力逐渐得到发展，社会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这也是医药学起源的条件。滕县医学起源较早，发展也较快，其间有不少比较杰出的医林人物，延至现代，更是名家辈出，经验著述丰富。其钻研医术之努力，治学方法之严谨，医德之高尚，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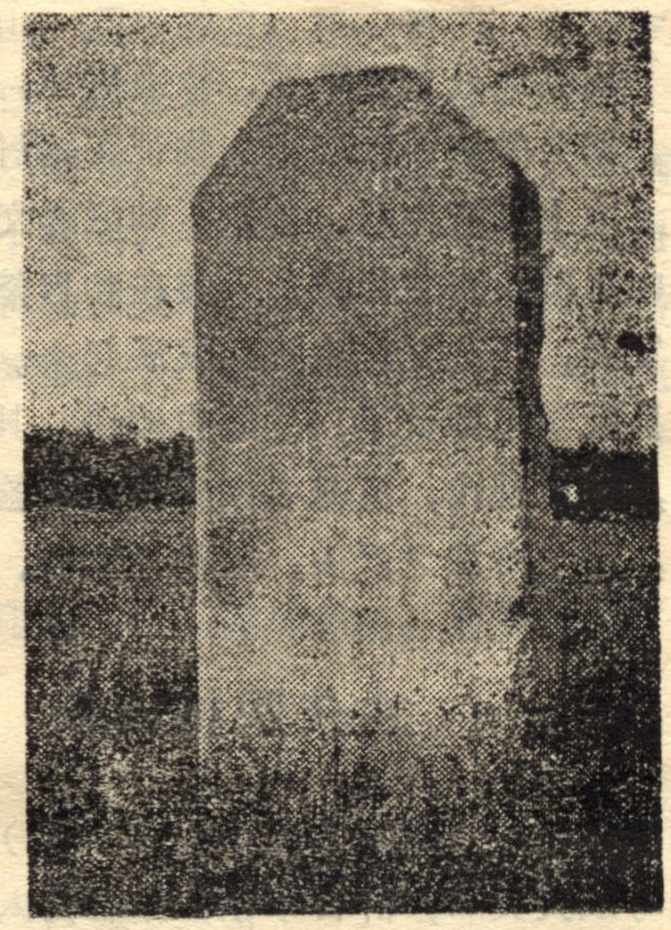
一　古代医林人物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月不详）春秋时徐人（一说宛人）。佐勾践灭吴后，辞官不做，乘轻舟入海，遨游五湖，改名为鸱夷子皮。后游于齐，居于陶（山东定陶），又名陶朱公。他有服饵之法，遂弃其亿万家产，以医济人。他到兰陵卖药，途经昌虑（现滕县羊庄乡土城），定居于昌虑之华采山。因其以医药济人，不取利，故后人因地建祠，以资纪念，并将华采山改名为陶山。

李勣，字懋功（583—669），唐初大将。离孤（山东东明县）人，本姓徐，名世勣。后因避太宗讳，单名勣。初从翟让，附李密。归唐后，屡立战功，武德初，封英国公，赐姓李。以医鸣于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勣与长孙无忌、苏敬等

奉诏重修本草，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修成《新唐本草》（又称《新修本草》、《英公本草》），颁行全国。英公于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赠太尉，谥贞武，陪葬昭陵。

武则天执政后，对唐宗室诛戮殆尽。其孙徐敬业，乘民怨起兵，兵败，祸及其宗。诏将徐勣墓掘暴骨，抛沉东海。钦差将其遗骨运往东海，途经昌虑城。因徐勣曾被封为东海郡公，德高望重。沿途群众遮祭徐公者，络绎不绝。差官患阻遮，遂弃遗骨于昌虑城东之石楼村前（该处原有古墓近千，环境优美），于是在此建墓立碑。后又为武后发觉，掘平坟墓，火焚其碑。及至中宗反正，才诏复勣官，复葬立碑。其子孙迁居于昌虑东之石楼村，尔后子孙繁衍昌盛。金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其十七世孙徐琳，复立其碑。碑身高大宏伟。屹立广野，现石碑仍立于原址。



（徐懋功墓碑）

李浩（生卒年月不详），元初，滕县人。其五世祖官于滕。李浩少习文，喜医术，慕仓公之为人。其医术甚精，元初常往来于东平间，为人治病，决死生，其验如神。晚年著有《素问钩元》、《仲景或问》，对医理和药性，阐发甚精。其子李元，随其学习，以医侍元世祖。窦文正（默）幼从李元学医，后成为明代针灸大师。

孔继葵，字甫涵，号云湄，孔子六十七代孙。生于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滕县

人。乾隆丁酉科（公元1777年）举人。为滕县乾、嘉年间名医。在瘟疫盛行之际，民罹其苦，危殆颇多。而医者各执所见，却于病苦无见。孔氏同情百姓疾苦，曾于乡里施药，对患者依其轻重虚实之异，授以不同之药引子，服者皆获全愈。愈者甚众，万民感德。

孔氏由学儒而学医，涉猎广博，尤精伤寒。他上宗仲景，贵在神似。对古人经验每多发挥。损其太过而济所不及。如《医鉴草》卷三记，治满景华少阴热化，复感于疫，表里同病案。尽改前医方剂，采取养阴、清热、利小便之法治之。诊断记曰："病在少阴，则从少阴立治。膀胱一途，少阴之近路，即邪热之去路也。表药何为？强用表药，引之使喘，迫之动血"。因而他在仲景立法的基础上，悟出甘寒佐以和解之剂，以化阴气，利小便一法，为前人所未及。他研读古方书，皆能得其要领。然以方剂所不及，故从古方书所领悟，加以临床验证，以病刊案。晚年著《医鉴草》（又名《一见草》，含医理无穷，不敢执一见以蔽众见之意），此书为总结病案，研讨临床治疗之著述，主要阐明病机，推理病变以及预后等等。尤对疑难病症，论证甚详。抉微索隐，要而不繁，实为临床医著之佳作。现有三种版本。所惜孔先生去世时，其子不懂医学，将孔先生其他之病案记录、医药著述，一并殉葬，浑金璞玉，无法发掘，实医界一大损失。

刘培玉，字充儒或云洪儒。清乾隆间人。人们都知道这位老先生天性爱人，遇人有危险苦难，就尽力相助。

他擅长医学，精通各科，尤对小儿天花病，达到入化境界。每遇垂危病儿，其他医者束手，先生常能治愈。刘培玉先生特长于望诊，经验丰富，这是先生细心体察，认真总结的结果，常能断人生死。一次路见弃儿，他仔细观察后，认为小儿未死，便从村里叫来其家人，令将弃儿抱回，授于药方医治，果然复苏，不久病愈。众人相传，刘培玉先生"以相济医"。而先生救治垂危

病人，也确乎免掉了一般诊断程序。单凭望诊而作出正确判断。从先生住村西北十里许，有一吴家海子，他喜往钓鱼。一次他正全神垂钓，对岸有人跪求治病。先生说此间距渡口甚远，可将患儿抱来，使其哭。哭数声，先生讲述患儿病苦情况，十分准确。然后嘱患儿家取药若干付，服后病除。

先生医德高尚，风格脱俗。他以医术济世，不分贫贱富贵，一视同仁。由于他医术高超，登门求医者甚众。每晨求医者盈门。先生慢慢走出来，不看谁是熟人，谁是权势，而按先后到达次序，逐一诊视。对那班高车驷马，权势煊赫的人，也不给优先。

某年夏季，天气酷热异常。在村子北面渴死一人。此人是章丘行商。先生详视之，认为此人未死，便使人抬到客舍，这些人又害怕、又厌恶。可是刘先生非要他们把这个人平卧在地上，用微湿的细沙，拥培与身体平，但绝不能埋住下巴。然后先生就坐在一旁静候变化。大约一个时辰，那人有些微动，又稍待，略能伸屈，进而又长叹一声，此人已经苏醒。商人的同伴听后，把他扶了回去。几天后，这个商人衣帽整齐，前来致谢。先生留他饮宴，欢笑一天。刘培玉先生救人生命，不图报酬，一生未尝杀牲，著有《孝慈真诀》传世。

生作梅，字百魁，清国学生。约生于康熙（公元1662—1722年）初年，卒于乾隆（公元1735—1795年）年间。生氏以整骨为特长。约在康熙中期，由四方行医，改在滕县城西望冢村首创“济生堂”药店。自制正骨膏药。以其“善接骨术”，“专治跌打损伤”而闻名远近。据《生氏族谱》记载：“生作梅，自制膏药，善接骨术，常合药以疗人跌打损伤”，验者唯膏药一方。随其所患，加以药力，能使所伤之筋骨，仍复于旧。“誉望遍于鲁西南及苏北地区”，深受群众欢迎。

先生整骨多采用徒手正复法。归纳有按摩、拔伸、持牵、柔

摩、按压、托支、推挤、旋转、端提、捏分、捏提、反折、气鼓、屈伸、叩击等十五种手法。各种手法相互配合，助手协同。能使断者复续，陷者复起，碎者复完，突者复平，离者复还。对于颌骨脱位，肩、肘、髋、挠骨小头半脱位，略施手法，即可复位如故。对四肢长干骨折，多采用杉木皮小夹板固定，视其伤肢长短和伤势，随时制作适合伤处的夹板和布帘，以及各种形态的衬垫。将施过手法，复正对合好的伤肢，外贴膏药，垫好衬垫，先裹裹帘一至二周，然后随裹随放夹板，以白布带分三道扎之。遇多段骨折或大斜形骨折，扎带可增至五道。如髋骨骨折采用抱膝圈固定法。锁骨采用提篮系法。均能收到满意效果。

先生在治疗上采取内外兼治的方法。局部外贴正骨膏药，内服丹、丸、散或汤剂，使骨折愈合迅速。在内服用药上，区分早、中、后三期给药。早期以活血去淤消肿止痛为治则，中期以补肝、肾，接骨续筋，佐以调脾胃；后期则视患者体质和伤势恢复情况，采用补养气血，舒筋活络。

生氏整骨的另一特点，即采用科学的护理方法：动静结合。根据患者的伤势及受伤部位的不同，而采用合理的控制体位的护理法。上肢骨折脱臼，经复正固定后，采用屈肘中立位吊悬；干、颈部、下肢伤采用侧卧位或仰卧位。在时间上，一至三周内以保持伤处不动，但可适当活动伤处远端肢节。三周后则需经常变换体位。并注意伤处近端肢节的活动。凡近腕、踝、膝关节处之骨折，半月后换药时，则应在护持下活动关节，避免遗留关节软组织粘连性功能障碍。先生在临床护理上有着丰富的经验。认为骨伤科的起、坐、卧与活动，要有强烈的时间性。适时活动，可以增强血脉的流通，促进骨折的愈合。否则，活动过早，则可能导致骨折愈合畸形，过晚则可能导致关节强硬，均能引起功能障碍。

先生独特的整骨技术，其子孙世代相续。其曾孙生文敏，于

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迁居滕县城西李家店村，继开“济生堂”。同治（公元1862—1874年）年间，生保兹兄弟四人分居。生保扬另立“助元堂”。余三家仍承“济生堂”。一九一八年，为避战乱，生克中、生昌鸿、生昌仁等先后迁居滕县七道弯、西北隅、顺兴街、通衢街开设分店。相传十世，历时三百余年，疗效显著，经久不衰。生家正骨膏药堪称佳方，是我县久负盛名的传统自制成药之一。至今仍称誉四方，为人民卫生保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县医林人物甚多，人才辈出，在医学上各有造诣。但由于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医学地位低下，有无数医学家，虽然对医学贡献较大，因无官职，史书和县志，多无记载，著作散佚失传，难以详述，无法见其全貌。

二　现代医林人物

马兴清，字静斋，清末庠生。山东滕县城头乡东岭村人。生于一八九二年，卒于一九七七年。

马先生自幼聪敏，通经史，稍长，随祖父习医，苦读《内经》、《伤寒》、《医宗金鉴》等。心有所悟，医术大进。中年继承家传之外科。他认为外科之症，必须内治与外治相结合，方能效捷。临症多善用膏、丹、丸、散。如一九五一年治愈肛漏案。范××，四十五岁，冯卯乡对头沟人，患肛漏十余年，久治不愈，痛苦难言。给予自治三品一条枪，插入漏管，外用猪蹄汤（猪前蹄一条，黄芩、白芷、蜂房、当归、赤芍、川羌各等分），煎水外洗，二十天后，漏管结痂脱落。外敷生肌玉红膏，内服托里消毒散，重加黄芪，三十五天全愈。

对痈疽之类，认为应手术与内治相结合，主张应早期切开排脓，以使毒邪外出。否则，自溃后疮口难敛。一九四八年治一男

性病人，年已六旬。右背生疽（发背），大如手掌，形似蜂窝，色暗红，多头，壮热口渴，小便黄赤，脉细数有力，痛彻心髓。曾服用解毒汤之类，无效。马先生用“开户逐贼”法，以铍针开通脓管，排出脓液，使邪有出路。外敷生肌玉红膏，内服托里排脓汤，重用黄芪，二十八天全愈。

先生性纯厚、谦逊，医望遍于邹、滕、平邑等地。曾当选为滕县第六届人民代表，晚年著有《验方集要》，以传后世。

王玉珂，字鸣亭，山东滕县人。祖居滕县城郊七里沟，后迁至羊庄乡南塘村。生于一八七二年，卒于一九四七年。

王先生出身于世医之家，其祖父擅长疹科。先生自幼好学，熟读《礼》、《易》，随其叔祖习医。研读《内经》。擅书法，精丹青，好诗文，通琴艺。二十三岁时，歧黄术精，遂承袭祖业，坐堂应诊。他擅长内、儿科，虚心好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崇东垣、仲景学说。据“胃气为本”之旨，临症处方，多顾其脾胃，兼而去邪，疗效显著。医名称于乡里。对其祖父遗留的痘疹经验良方，深加研究，并在临床中加以完善，屡用屡效。在痘疹流行期间，婴幼夭亡惨重，求王先生就诊者，无不应手奏效，愈者无算，所以在群众中有“王神仙”之称。

先生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视贫苦病者如亲人，富贵贫贱，普同一等，并舍钱施药济贫。豪绅富贵之人，虽有重金聘请，他并不以金钱权势为重，赢得乡里称颂。乡里流传“穷人吃药，富人拿钱”足见其济贫苦之心。痘疹流行时婴幼儿死亡很多，他深感悯痛，奋笔疾书，将《痘疹经验良方》刊行于世，分发给同道、乡邻，同道交口称赞。

仇锡恩，字荫桐，山东滕县姜屯乡仇官庄人。生于一八四〇年，卒于一九一五年。

仇先生幼年攻读诗书，因应试落榜，乃弃儒习医。精研《脉经》和《医宗金鉴》等，涉猎群医典籍，行医乡里，五十余年。

医德高尚，遐迩驰名。他专事内、外两科，尤于外科独具创见。他认为治疗外科，疮、疔、痈、疽等症，应先辨明阴阳，阳症以凉药折之；阴症温之。溃前先祛其邪，溃后托之。尤其对疔毒症，主张早期通里泄热，以扫除脏腑火毒，佐以疏风凉血，诚为上法。对破伤风的治疗，分为虚实两类，实者祛风散邪，搜剔邪毒；虚者采取温补祛风解毒的药物，装入布袋内，合鸡同煮，食肉喝汤。用此方治愈病人甚多，至今广为传诵。

先生毕生研治疯狗咬伤之症，并取得了切实的效果。因为当时社会制度腐败，民不聊生，城乡疯狗颇多。常有被疯狗咬伤而致死亡者，给群众造成很大的痛苦和恐惧。先生乃潜心钻研，大胆尝试，经数年努力，终于研制出“丁药”一方，外用于局部，明显减少了发病率，深受群众赞扬，被誉为外科名医。苏北、鲁西南地区远道求医者络绎不绝。先生之于外科，确有独到之处，可谓手到病除，妙手回春。其医术已相传四世，在我县医学界，颇有影响。

李广耀，字子明，山东滕县羊庄乡长城村人，后迁至山亭乡刘庄。生于一九〇五年，卒于一九八〇年。

先生幼读四书，书过能诵。十四岁到“泰益堂”学徒，从师于葛天朗先生。由于勤奋好学，医术大进。后又参加天津国医学院函授学习三年。于一九三八年开设“天和堂”，自为堂医。先生苦读医书，如痴如迷，对《内经》、《金匮》等经典著作，及所崇尚之医籍，如《医药顾问大全》等，随口背诵。他研读医籍，极为精心专注，读过之处，均加小注及心得。博学多采，医理愈精。据说先生熟察名家医案，对某症、某方、某言，载于何书、某页，引证准确无误。可谓“业精于勤”，不负辛苦。于是医名传播远近，求医者络绎不绝。

一九五九年，治一葡萄疫，高某，女，十六岁。发病五天，初起寒战高烧，心烦呕吐；继之昏迷，身起紫癜。三天后，全身

皮肤变为紫色，有的部位红肿或脓胞，双眼角膜溃疡，体温40.5℃，口渴、多汗、苔黄厚、脉洪数。诊断为“败血症”（葡萄疫）。确诊后，给予羚羊散，生犀饮加减（犀角12克（冲）、牛子9克、防风3克、元参24克、羚羊粉3克（冲）、寸冬9克、黄芩15克、知母12克、双花30克、连翘15克、黄连12克、板兰根24克、赤芍9克、丹皮9克、桔梗3克、竹叶9克、龙胆草9克、甘草3克）。据情况加减，服用六剂，诸症皆除，全愈出院。先生认为，此病为素食辛辣之物，加之劳累过度，元气受损，疫病之邪乘虚而入，与内伏之热合而为病。疫毒壅盛，陷入血分，外发肌肤而成葡萄疫。所以治疗应以清热解毒，凉血化瘀，后期热盛伤阴，酌加调之养品。

先生不仅对内科诸病医理精湛，对妇科亦颇有造诣。他认为，治疗妇女病应与常人一样，寻因施治，不能一味调养气血。如一九三九年治青年妇女颜某，十九岁。患者于十四岁月经来潮，十七岁停经，已经五年。望之面色萎黄，身体瘦弱，肌肤甲错。问之，五心烦热，午后尤甚。无汗干咳，按腹部左肋下有一包块如掌大，坚硬。脐周围有包块三个，时聚时散，并大便见蛔虫，脉涩滞。病属虫积经闭，当以杀虫为先。以剪红丸加减（槟榔60克、贯众15克、三棱12克、文术12克、木香15克、川军9克、二丑6克、雷丸15克、使君子15克、榧子15克、鱼甲24克、枳壳9克、桃仁9克、红花9克、芜荑12克）服一剂后，泻虫一条，粗如手指，长约一尺。上方加重剂量，又服二剂，虫已泻净。给予大黄䗪虫丸，每日三次，每次三克。服至120克，经通面色润，饮食增。唯左肋下硬块如前。遂改外治，以透骨草120克（研细），生桃仁若干，捣烂如泥，芒硝120克，共轧成膏，外加六神丸100粒，均匀摊布上如掌大，贴在包块处，一贴而愈。婚嫁后，生育儿女，一如常人。先生认为，此病是虫积而致血枯，故先驱虫，而后治淤血，否则虫积不去，正气愈伤。

先生生前虽然诊务繁忙，但对前人及个人的经验却很注意总结，临床笔记，达几十万字。他认为《华陀方集》较为实用，遂逐一验证，留有《华陀方试验录》一书手稿。晚年著有《李广耀医案》。

李济民，字兴邦（生于一九〇四年，卒于一九七八年），滕县岗头乡阳关村人。自幼慧敏，聪颖好学。通《易》、《礼》，善书法。其家历代业医，随祖父学习，攻《本草》，诵《内》、《难》，精研歧黄。为求医术之精，奔走就学，于一九四〇年，曾远赴天津，从师于清末翰林学士，著名国医尉家谦。三年后又考入“天津国医函授学院”，毕业后以行医为业。

既注意借鉴前人的经验，又不墨守成规，是李先生的长处。他善于从临诊中总结经验，对各科疑难病症，有较高的医疗经验，尤精于妇科。他认为，饮食起居、劳逸，应适当调节，否则会引起很多经病。本着“凡医妇人，首重调经”，“经过则安，经调则病除”的原则。他治妇女病，重视健脾胃，因妇女以气血为主，气血充实，则为常，而气血又为脾胃所化生。继以调肝肾，肝肾调则阴血得以养。用药上除按方施治外，常择经验之药以配伍。如清经多用芩、连、栀、柏；补虚多用参、术、归、苓；行滞善用川芎、香附、青皮、元胡；固经则以牡历、赤石脂、棕炭、侧柏炭为主；而气虚下陷多用柴胡、白芷、升麻、升举之药。因其症、施其方，随症加减而用之，鲜有不效。如治齐爱兰，三十岁，月经过期不至案，自诉胸膈满闷，腰酸疼痛，认为属气滞血淤之故，采用过期饮加减，一剂轻，再剂愈。

先生对产后诸疾颇有见解。认为产后疾病，病因大致有三，一是失血伤津耗气；二是淤血内阻；三是外感或饮食房劳所伤。主张当以大补为主，慎忌发表，虽有杂病，以末治之。宜先固其气血，行其淤滞。药喜甘温，不可过用苦寒之品，苦寒之药，易伐生发之气。司命之工，详察症候，诊断准确，使产妇早日恢复

健康，是为至要。“只有补其虚，才能治其病”，所以对产后诸疾，善用八诊汤、归脾汤、补中益气汤等方剂。辄见效应。

先生对不孕症的治疗，亦多获效。认为肝肾不足，血虚内淤，肝郁，痰湿等原因，皆可引起，临症应详察，肝肾亏虚，多为子宫发育不良，内分泌低下，宜用养精种玉汤；气血虚弱，多见贫血或久病之人，宜用八诊汤加滋肾之品；痰湿者以形体肥胖为特征，常伴有甲状腺机能低下，以二陈汤加香附、川芎治之；肝郁者多表现为经前期紧张症，可用丹栀逍遥散。曾治中年妇女常美荣，三十七岁，结婚十四年未育，其夫多方检查无病。望之面色青白，形体肥胖。问之，平时咳吐多痰，劳累时气促体酸，舌苔白腻，脉缓滑。属湿盛痰多，气机受阻，躯脂闭塞胞宫，使精子受阻，不得受孕。治宜理气去痰，方用涤痰汤加减（白术9克、云苓9克、陈皮9克、半夏9克、当归12克、川芎9克、香附9克、甘草6克）。服用上方八剂，面色少红，痰喘已止，身觉轻快，舌苔、脉象正常。以上方加杜仲15克、紫石英12克，又服五剂，已如常人。年余，生一男孩，夫妇同来称谢。

李先生性情和蔼、谦逊，平易近人，有求必应。一九六四年乙脑流行，先生采用白虎汤加减以治之，使死亡率下降，名扬邹、滕、微山等地。晚年广积验案，著有《验方集锦》、《李济民医案》，以传后世。

张桂森，字子岩，山东滕县辛庄乡班珩村人。生于一八八六年，卒于一九七五年。

先生幼承庭训，绍继医业，后又求学于峄城“中和堂”，医术逐步提高。返回本村，悬壶济民。擅长内、妇科，凡就医者，不择贫富有求必应。医德高尚，乡里称为贤善之医。

先生不但医德重于乡里，其辨证用药亦为后世之范。一生不喜用贵重药品及大方，但投之效如浮鼓，动中肯綮，并理论精

辟。

如机关潘女士之胃痛症：胃脘隐疼，萎黄无华，心悸怔忡，体倦食少，经量多，色淡、脉弱，苔白质淡，缠绵数月，诸医罔效。先生诊之谓此乃心脾内亏之胃痛也，投以归脾汤加远志、五味子、谷芽、元胡。三剂痊愈。或问，俗云“诸痛无补”，先生为何用补药治胃痛也？谓“诸痛无补者，言气逆郁滞也，然壮者气行则愈，怯者着而成病。真气虚乏之人，诸邪易于留着，着则逆，逆则痛，疏刷之中，不可无补养之品，徒事攻掣则正愈虚，邪愈着而痛无休止也。再如脾胃亡液，焦燥如割者用养胃汤，腹中急痛用小建中汤，肝血不足，两胁胀，用补肝汤，肾虚羸性之人，胸膈隐痛则用萸肉、破故纸、枸杞、当归、白芍之温肾养血之品，皆不可无补也”。

先生悯赤子而慈幼，故治小儿之疾多奇效。如郑某之子，六岁，拉痢十多日，日痢数无计，频繁呕吐，不能进食水，气神衰殆，声嘶音哑，唇齿干燥，舌质红降而干，脉细数。中西医束手，来求诊，先生曰：“此乃禁口痢”，痢之危症也，乃肠胃灼热，津液枯涸，胃之气阴耗伤较甚所致，以救焚生津为要，急用党参、石斛、黄连、石莲子、粳米、玉竹、姜汁（少许），以地浆水煎药细细呷之，吐出再服（一剂药用一天时间服之）。一剂呕吐止，二剂痢止，三剂减姜汁，地浆水与服，并用稀粥调养（藕粉为佳），以救养胃气，以行津液，四剂乃愈。

“七七”以后，滕县人民纷起抗日。先生思想进步，以大量财物纾国难，积极为抗日志士治疗伤病，并以职业掩护地下工作者，当时区政府赠给“喜志双全”德行匾。曾任双山县参议员、滕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务委员、卫生科副科长、中医院副院长等职。

姜开五，字福梅，滕县鲍沟乡东荆林村人。生于一八五六年，卒于一九三六年。

先生幼年才思敏捷，熟读经史。后为家有病人，遂立志弃文学医。独坐斗室，不闻外事，攻读《内经》，精研歧黄。对《寿世保元》、《医宗金鉴》等医籍，较为推崇，细心领悟，掌握要领，用于实践，医理精深，医术颇佳。清光绪年间，曾赴省会济南，应分省考御医之试，名列第二。先生擅长外科，对外科之医理尤精，投药辄效。业医五十余年，医望遍于苏北和鲁南城乡。晚年著有《众览集要》、《外科辑要》。后经沧桑之乱，大部佚失，现尚留残篇。

赵景封，字建侯，滕县荆沟村人。生于一八八一年，卒于一九四六年。

先生自幼颖悟不群，通晓经史，二十四岁入邑庠。适母病，三聘名医不至，致病势加重而亡。先生悲痛之余，发奋攻医，精研《内经》，博览群著。对伤寒颇畅新义，造诣颇深，别具慧眼。曾治东沙河村党姓之子，十五岁，求治前已患春瘟两月余。医者以伤寒治之，无效。待其病笃，方请先生诊治。患儿目闭神昏，四肢凉如冰霜，但胸热腹软，脉细而舌赤，苔黄少津，呼吸细微，已数日不进水米。先生诊毕便说：此邪侵少阴、厥阴之间，《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也”。先救阴以回阳，以复脉犀角地黄汤加石膏，一剂安，二剂愈。又以竹叶石膏汤，以善其后。从此医名大噪，全活甚众，就诊者门庭若市。

先生对麻疹的治疗，堪称一绝。曾治郑氏之子，年四岁，患麻疹。疹出一日即回，皮下黑点隐现，参差满身，高热无汗，烦燥喘急而大渴。即以清气化毒饮服之，药后喘止，继之红疹微现，烦安而愈。类似者不胜枚举。

先生治学严谨，诊断治疗，极其认真。常谓：“学医不深，即可杀人”。晚年医名远近皆知，社会名流赠给“贤士良医”、“仁术儒宗”德行匾二块，以彰其医德。

郝增印，字新航，滕县欢城（现属微山县）房庄人。生于一

八九四年，卒于一九七二年。

先生自幼即怀济世活人之志，潜心攻读医药典籍。年仅弱冠即从医济世，医术日益精进。一九三八年，日军入侵，占我乡土，残杀同胞，激起先生之义愤。先生以医为名，作地下工作。建国后曾任薛城县（现枣庄市薛城区）卫生科副科长，兼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一九五六年薛并滕县后，继任滕县卫生科副科长，滕县政协副主席。他重视中医工作，曾亲自主办中医进修班，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先生博览群书，对医学颇有造诣，晚年著有《妇科三字经》传世。

葛步云，滕县桑村乡葛庄人。生于一八二九年，卒于一九〇六年。

先生自幼聪颖，相传有目下十行之才，过目成诵。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无不阅读，学识渊博。后转而攻医，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典籍，细心阅读，心会颇深。长于内外两科。尤崇尚《伤寒杂病论》，反复研读，至老手不释卷。常云："仲景为我医之鼻祖也。"先生特专于伤寒，精于重诊，尤对病人的预后，常多应验，医望颇高。

先生用药简洁明净，药方少则五六味，多则七八味。由于药专力坚，每多丝丝入扣，切中病机，立奏奇功。晚年著有《寿世诊书·内科》，惜其散失，不得传世。

甄子芳，字兰斋，滕县城西南甄家洼村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七一年。

先生生而颖异。幼从学于清末翰林高熙喆和宿儒张法卿。后游学济南。通经、史、诗、赋，尤酷爱绘画，曾受教于伯祖甄松龄（字兰坡，又字留仙，为当代绘画之名士），并临摹名人画稿，熟知丹青。先生作画笔墨淋漓，精于"墨龙"，其作望之云龙隐现，跃跃欲动。先生本性温良，平易近人，与世无争。常曰：气宜养不宜动，事宜省不宜多；宁人负我，勿我负人；能使人敬

爱，不使人畏恶。

先生心存济世，志在活人。嗜读医籍，精研歧黄。精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宗金鉴》等，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医术重于内科。诊病不计财利，不避寒暑。贫乏者，治疗服药，不责其偿，亦不望其报酬，至病愈而已。可见先生乐善好施，服务民众之精神。至老弥笃，年逾古稀，犹夙夜匪解，勤勤恳恳，施医济民。解放后在鲍沟医院应诊，医望遍于滕、邹、薛、微、沛等地区。从医五十余年，晚年著有《痘疹要览》，颇具创见。

我县名医辈出，经验丰富，亦不乏有创见之著述。为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促进中西医结合，创建祖国新医学，自当有所贡献。因限于篇幅，简介者为数甚少，余者列表附于后，以见医林人才之盛也。

现代医林人物表

姓名	字	生卒年月	擅长何科	行医年限	籍贯	备注
朱广玉		1888—1948	妇科		姜屯洪疃	自制济阴膏效果显著
张瑞五	世昌	1905—1962	内科	30余年	柴胡店石楼	曾任副县长政协副主席
葛树臻		1901—1964	眼科	30余年	桑村葛庄	曾任卫生局副局长
方培卿	瑞杰	1867—1953	儿科		姜屯	
黄有会		1874—1944	中药		姜屯黄庄	
孔凡芝		1903—1976	内科		级索	政协委员
李家贤		1892—1974	内科	40余年	级索	
孔宪甫		1900—1977	内科	40余年	西岗	政协委员
王连步	丹墀	1862—1955	痘疹	40余年	西岗	著有《痘疹必要》
燕锡宗	佩谦	1886—1967	内科	50余年	西岗	政协委员
杜钦亮	寅卿	1872—1957	妇科	40余年	张汪杜庄	送有“术妙歧黄”匾额
李德田		1900—1980	内科	40余年	鲍沟吕坡	
颜道乾		1888—1934	内科	18年	金庄颜楼	
闫庆昌	光甫	1877—1970	内科	50年	金庄苗桥	
刘广跃		1827—1909	妇科	40年	城郊董村	
王次中	登荣	1887—1961	妇科	40年	平邑县城关	

姓名	字	生卒年月	擅长何科	行医年限	籍贯	备注
张永和	平甫	1915—1979	中药	40年	城头	
张长经		1917--1982	中药	40年	金庄	
赵宪钊		1892—1972	中药	45年	东沙河	
王恒泮		1896—1964	内科	40年	岗头屯里	
徐振东	寅谷	1880—1953	内科	40年	大坞大市庄	生前行医冯卯
陈树森		1898—1976	内科	50年	界河马厂	
万印堂		1903—1977	妇科		界河	
李会阶		1881—1949	内科		桑村	清末庠生
张子英		1907—1968	儿科	30年	城头	县五届人大代表
林景岳		1911—1960	眼科	20年	龙阳林村	
刘金钺	少曾	1894—1960	外科	40年	山亭	
刘明善		1886—1956	外科	40年	山亭	
秦庆余		1900—1974	中药	50年	山亭	
徐芳洲	殿瀛	1877—1957	内科	50年	徐庄	
王永配		1894—1969	中药		核桃峪	自制丹参膏效果较好
李景泉		1890—1975	内科	40年	羊庄史屯	县五届人大代表

姓名	字	生卒年月	擅长何科	行医年限	籍贯	备注
李汉臣		1885—1949	妇科	40年	羊庄	
王保生		1905—1971	外科	40年	南沙河	
袁子建		1870—1938	内科		南沙河	
陈庆松		1876—1922	妇科	30年	龙阳	
魏兴卯		1898—1970	儿科	50年	东戈后村	精于望诊
徐慎宇		1908—1972	内科	40年	东戈南明	
陈堂		1860—1944	内科	50年	东戈西戈	清末庠生
吕祥玺		1893—1966	内科	40年	东戈楼里	
马守先		1885—1949	妇科	40年	羊庄东堌城	
田作甫		1901—1969	儿科	40年	冯卯	
孙景丰		1890—1972	内科	40年	官桥	
王慎思		1893—1977	内科	40年	官桥	
李恒山		1917—1974	内科	40年	木石	政协委员
马德昶		1863—1944	内科	40年	徐庄良子峪	
许修源	博泉	1900—1972	儿科	40年	桑村于庄	五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巩来义		1858—1935	内科	40年	望冢	

滕县书院今昔

马昭航　龙厚昙

书院有二义：一是在唐代（公元618—907），为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二是自宋（公元960—1279）至清（公元1616—1911）则系私人或官府所设立讲学肄业之所。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具最有名者有白鹿（在庐山，宋儒朱熹讲学于此）；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岳麓书院，有四大书院之称。元代书院遍及各路、州、府；明清书院益增，但多为举业而设。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以后，诏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

（一）

滕县设书院自元朝开始，当然是属于第二种意义的。滕县，元时为滕州。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州守尚敏创建义塾于州治之南。尚敏是一个热心办学的人，曾“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钱五千缗，贷诸人，取子息，以供师弟子之食。明年，以礼教乡官地三顷给之”。（学士虞集《性善书院记》）这样，就使义塾经费有了保证。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监察御史、滕人任居敬上奏于朝廷，奏折中说：“昔文公闻性善之说于孟子，其事虽未竟，而其志有足嘉者。旧有义塾而无名题，宜表之曰性善书院，于以风励子弟，以广贤才焉。”朝廷准奏，把该书院划归学宫管理，委派了山长，聘请了教师，加强了对肄业学子的教育，

故“以后滕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康熙版滕县志卷七儒业二十一页），这是滕县书院的滥觞期，看来是办出一些成绩的。

孟轲之于滕县，确实是有相当渊源的。《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后来滕文公做了国君，向孟子请教治国大道理，孟子说：“设学校教民子弟以性善，谓之明伦；……”（《孟子》）上宫馆（现城郊卫生院旧址）就是孟子游说讲学下榻之所。滕文公根据孟子的教诲，实行了井田、学校制，使“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小国卓然屹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政绩是较为突出的，至今我们滕县不是仍留有“善国”的美称吗。当时尊奉儒家思想的学者，官吏不仅将书院冠以“性善”之名，而且还把书院作为祭祀孟子的庙堂。

值得提及的是元朝至正年间，性善书院“讲堂学舍摧坏荒秽”。山长丁振请示州官募捐重修，整饰一新，讲堂命名为“存心堂”。请当时客滕的刘逢源作了一篇《存心堂记》，记中有“七篇之中无非欲人存心也。以性善而名书院此固为知要，以存心而名斯堂者尤为肯綮之旨。”可见当时孟子在滕州是备极推崇的。今天看来，孟子的“存其心”一说，若作为“专心致志”来理解，则对于人们学习和做事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他的“性善”论，把人性归于天性，则明显地属于唯心主义先验论了。

性善书院的规模原来是不大的，“其屋四楹覆以瓦，其斋舍茅茨而已。”（虞集《性善书院记》）、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经州守郑某和张忙古歹（人名）相继改建扩大，就具有相当规模了。占地约八亩，右边是庙堂，以祀孟子；左边是讲堂，并有东西配房供学子习业。元末，书院毁于战火，经人改筑为尼姑庵。明朝成化年间，知县马文盛主持修复仍为书院，前殿三间祀孟子，后殿三间祀文公。其后，前殿倒塌，孟子废祀。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知县杜济时增建了大门二门，并重新彩绘了殿

堂，改为滕文公祠，而书院之名暂废。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知县李自蕃营建书院于南门外东侧（现保险公司附近），后毁于地震。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县令史秉直重建殿宇门垣，迁书院、孟子遗像于前殿，移本祠文公像于后殿，并悬以“古性善书院”的匾额，恢复了作为书院的旧制。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知县王志曾、王如玖利用府馆旧基创建“道一书院”（现城郊粮管所及以东一部分）。取名“道一”，当然是孔子“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篇》）的意思。“道一书院”规制较宏大，占地约十亩。按中国传统建筑的中轴线配置了四进院落。大门五间，中为通道，红柱飞檐，颇具气象，门外两旁分列石狮子一对，门对面左右分竖旗杆，历代碑刻镶嵌于东西两墙。第二道门曰仪门，门上雕金龙图案，威仪凛凛，生员举子经此门会有肃然之感的。进入仪门即第二进院，正房房基高出于地面约一米，共七大间，当中一间通前后院，此间上部有神龛一座内有“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木牌。这进院子正是拖着一条长辫子的青年学子，于每年春季入学伊始，向“圣人”叩头致敬的地方。高台讲堂之后尚有两进院子，是供师生起居之用。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知县洪用舟倡议，在滕人何维坤、黄硕卿具体协助下，于中间四个院落的东西两边各修了十八间考棚，考棚宽敞明亮，顾明思义，这是适应科举制度供举子参加县试的场所。从建筑风格上看，中为主体，两翼配以广厦，庄重肃穆，给滕阳古城增色不少。可惜，东考棚十八间于一九一〇年前后被一场大火烧掉。据说是东考棚当时作为宿舍，一位姓黄的学生磕旱烟袋锅烧着了草苫子而引起的。这块南北向长方形地方，后来就作为学校操场了。

咸丰十二年（公元1861年），捻军起义波及滕县，“道一书院”毁于战火。战后知县赵敏功据情禀报，又筹集资金重建“道一书院”，恢复其规制。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废科举办学

堂，书院改为“滕县高等学堂”，校牌为天津著名书法家张国谟所书。辛亥革命后改为“滕县高等小学校”。学校处数有所增加后，又编列为“滕县第一高等小学”简称“一高”。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滕县以后，该校为“滕县书院小学”。一九四四年伪县知事王峰青沽名钓誉，亲自书写横式校名“滕县模范小学”。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的几个月和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鲁南占领滕县的一年多时间里，仍叫“滕县书院小学”。一九四五年冬，滕县第一次解放，次年春为纪念在解放滕县光荣捐躯的王麓水师长，在书院办起“麓水中学”，并附有短师班。一九四八年五、六月间滕县第二次解放后，原校址成了粮库，学校移至后街，仍用“滕县书院小学”之名。“十年动乱”中，群众组织随意更名为“滕县防修小学校”。一九八一年经县批准仍恢复原校名“滕县书院小学”。

（二）

滕县书院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是有很大贡献的，无论在历代封建王朝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它都被看作是教育单位中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几千人规模的重点学校，正以崭新面貌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培养一批批人才，对这段情况我们将另章叙述。

自元朝成宗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六百五十多年，其中封建社会六百一十多年。在现有资料中统计，经科举制的遴选取得五贡以上功名的文武职人员五百多人，其中有甲科（进士）三十五人，乡科（举人）一百一十八人，绝大多数是经过书院的培养和科考的。他们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是维护剥削制度的封建知识分子，有

的甚至是死心塌地的皇朝奴才；有的积极参与对起义农民的残酷镇压，成为千古罪人。但这五百多人中，也有不少的志士仁人。他们有的被授予朝廷中枢或地方官吏，廉洁奉公，正直耿介，为后世景仰；有的热心倡导公益事业，并慷慨解囊修桥补路、疏浚河道，整修城池庙宇；有的设馆授课，不计名利，乐于为桑梓培育英才；有的砥砺名节，切磋学问，撰修志书，在学术论著中既有鸿篇巨制，也有诗词小品。据不完全统计，元、明、清以来，滕人著书约三百余部（卷），其中诗五十卷，留有诗词五六千首，医书三部；有的高洁不仕，超然物外，潜心书法绘画，广事搜集文物，考证碑碣及钟鼎铭文，对保存瑰宝，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做出有益的贡献；有的钻研和应用祖国医学遗产，或切脉处方，精制丸散膏丹祛病疗疾，或针灸正骨，割疮剔疽，以解除乡邻亲友病痛。限于资料和篇幅不能罄述，兹摄其著者，简录如下，用概全豹。

李洞，滕人，字泼之。经推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元泰定初年（约公元1324—1325年），授翰林待制，以亲丧未葬辞归。天历初年（约公元1328—1329年）以待制召，赴京特授奎章阁承制学士。适皇帝诏修《经世大典》，共八百八十卷，洞方卧病，却力疾同修。书成，进谒皇帝请归，随卒。洞为文章，奋笔挥洒，纵横奇变，意之所至，臻极神妙。尤擅书法，篆隶真草皆精，为世所珍爱。有文集四十卷。

张盛美，滕人，字元绸，明天启乙丑（公元1626年）进士第七名。为官“执法如山”“疾恶如仇”，初授凤阳府节推，后升为贵州道监察御史，“慷慨论天下事，弹劾不避权贵”，二年时间，上奏章百余，险遭权奸魏忠贤等的毒手。任河南怀庆道，辞官去怀之日“百姓焚香哭送数百里”。回滕县故里后，“优游园林，诗酒自娱”。著作有《署甬罪言》、《覃怀纪略》，诗集有《戊己》、《咽鹤》、《凌虚》等。

杨敝，字佩冕，滕望皂人。清嘉庆戊辰（公元1820年）进士。因母病“乃发愤精研灵素以下诸方书”，奉养有病的母亲四十余年。免费为乡邻提供医药，“疏方不过数味，一线单微，直达腠理，所投辄效”。曾任青州府学教授，著有诗、古文各一卷，家乘十卷。

孔继葵，字甫涵，号云湄，清乾隆丁酉（公元1777年）举人。精研仲景《伤寒论》等医书，“皆能得要领，损其太过，以剂所不及。著有《医鉴草》（原名“一见草”）。投药辄立效”。

黄来麟，字公振，号冶山，滕之北门内人。对桑梓教育有较大贡献，被时人誉为“枵腹从教”者。据《续滕县志》记载：公振以道光辛卯科（公元1831年）举人，大挑一等，不愿为令改教谕，莅长山县，勤考课，不名一钱。与县令忤，挂冠归，遂绝意仕宦。至家贫无食，质蟒衣充膳。拥臬比于道一书院凡十数年，以故得其指授者自从弟来晨（道光庚戌进士）、任斗南（恩贡）、郭印瑚（道光乙巳进士）、赵毓芝（同治壬戌举人）、张尚熹（同治辛卯科副榜）、王廷栋（同治癸酉举人）、高熙喆（光绪丙戌科进士、翰林院编修）皆出其门下。

高熙喆，字仲瑊，滕城关人。幼孤，家贫，由外祖家资助苦读。中光绪丙戌科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监察御史，宣化、大名、宁夏知府，有政声。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在宁夏耳闻高熙喆德政，后来隐居泰山，曾邀高去讲经学，相处融洽。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9年），身为御史的高熙喆弹劾山东巡抚袁世凯滥杀起义农民，其奏折称：“性情太刚，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适宜”。因而主张另外“简派一员，以为袁世凯之代”。还提出警告：“今都下汹汹皆谓袁世凯先行痛剿，然后奏报。虽属传闻，未必无因。万一百姓遍传谣言互相煽动，以致祸起燎原，不可收拾，该抚自问，能当此重咎否耶？”看来

高老先生对炙手可热刚愎歹毒的袁世凯还是敢于说话的。更可贵的是他晚年的民族气节。一九三八年春，日本侵略军进占滕县，高老先生逃难到了原辛庄公社板上村，一直不进城，并有“幸未失身归二姓”的诗句传世。是年秋，即逝世于板上村附近的小北河。学人赵兰斋先生的挽联是：

高躅继老聃，与世长辞，下代谁知周柱史；
清风怀靖节，避秦不返，北河只作晋桃园。

赵兰斋，滕东程堂人，老秀才，秉性正直，长于律诗和楹联，长期做中学语文教师。解放后，任山东省文史馆馆员。作为封建社会成长的知识分子，却能顺应历史潮流，至而热情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当一九四五年冬八路军第一次解放滕县城后，在追悼王麓水师长的大会上，赵老先生作的挽联挂在主席台两旁，其词是：

滕县从今名麓水；
英魂终古傍文山。

（注：“文山”即文峰山，在苍山县，王麓水师长遗体先葬文峰山，后移至临沂）一年以后，在各界人民庆祝滕县解放和纪念王麓水师长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赵老先生所作楹联又有“能教善国作金汤”之佳句。一九四六年曾被“麓水中学”聘为语文教师。

（三）

辛亥革命前后，滕县书院也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进入了民主革命的新时期。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书院改为“滕县高等学堂”，这是滕县第一所新式学堂。一部分接受新事物较快的知识分子，出于“拯救中华”的良好愿望，欢欣鼓舞，纷纷带头剪掉

辫子，也帮助入学堂的学生剪辫子。大门上悬挂了新校牌，讲堂两侧换上了对联，是当时的县知事姚诗志的手笔。其词是：

旧学商量加邃密；
新知探讨贯中西。

高等学堂的学制为七年，初四高三，高级的前一年为预科。适应新的培养目标，课程也进行了大的改革，除国文、算术外，尚有理科（包括：动、植、矿）、商业、修身、音乐、美术、体育等。体育是学德国式体操。当然经学还是作为必修科。第一任堂长是当时县教谕兼任的，此人叫王复祥，字又祯，郯城人，光绪丙子科举人。光绪二十年（公元1895年）任滕教谕，三十三年（公元1908年）再任。但名声不好，曾“为索贽见礼，不随，借考课痛打新生”。后由邑人公推徐芹伯为堂长。老先生不善当众讲话，上任时读几句事先编成的讲稿，中有“蒙诸公举我为堂长，不胜馨香而祝祷之”之句。

当时坚持留辫子，读四书五经，走科举道路的也大有人在。学堂供应丰厚的伙食，每饭有专人伺候，一些人还是不愿上“洋学堂”。于是在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不得不设立劝学所。劝学所长经常要带领“捕班”去各乡取缔私塾，甚至逮走塾师。后逐渐来高等学堂就读的学生也就多了起来，至民国初年，已发展到四个班（初级复式一个班，预科一个班，六七年级各一个班）学生约二百人，教职工十多人，学校已初具规模。

自书院改为高等学堂至“七七”事变，约四十年，学堂堂长校长（更迭约二十人，据不完全统计）如下表：

滕县高等学堂(一高)堂(校)长一览表

时　期	堂（校）长		籍　贯
清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成立	王复祥	（又祯）	郯　城
	徐芹伯		滕　县
	王仲阳	（宜春）	〃　〃
民国成立至“五四”运动	张金元	（善亭）	滕　县
	黄麟阁	（筱山）	〃　〃
	鲁显序		〃　〃
	黄仙洲	（德鑫）	〃　〃
	陈香谷		〃　〃
	任鸿祥		〃　〃
	王　宸	（枫亭）	〃　〃
	王之典	（仪文）	〃　〃
“五四”运动(1919)至北伐	黄以凯	（颈才）	滕　县
	李佩贤	（向喆）	〃　〃
	黄西峰	（有岐）	〃　〃
北伐(1926年)至滕县沦陷(1938)年春	李宝元		滕　县
	王普忱	（济广）	〃　〃
	王开昌		〃　〃
	李季民	（树勤）	〃　〃
	徐秀泉	（润峰）	〃　〃
	孔远衢	（繁达）	〃　〃
	赵洁亭	（省廉）	〃　〃
	高显亭		〃　〃

值得提及的是黄筱山先生。黄先生原名玉书，字筱山，受业于高翰林门下，深得业师赏识，赐名曰麟阁。后来黄筱山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先后受聘于宁阳、济阳两县高等小学任各科教员。一九一四年回县任高等小学校长，聘请知名学人，黄德馨、孟庆荣（邹县人）、张澄文（汶上县人）、闫笑愚（艺术科、鱼台县人），王文典、郭兆云、张金元（任体育课）等为教师，把学校办得成绩斐然。黄筱山先生热心办学，又有魄力。一次，张宗昌的一个军官带兵进驻学校，学校被迫停课。黄先生给那个军官说："因为你占驻学校，张督办（指张宗昌）记我一大过！"该军官立即把兵撤出学校。一九一七年黄升任济阳劝学所长，一九一九年回本县任劝学所长。在本县教育上有所建树，曾增设第二高等小学于陈公祠，又劝导士绅富户出资办学多处，计有鲁氏小学（鲁寨）、道溪小学（现公安局处）、文直小学（王东槐专祠）、培英小学（高中街）、一介小学（党村）等。

在"一高"的发展史上曾有过几个有趣的插曲。我们撷取其一以飨读者，从中可窥见滕县大官僚兼豪富争名夺利之一斑。约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东龙岗人王普忱（辅仁大学毕业）任一高校长。当时任韩复榘为主席的山东省政府高参，五所楼李天倪到校"视察"，正当学生午睡，就大发雷霆，说不该让学生"昼寝"，以故撤了王的职，换上了李季民。原来柴胡店的张家与五所楼李家（当时滕县人目为"张党""李党"）都想争这个滕县最高学府的领导权，王普忱何辜？却作了替罪羊。

由于滕县一高继承了老书院的传统，以培育英才光耀桑梓为已任；历任校长又多系本地深孚众望的学界知名人士，他们聘请的教师也多半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好的校风、学风经久不替，所以能相继培养大批有用人才。截至一九三八年春天，滕县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累计毕业学生约两千人，其中不乏佼佼者。他们有的为推翻清皇朝的封建统治而奔走呼号；有的积极参

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的直接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行列，出生入死，流血牺牲；当然也有的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如：

颜惠山，字兰亭。著名学者，治学严谨，不拘一家言，尤精法文。崇尚气节，“做人不做官”。幼年从高熙喆就读于书院。一九〇一年，清最后一次科考（已废八股文、试帖诗，考策论）中秀才。一九〇二年被选送入山东高等学堂法文班学习。后与丁惟汾、王鸿一等毅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一九一〇年因母丧回滕，任教于学堂，在师生中宣传革命，首先剪去发辫以示决心。一九二四年与友人山东王鸿一、河北米迪刚在北平创办《中华日报》，以发扬东方文化为宗旨。颜先生任总编，经常撰写社论，抨击时政。后因报纸刊登李大钊壮烈牺牲的消息，被张作霖查封。抗日战争爆发，颜先生激于民族大义，鼓励乡邻青年和子侄辈抗战杀敌。尔后一直讲学并隐居。解放战争期间，居南京清凉山扫叶楼。先生辛亥革命时期的老盟友丁惟汾，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长，曾三次往访，两次避而不见。一次见了面，只谈学术和家事，不及其他。颜先生著作其哲嗣正整理中。

董一博，笔名雷凌，幼年就读于一高时名董广文，负才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民族危机严重。少年董广文在一高校刊上发表了一首意味深长的小诗，题目《担心》：

我隔着一条小溪，
望见了几只家鸡。
鸡呀，鸡，
你上边有一只鹰儿飞着不去！

后相继在滕文中学、中国大学读书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抗战中曾被日伪逮捕，日宪兵队用毒刑未能使之屈服。汉奸史鹤亭用“同学旧谊”和美人计，也丝毫不能软化他。后敌伪把他放到华北医院治肺病，他在一位护士的帮助下，带了一瓶菜菔水逃出虎

口，即改名董开夫。全国解放后，历任高校领导职务，全国政协文史办主任。现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多次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导全国地方史志工作。

李乐平，原名李子升，滕县羊庄乡大赵庄人，一九二四年毕业于滕县一高。一九三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被捕，关押在苏州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领导党员和难友向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七七”事变后被释放出狱。同年八月回滕，组织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乐平同志与孙俊才、王右池、渠玉柏等在城东善崮创办“第五战区农民抗日训练班”，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乐平同志任政治委员。后任鲁中南行署主任、区党委书记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局长、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江苏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等职。一九七一年九月在南京病逝。

彭畏三，名国相，以字行，著名教育家。一高优秀学生，后毕业于国立师范大学英文系。历任省立七中、曲阜师范等校校长，成绩卓著。抗战初期即参加革命，任罗荣桓部高参、鲁南区参议长。建国后历任青岛市教育局长、山东师范大学校长。《大众日报》曾数次刊登彭畏三同志教育子女的经验。

刘子衡，名位钧，一高优秀学生。就读于二师（曲阜）时，值“五四”运动，因参与公演《子见南子》被学校开除。一九三六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治经学，被誉为“大师”。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中奔走最力，为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省司法厅副厅长。

黄树栋，字桴庭。一高优秀学生，后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擅书法、京剧。抗战期间，在重庆任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家庭教师。胜利后任《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杭州办事处主任，并曾供职善后救济总署和浙赣铁路局，解放后任青岛教育局副局长。

朱兴汶，字洛民，滕南冯庄人。一九二〇年毕业于滕一高，后考入省立二师，毕业后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入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九月毕业。历任军职。一九四八年春任国民党统治区的滕县县长。一九四八年冬，在韩庄一带率部起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经组织安排，又在四川上新桥率敌交警队起义。解放后任省政协委员。

汤位东，名震方，以字行，滕北汤庄人。一高学生，后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徐兖绥靖区副司令官”（正职系李玉堂），五十年代末被特赦。（待续）

作 者 附 言

由于历史资料匮乏，且限于我们的水平，定有错讹和疏漏之处。祈读后指正。

滕县华北基督教会与孤儿院

罗 广 海

据近代史记载："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越猖狂，到十九世纪末，欧美天主教、耶稣教……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有三千三百多人，入教的中国教徒达八十多万人。山东一省建立的教堂就有一千多所，教徒八万多人"。

滕县是山东省的一个大县。那些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当然不会放弃近百万人口的这个好地方。天主教和耶稣教在清末同时进入滕县。德国天主教在滕县南门里强买民房，占地十余亩。建立起天主教堂和修道院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在滕县北门外，强行买地和强买民房，修建基督教会，占地几百亩。基督教的势力在滕县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基督教不但建立教堂，还建立了小学、中学、神学院、医院、孤儿院。当时称之为滕县"五北"，即华北基督教长老会、华北神学院、华北弘道学院、华北孤儿院、华北医院。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美国人。教会的主要负责人是美籍牧师罗密阁；神学院院长赫士（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博士）；弘道学院的院长何赓诗（美籍）；孤儿院的院长是道女士（美籍）；医院的院长由罗密阁兼（传教士最早来滕县的是道女士、罗牧师、申牧师。）他们每人一座楼房。现在滕县教育局和进修学校住的地方就是道、罗、申的三座洋房，继之而来的有赫牧师、何牧师、道牧师、华牧师、毛牧师、鲍教士。当时神、弘两学院的教师多是美籍人，他们的中国话说得较流利。赫士的中文基础很好，有赫

秀才之称。因为我从小就在这个地方上小学、中学，所以知道的较详细。当时神、弘两院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教徒，高峰时两院学生不下千余人，教职员工二百多人，其中美籍教师占三分之一。这些美籍教师既有牧师头衔，又在学校里任课，他们都是全家来华。有的是五口之家，如申、卜、何等人都是三个孩子。他们每家都有一座洋房，连地下室四层，计六七十间。每家都有三至五个佣人：有做饭的、洗衣的、看门的、喂羊挤奶的、养花的，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也极为富裕。他们也和其他地方的传教士一样，任意买占华人土地，强买华人的民房。如神、弘两学院所占土地不下三百亩。在滕县北门外灶王河南，强买土地三十多亩，作为他们的墓地，名曰“耶稣林”，并设专人管理。另一方面他们还兼放高利贷。这些美籍的牧师和教士是受美国教会差遣而来。名之曰“差会”，“差会”每年的拨款，他们不存入银行，而存在滕县东门里的“华盛食品店”里。店主人是教会的长老，我不清楚是不是高利盘剥，但利息一定高于银行，这是肯定的。

滕县北关，当时是教区，说它是美国的租界地也未尝不可。因为教会有特权，中国政府不能过问教会的事，当地政府更无权过问学校。他们为所欲为，谁敢说个不字！滕县北关是华北基督教会的中心，教会在全县建立了不少的教堂和布道所。滕县乡村建教最早的是滕县城南仓沟，设有教堂一所，牧师、长老各一人，教徒发展到五、六百人。另外，王开、十里铺、冯村、郑庄均设有布道所。城西在大坞设有教堂，有牧师、长老、教徒五、六百人。另外黄庄、赵坡、姜屯、大彦、王晁、级索设有布道所。城北，七里沟、魏寺、林村、冯营、龙阳店、后屯设有布道所。城东在马家河口设有教堂，东沙河、大庙、党村、东郭、桑村、城前均有布道所。总之，基督教的发展较为普遍，基督教徒不下四千人，这些教徒多是些贫苦农民，多是被些小恩小惠吸引而参加的。如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些洋人利用教会公款救济一点

粮钱，有了病了，给点药物等，有无依无靠的孤儿，可以托人送到孤儿院。他们利用这些手段进行宗教活动，发展教徒，但也有些大地主为了借教会的势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也入了教。如北关黄家，城头王家，这些人入教除靠洋人保护财产外，还借洋人达到个人成名成家的目的。如有的靠洋人到美国留学，有的到教会办的一些名牌大学去学习。如燕京、清华、南开、复旦、齐鲁、金陵等，这些学校是教会办的，外国传教士有权向这些学校保送学生。这样，洋人利用当地绅士发展教徒，扩大势力；士绅借洋人保护自己和捞取好处，洋人和绅士勾结紧密，狼狈为奸，共同压迫和毒化人民群众。

滕县孤儿院是滕县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虽然收容的孤儿不多，但欺骗性却是很大的，关于孤儿院的开办情况，现根据回忆简述于下：

院内设院长（美籍）一人，是一位没有出嫁的女人，称之为道女士。设管理、护理人员若干人。孩子们在孤儿院基本可以吃饱、穿暖，到学龄时，得以在院里设的小学部上学。到中、高年级则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这是指中学）。女孩劳动任务主要是针织和刺绣，男孩在院里办的工业上劳动。有的孤儿院还种菜园，制酱菜（如峄县孤儿院）；有的织布（如南京大风路孤儿院）；滕县孤儿院是制肥皂。总之，孤儿院对待孤儿根据院长的喜爱而定。如孤儿院院长很喜欢院内一个女孤儿，就让女孩改姓了自己的姓，起名道美文，此女后来被送往大学，可能现在还活着。对其他的孩子，院长则动手就打，孩子怕她怕得发抖。至于院内中国的管理人员，还是好心人居多。俗话说："抬手不打无娘子，开口不骂老年人。"因而孩子们对管理人员也比较亲近，有感情。因我当时在孤儿院担任过教师，情况较了解，我没有见过有虐待致死的孤儿。滕县孤儿院是收五岁以上的孤儿，且多是女孩，一般情况下，都能自力生活。这所孤儿院后来随华北神学

院南迁，和南京孤儿院合并了，但仍然是独立活动。滕县孤儿院迁到南京鼓楼黄泥岗。有孤儿二十余人，院长王克己（中国人），管理员有毛先生和杨女士。当时我在那里任教，南京解放后，这所孤儿院改为泰东小学，并设有中学班。不久，我就到华东大学学习，结束后调到山东来工作了。

（罗广海，滕县人，现为枣庄八中教师）。

反 帽 税　打 帽 行

——滕县城北的反帽税斗争

张 知 寒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发动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一系列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种特权；中国则丧失主权，割地赔款。弄得民穷财尽，农业生产萎缩，灾荒连年不绝；工商凋敝，百业萧条；上下交困，财政枯竭。清朝统治者，照样荒淫挥霍，哪管人民死活。清政府实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工商各税，地租田赋，层层加码。并把巨额赔款摊派到各省，人民根本无力承担。因此，辛亥革命的前几年，全国人民反清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的“反捐税斗争”，曾彼伏此起地发生在全国各地。这些斗争，曾被视为“辛亥革命的总演习”。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发生在滕县城北的反帽税（当时人们称为“打帽行”）斗争，就是这次“革命总演习”的局部反应。因此说，这个事件在当时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谨将所知，概述如下，以求知情者补充和指正。

一

滕县城北，龙山前的几十个村庄，由于土地贫瘠，农民靠土地收入不足以维持全年的最低生活，不得不在农闲季节搞些家庭

副业，以补生活之不足。据老人传说，大约从明代开始，龙山前的贫苦农民，就以编草帽子（当地称席荚子）作为谋生的补充手段。这一带农民所编的草帽子，大都到龙阳店集上去卖，由经商人贩运到鲁西北各地。政府对这个行业原来是不征收捐税的。清朝末年，由于政治、经济相继出现危机，才命各地政府，拼命地搜刮民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滕县当然也不会例外，滕县郊区北坦的大地主杨应蔚和龙山前郭庄的地主杨兆銮，看到龙阳集上帽子的买卖比较兴盛，便向滕县官府买了一张税贴，包收龙阳店一带集上的帽税。编帽子是一种本小利薄的家庭副业，二杨一来征税，使编户无利可图。这样就大大地影响了这一带贫苦农民的生活。广大编户极为愤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杨应蔚、杨兆銮等，雇觅了二十多个“街滑子”、地痞流氓一类人物，到龙阳店集上征税，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东戈村西北的夏庄张某某，到龙阳店集上卖帽子，没有交齐帽税，即被杨应蔚带来的“街滑子”，把张拉到龙阳店东头周家旅店里，严加拷打，竟把这位被誉为孝子的善良农民活活地打死了。这个命案发生后，龙山前各村的编户，无不气愤填膺。在这些村子中，尤以顾家庙村群众的反抗情绪最为强烈。因此说，杨应蔚等打死张某某一案，就成了这次反帽税斗争的直接导火线。

二

龙阳店集上打死编户的命案发生后，顾家庙全村居民立即沸腾起来。这个村子是一个富有反霸抗暴传统的村庄。远的不说，自太平天国发动反清农民革命战争时起，在这里曾发生多次反政府的斗争。他们曾在优贡生张毓壬的第六子张老六的领导下，打过滕县知县林士琦，也曾打死过横暴一时的林士琦的儿子。他们是有斗争经验的。杨应蔚打死夏庄的张某某之后，顾家庙村的编

户特别感到不能容忍，坚决要打个“抱不平”。经全村共同商定，推举张老六的次子张培冀和张培显二人去滕县衙门告状，请求惩办杀人凶手，去消征收帽税。他们去县里告状的遭遇，就象京剧《打渔杀家》上的肖恩一样。不仅没打赢官司，反被滕县县官赵本厚以“包揽词讼”的罪名，各打了四十大板。县官赵本厚这么一打，就象火上加油，顾家庙村民更加怒不可遏，遂邀集龙山和孤山之前数十个村庄的编户，坚决进行报复。反政府，“打帽行”的斗争就这样爆发起来了。

第一、他们首先举行罢市。当时编户们认为，杨应蔚等所买的“帖”，是专收龙阳店集上帽税的，如都不去龙阳店赶集，他们就无法收税。因此，他们写了很多通告，到四乡张贴。根据老人们的记忆，通告大体是这样的：“杨应蔚等纠集无赖恶棍，在龙阳店集上横行无忌，肆行拷掳乡民和商旅，生命财产均无保证。我等公议，于每月的逢一逢六两天，在顾家庙立集，各类货物，概不收税。我等全力维护安全，四方商旅，何兴乎来哉”。通告发出后，四方商旅均云集于顾家庙新立的集上，进行各种交易。龙阳店是逢二逢七两天，人们赶完一、六的顾家庙集，就不愿再赶龙阳集了。这样一来，就使买了县府的税帖，专在龙阳收税的人们，遭到极大的损失。

第二、严惩收税人员。杨应蔚等在龙阳集上无税可收，便联合其他行会上县里告发顾家庙集上的首事人张培冀等。县官赵本厚立即下了一道手饬，与龙阳集上的各业“行头”（也就是收税的头目）陪同县里所派的二十名衙役，去驱散顾家庙的集。杨应蔚等也觅了二十多名“城滑子”，随同前往。衙役的领班和各业行头，都在龙阳玄帝庙坐镇指挥，由衙役和带来的“城滑子”去执行驱散顾家庙集的任务。顾家庙一带的编户，侦知此事后，不到半天就集合了数百名青壮年，手持扁担，在张培冀、张传举等人的带领下，把前来的衙役和同来的各类恶棍，统统活捉了起

来。从被逮的衙役口中，得知杨应蔚、杨兆銮等在龙阳店东头周家店里坐等喜讯。张培冀等立即带了五十名壮年，赶到周家店里，把二杨活捉了起来。依张培冀的意见，打算把杨应蔚、杨兆銮等就地处死。当时有些首事人不同意，才决定把杨应蔚、杨兆銮的腿打断，让他俩爬着回去。其余的各打四十扁担，放他们回去。要他们告诉滕县所有的贪官，如果敢再来横行，决予严惩不贷。

第三、做好继续斗争的准备。县衙门派来的这群恶棍，被各打了四十扁担放回去之后，村中父老知道他们不会就此罢休，必须准备好，以便作大规模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各位首事人分头去各村宣传活动，邀集了三十六个村子上的青壮年到顾家庙三教堂庙里开会。到会者达一千数百人之多。当时就组织了一个约三百人的“自卫会”，以保护来赶集的群众和四方商旅的安全。会上并推举张培冀、张传举、张培显、张培杰、张子杰、张清和、张贵鑫、张敬学、黄士启等十八人为会首，以便抗击前来侵扰的官兵。

三

双方斗争正处于紧张之际，代理滕县县知事赵本厚，调离了滕县。山东巡抚派毛澄来接任滕县知事。毛澄到滕县后，查看了有关案卷，听取了各方面的禀报，深深感到：如再派人去北乡镇压各村编户，将会惹出更大的乱子来。于是他便一反前任县知事之所为，决定派人说和，以平息这个乱子。毛澄获知，滕县北关已故黄来麟、黄来晨两位举人，原是顾家庙村进士出身的张景谔和优贡生张毓壬的学生，因此张黄两家，世代友好，为通家之谊。毛澄遂约请黄家出面调停。于是黄家便偕同官方人员到顾家庙进行具体协商。群众方面推张培显、张传举等作全权代表，向同来的

官方人员提出六个条件：（1）要求县府对杀人犯杨应蔚等进行严惩；（2）对夏庄的死者及其家属要活养死葬；（3）由杨家包赔这一事件中编户所受的损失；（4）要求官府出示明令：永不征收帽税；（5）由杨家出钱，在顾家庙和东戈集上各唱三台大戏，以示赔罪；（6）由杨家出钱立三座《毛公德政碑》，以褒扬滕县县知事毛澄在滕县的德政。如果能接受这六条，顾家庙愿自动把集撤销。滕县县知事毛澄完全同意了以上各条。杨应蔚、杨兆銮共卖了三百多亩良田，作了赔偿。这样，总算完结了这场震动一时的政治纠纷。

四

最后再谈谈“毛公德政碑”的情况。滕县城北各村编户希望能把毛澄许诺的各条，写在碑上，以警来兹。便由张传举等人出面，用杨家所赔的钱，立了三座碑。滕县衙门东旁立的一座约两米高，五十公分宽，顾家庙和东戈集上的两座碑稍小一点。三座碑文都是一样的。碑正中书“毛公德政碑”五个柳体大字。右旁有四百余字的碑文。文字大意是：毛公讳澄，四川仁寿县人。××科进士。光绪三十二年，文旌莅滕，知善国事。查莠民杨应蔚等，滋事扰民，无视王法……《诗经、豳风》有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自古为圣贤所许。龙岭一带，地近圣邑、古风尚存。居民昼茅夜绹，以编织为业，谋取薄利，以济生计。……公（毛澄）本圣朝体恤民艰之意，此地所编苇帽，准予永不征税。……署名、邑庠生张敬学（东戈村人）顿首拜撰并书”。左旁书有十八位会首的名字。我尚能记得的有张培显、张培冀、张培杰张传举、张子杰、张清和、张敬学、张贵鑫、黄士启等。靠碑的左边，书“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孟夏谷旦立石”字样。三教堂倒塌，群众把庙中的石碑统统拉倒，用于铺桥叠路了。因为村中编

户把“毛公德政碑”看成是帽业利益的护符，所以得到妥善保护。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占领滕县，又想在滕县城北征收帽税。顾家庙人领收税人员看了这座石碑，并严正指出：“你们要收税，其下场也要和碑文中所写的莠民杨××一样。”他们只好作罢。解放后，我人民政府的税务部门也多次来看过这座石碑，对这一带人民的斗争精神，曾予高度赞扬，并要求村里好好爱护这座石碑。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期，它还亭亭玉立于古庙遗址之前。“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学大寨运动中，大打机井，即用它砌井了。至今提起来，村中老人无不感到遗憾。

以上所记，全系参加这次反帽税斗争老人口述。我祖居顾家庙村，祖父和父亲两辈人都参加了反帽税斗争。从我记事起，就不断听到祖父和父亲以及全村老人们讲述这个事件。因此记忆较深，人物事件，均属确凿。谨记于此，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或有稗益。

这次斗争本为顾家庙领导发动的，因打死的编户张××与东戈的张家为同族，所以东戈张家也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斗争。首领人有三分之一是东戈姓张的。所以也在东戈立了一座“毛公德政碑”。

临城劫车案的我见我闻

王有持

从二十世纪初，自三十年代末，山东地区土匪遍地，掠人勒赎，人民日不聊生。在二十世纪初，盘据在抱犊崮（今枣庄市山亭区北庄乡）山区的土匪孙美瑶、周天伦、郭其才等人，在困境中异想天开，认为只抢劫本国人民的财物，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竟想超越以往土匪所抢劫的范围，把外国住在中国的侨民，也设法绑架来勒索金钱了。

临城劫车绑架西洋人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五月五日夜间十二点。当时有自上海火车站北上的特别快车，开到滕县临城（薛城）车站附近时，已深夜，乘客们有的正在酣睡；有的在车座上打瞌睡。猛听砰的一声，车身发生剧烈的震动，火车立刻停止了。当即有几节车箱由于出轨，倒了下去。乘客们突然从梦中惊醒，不禁骇异起来。忽然又听到爆竹似的枪声，响个不停。吓得车中客人妇哭儿嚎，有些身强力壮的男子，从车窗跳出，有的钻到车底下，有的爬到车顶上，天翻地复地乱作一团。不多会，枪声停了。许多土匪端着枪，气势汹汹地爬上车来。把客人的行李，胡乱翻腾，只要稍为有值钱的东西，尽量拿走了，又把车中的乘客，驱逐到车下，把旅客分为东西排列，站定后，数了数被绑架的乘客人数，强令跟着他们指定的方向走了。前后许多土匪持枪押送，竟毫无阻碍地来到抱犊崮山附近的目的地，才立足休息。据说当时被绑架走的中西旅客约有三百多人，其中西洋人二十多名，还有的说四十多名。有的说是

英、法、意、墨、美五个国家的侨民；还有的说是十三个国家的外交官员。因为北平是各国使馆的驻地，他们是从上海去北平的。虽传说不一，但这件事却震惊了世界各国，引起了国际交涉，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伙土匪在临城劫车时，为什么如入无人之境，绑架数百人，能够安全而顺利地走掉呢？当时临城车站，是山东督军田中玉的重要防区，有陆军第六旅第一团第一营营副颜世清带领两个连，驻守车站，负责保护铁路。旅长张文植及旅部驻韩庄，距临城车站不过四十华里。营副颜世清曾在五月四日下午，接到土匪出山的情报，是滕县警备队长杜兆麟特地赶来，向颜世清报告的。杜说土匪有出山的消息，请贵军警惕，严加防备。然而颜世清却以为是谣言，就不肯置信。杜兆麟气愤地告辞了。接着当地居民也报告土匪出山的消息，颜世清不但不听，反而斥责居民有意造谣，扰乱军心。两次情报都拒绝，当然也就不加戒备了。到了深夜，忽闻密集的枪声，明知是车站附近出事，仍按兵不动。后派一个排的兵力，前去截击土匪。排长发现土匪有一两千，寡不敌众，不敢进击，只是胡乱打了一阵子枪，远远地看着土匪从容而安然地走了。临城往东三里多，即是山区。当土匪们走近山区时，天上布满了白茫茫的大雾，几乎在数米之外也难看见人了。及至韩庄旅部派来大部队，因看不到目标，也不追踪了。就这样，让土匪们绑架了中西旅客，逍遥自在的赶回抱犊崮山老巢去了。（注一）

一

抢劫快车后，孙美瑶先在抱犊崮山附近龙门观神庙里住下来，此后在龙门观周围活动。龙门观的老道士曾亲眼目睹了土匪们折磨西洋人的惨状。以前帝国主义分子大肆侵略我国，极尽侮辱中

国人之能事。例如：在上海竟有西方人把“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字样，写在牌子上，公然挂在公园的门口。此事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事实，这当然也传到了干土匪的中国人耳朵里，他们虽然干的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他们在感情上也是不分良莠地仇视西洋人的。当绑架到西洋人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把对西洋人的气愤，发泄出来了。那时天已热了，他们叫西洋人穿着短裤、衬衫，去到山上拣柴，拣不来就用柘树条子抽打。因柘条有刺，抽得遍体流血。这是中国人对西洋人的蔑视和报复行为；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对华政策造成的恶果。正因为土匪既不懂国际准则，也不受国家政策法律的约束，才做出这种对西洋人报复的过头的事来。据目睹者说：西洋人穿着皮鞋走山路，走得很慢，土匪则用棕绳，穿透西洋人的鼻孔，象中国人习惯牵牛似的，牵着西洋人走路。这样西洋人怕把鼻孔挣破了，就拼命地跟着快走。还有更甚者，早晨西洋人起床后，土匪们都向西洋人脸上撒尿，说是给他们洗脸；吃饭时用尿泡煎饼给西洋人吃，不吃就用柘条抽打。土匪惨无人道地虐待西洋人，这说明，西洋人对中国人侮辱太甚了，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仇恨。（注二）

二

盘据在抱犊崮山区的土匪总头目孙美瑶做出惊动世界、引起国际交涉的重大事件后，曾扬言是为其兄长孙美珠报仇。究竟孙美珠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抱犊崮山附近龙门观南面八里路的白家庄人。地属峄县管辖，家有良田数顷，房屋数十间。他是在清朝末年参加过科举的读书人。后来在家教私塾学馆。在交接朋友上不择善恶，也为环境所迫，因为那时官府军队敲诈勒索，当地土匪骚扰抢劫。所在家乡既属匪区，又无力抵抗，如果不向土匪讨好、交往，则有倾家荡产的祸害。孙美珠兄弟五人，全家数

十口，为了保全全家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不交好土匪。正因为交接土匪，官府就嫁祸于孙家，诬孙家通匪，大加敲诈，官私两方实难应付。从地理条件上看，官方到来者少，土匪通过者多，不得不予以生活上的照顾，因而众多股匪对孙都有好感。此时众匪首各自活动，互不统属。为了应付官方有时追剿，又需要统一集中，团结才有力量。于是众股匪首，一致想推戴孙美珠作总当家的（匪语称首领叫当家的）。而孙美珠平素待人宽厚正直，在地方上又孚众望；在众匪首中也有信仰；又是富有之家。众匪首认为他难以落草，大家就采取“逼上梁山”的办法。其计是：众股匪凡所作案（即是抢劫绑架）则必声称是孙美珠的人所为。绑架肉票都要找孙美珠赎人。由于众多股匪，到处作案，皆散布此种谣言。被抢架的失主，即到官府报案，积案一多，官府为了敷衍人民的要求，只得通令缉拿孙美珠归案法办。孙美珠遇此通缉令，不得不逃避。最初逃到山外亲朋之家，一时众口嚣嚣，谣言频传。深恐在居民家中，难以避免官府逮捕，又想去山里暂避一时，而土匪有武装力量，能以抵抗官府，并且山里也是官府政令所不及施的地方。不料孙美珠的想法，为众匪首得知，当即请来两个戏班子，专等孙美珠进山时，令两班戏对台演唱，大肆宣扬这是为庆贺大当家入伙而演戏。这时也由不得孙美珠自己作主了，官捕匪戴，被迫无路，也只有落草为寇，作了土匪的总头目。这是民国初年的事。当时，孙美珠也看到，过去的土匪大头目郭太胜（即郭安）和栗凤羽二人闯荡了一阵后，招安成为官军，发往湖南长沙驻防，既升官又发财。孙美珠与其五弟孙美瑶被迫落草后，就想走这条路。孙美瑶劫车绑架西洋人的目的是引起国际交涉，迫使政府对其招安，以实现乃兄的志愿。如果能使乃兄的志愿得酬，也算把仇报了，所以孙美瑶大肆扬言为兄长报仇。（注三）

三

抱犊崮山是这一带山的主峰。这片山区，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宽约百多至二百里。峰峦迭障，山脉盘踞，峰回路转，沟壑纵横。既好隐蔽，又便迂回。是政府官令所不能及，军队所不易至的地方，所以土匪辈生，层出不穷。自民国以来，为土匪自由往来的极乐世界。西至滕县东江村以西；南至峄县枣庄以南，为土匪控制和抢劫的范围（即滕县东部、峄县西南部）。人民连年被烧杀、抢掠、架人勒赎，日不聊生，盼官兵清剿，维护地方治安已毫无希望了。于是人民迫不得已，起而自卫，抵抗土匪。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从江苏沛县传来了八卦道离门红旗会（也叫红枪会）。是一种迷信的会门。农民多以神道保护身体，又能壮胆。由于信仰一致，形成了组织。于是这种会门在农村普遍传开了，广大群众起来共同抗拒土匪。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六月在曹王墓、中顶山等村竟把一股土匪全部消灭，并缴获枪支弹药。因而激发了红旗会众抗匪的勇气，也进一步增强了联合防御。一村有警，周围各村会众，自动趋集救援，因此匪氛稍煞。但土匪总头目孙美珠不服气，还想扩大匪区地盘，以峄县西集镇首当其冲，妄图打下西集，借以镇压红旗会众的抵抗，所以总头目孙美珠亲临指挥，足见土匪对攻打西集的目的了。时天刚黑，土匪就攻入西集村里了，指挥部设在村边一户卖茶的人家里。当时有南塘村的红旗会众，姓郭的十六岁的农民青年，因急去西集增援，未及吃饭，赶到西集，因饥饿而到处寻觅食物。不料找到孙美珠设指挥部的那家去了。郭的衣着面貌是农民，手持扎枪，夜间模糊不清，看去象木棍（农民拿棍本是生活中的常事），所以孙美珠的随身卫士未甚注意，被郭闯入院中，郭看到孙美珠的举动架势不是一般人，认为一定是个大头目，冲上去就

猛扎了一枪，结果了孙美珠的生命。及至警卫发觉后，才用枪将郭打死。而孙美珠早已毙命，也无可奈何了。这时土匪攻打西集的战斗情况，仅剩一座碉堡尚未攻下，众匪闻说孙大当家已死，失去了主帅，匪众的战斗勇气也衰退了。并且天色将明，恐怕增援的红旗会众越来越多，打不下去，而损失更大，立即撤出西集退到南山上去了（南山离西集一二里路）。孙美瑶又把土匪组织起来，准备去抢孙美珠的尸体，此时匪众被打死打伤的很多，不敢再返回去了。孙美瑶大骂不已，有些小头目被骂得不耐烦了，便与孙美瑶顶撞起来说：如果一定要返回西集去，那末你在前面带头冲锋，咱们都去。孙美瑶也知道在西集、曹王墓和中顶山的战斗，成股的土匪，百把几十的被红旗会打死打伤，他也不敢带这个头，于是退回山里老巢去了。土匪在西集退走后，红旗会众便把孙美珠的首级割下献给滕县驻军。后来把孙美珠的头挂在滕县东城门的南旁两三个月示众。我本人在民国七年，曾被土匪绑架过，当时因避官兵追剿跟着孙美珠在一起。冬天三九天气，在枣庄北面的云雾山顶上的石棚下，过了三天三宿。及至孙美珠的死，才隔四年的时间，我认得确是孙美珠的头颅。以前我看到的孙美珠是有些儒雅气派，不象凶悍蛮横的贼寇。（注四）

四

孙美珠死后，这股土匪回到山里。匪众产生了畏惧情绪，因两次被红旗会众打得惨败，锐气已挫，情绪低沉，更感到行动困难了。本来山区里地瘠民贫，又经多年土匪盘踞，搜刮勒索，已到民穷财竭的地步。到山外打劫（滕县东部峄县南部），村村都组织起红旗会众，联合反抗甚力，往往有损无益。到北、东两面去，费县、临沂又无引线可寻，感到被困巢穴，坐食山空了。正在走投无路，想方设法要打破这个困境时，忽然有人前来做引

线，去临城车站劫车，绑架西洋人。那有招之不来的道理。孙美瑶是迫于环境，而闯出了震惊世界的劫车绑架西洋人的事件。

山东南部，抱犊崮一带，长期为土匪所盘踞，并能存在多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的政治制度、社会状况分不开的。自民国建立以来，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中央政权被满清帝制的余孽袁世凯所窃夺。嗣后徐世昌、曹琨等相继执政，这些满清官吏，腐朽已极，根本没有群众基础。故不得不笼络军人的武力，作为支柱，以巩固其统治地位。这样的所谓中央政府，不但对军人丧失了统治约束力，相反地却要依赖地方军队支持其存在。在政治制度变更时期，哪个军人不想混水摸鱼，各自发展，扩充实力，争地夺权，各霸一方？这就形成了军队是做官的唯一本钱（有兵就有官）。地方军阀们为了升官，拼命地扩充军队实力，只知对人民横征暴敛，至于对地方上的社会治安，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保障，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了。有些无恒产的刁民，便铤而走险。山东地处南北要冲，为兵家所必争之地。故连年发生频繁的战争，失败的一方，溃散的军队，枪弹弃置农村各地，这就便利了无赖刁民，有枪弹可以索取，结成武装抢劫集团，逐渐形成了多股土匪。山区有险可守，便于隐蔽迂回，匪众因之据为巢穴。地方官府无力对付（我记忆滕县东江村以东，多年官差衙役不敢投足彼地）。土匪在山区里，向人民或取或求，官府从来不加闻问，山里成为土匪休养生息的乐土了。在抱犊崮山区数十年间，出现前代土匪栗凤羽、郭太胜两大股，纵横驰骋多年，招安后发走湖南长沙。接踵而来的是孙美珠、孙美瑶、周天伦、郭其才大股土匪。后来又有刘桂棠众匪滋生（这是后话）。这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展到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造成社会紊乱的必然产物。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施行纵贼贻患的政策，招致了有损中国声誉的临城劫车事件。此事件既有其历史原因，又有其政治背

景……。

当时北方政府制度：省设督军，统率一省军队；另设省长，管理民政。因名义上是民国，也设有点缀品——省议会，也不过作为民主政体的装饰品，是发挥不了民主作用的。

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如徐世昌、曹琨等）不是满清帝制的残渣，就是直、奉、安福三系军阀头目，为了把持全国政权被强大的军阀头目拥上台的傀儡头面人物。所以一切政治措施，唯强大军阀之命是从，不然总统地位不可终日。各省议会、省长，亦上行下效，唯督军意图是从，方保无虞。凡是省议会决议的案件，对地方人民有益的善政，不利于扩军，虽善不行；对地方人民不利恶政，有利于扩军，虽恶必做。山东省督军田中玉，岂能例外。然而山东省以王鸿一为议长的省议会，竟敢不顺从督军田中玉的意图办事，于是发生政见分歧，也就必然产生双方争执。在斗争中各执己见，矛盾不能解决时，田中玉为了推行己见排除障碍，竟悍然不顾，将省议会解散，并侮辱了议员们（据说滕县柴胡店张思绍还被绑了一绳）。这班议员们受了军阀田中玉的侮辱后，气愤不平，欲为报复驱逐田中玉出山东省，斗力不成，只有斗智了。于是以王鸿一为首的议员们，聚会微山湖面、鱼台县（因王鸿一是郓城人），各县都有参加的议员，滕县议员比较出名的是五所楼的李子善、柴胡店的张思绍等，议定方案是由王鸿一坐镇湖面，众人奔走，集资运动各方面的有关人员。一方面在上海设侦探人员，探清某外国人在某时北上，坐某次列车，西洋人坐在某几节车厢里，某时开到山东滕县临城车站，再用钱买通铁路工人，到时把铁轨卸下，使火车出轨；另一方面用钱收买土匪孙美瑶，按约定时间到达临城车站附近，进行劫车。各方面准备妥当后，所以在公元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夜间十二点，发生此次劫车事件（如果不是夜间十二点，铁路工人不便卸铁轨，土匪行动也不好隐蔽）。当时，劫车绑架乘客三百余人，虽然是两、三个车

厢的乘客，不是全列车的乘客，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行动，不是土匪盲目劫车的巧遇。尤其临城站驻军颜世清副营长，在事前接到有土匪出山的情报，有意斥为谣言，拒不听信，及闻枪声知车站出事，却按兵不动，仅派一个排的兵力，截击土匪，明明是敷衍公事，在客观上帮了土匪，顺利劫车逃去，其言行表现，似出于有意，是否也曾接受了王鸿一他们的金钱运动也未可知。这说明此次劫车事件，不单纯是土匪突然劫车的巧合。而是山东省议员政客们与军阀田中玉斗争曲折反映的结果。据王鸿一等预先估计，此谋如能实现，会引起国际交涉，能够致使北方政府将田中玉撤职驱逐出山东省。可能达到报复解散省议会，侮辱议员的气愤目的的，就坚决的这样做了。

但王鸿一他们对此事极为保密，恐被人知，致遭非议，作为政治家来说，以勾结土匪，进行绑架，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未免手段太属卑鄙，故密而不宣。但此事发生后，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北方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体面，以出事地点在山东滕县境内，临城车站是督军田中玉的防区(陆军第六旅驻防地)，以不能保障中外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失官守，即在田与土匪谈判过程中，被撤职的。滕县县长赵某人（系满清举人来滕上任刚及三月，亦被殃及），也因事出滕县境内亦受撤职处分，官运不亨，遭此冤抑，殊为可怜！北方政府撤职督军、县长，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并借此自解其嘲，表明中国还有政令法纪。可是象田中玉这样的人，无视国家法纪，擅自解散省议会，侮辱议员，致造成此劫车事件，被撤职咎由自取。至若赵某人，滕县县长到任不久，情况尚未了解，按情理未免冤枉，可王鸿一等人的驱逐田中玉出山东的目的如愿以偿了。

五

临城劫车案的发生到和谈招安，是吴佩孚仿效了宋王朝对梁山宋江的政策。宋江招安后奉宋王朝命，去浙闽剿打方腊，胜利回朝献功时，被宋王朝毒死的。当时的北方政府以孙美瑶绑架西洋人引起了国际交涉。如果单纯地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深恐土匪以杀西洋人的生命相要挟，无奈只得以招抚的办法相欺骗，诱之以地位和利禄，竟为孙美瑶等匪首所接受。于是将匪众编为一个旅，孙美瑶为旅长，周天伦、郭其才为团长。是时，田中玉已撤职，由郑士琦代理山东督军。郑派第五旅第十七团团长吴可章为该旅执法营务处长，全面监视孙美瑶等人的一切行动。待收编就绪后，再实施第二步计划。同时，命令孙美瑶率其所部进山剿匪（使其同伙相互残杀），以立功赎罪，加官进爵。孙美瑶剿匪很尽力，待土匪剿得差不多了。仅因孙美瑶剿匪缴获步枪十七支，没有上报，作为借口，杀掉孙美瑶的。

此计出自吴佩孚，吴在洛阳曾派幕僚马济到南方各省巡视归来，在谈话中涉及到孙美瑶的事。吴说：不杀孙不足以绝匪患，不然将来效尤劫车者事件多矣。当时吴佩孚正在推行以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北方则准备消灭张作霖，南方则企图翦除国民党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的军事力量。时刻恐怕张作霖拉拢孙美瑶（因张前曾拉拢过河南土匪老洋人，给吴很大麻烦，今后怕张作霖拉拢孙美瑶牵拉其后方，妨碍其武装统一中国的计划）所以吴佩孚决定杀孙美瑶。吴于是密电山东代理督军郑士琦，郑又派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亲到枣庄执行吴的“谋死”命令。张培荣到枣庄与吴可章商议“谋死”步骤。决定在中兴煤矿公司，设筵邀请孙美瑶，庆贺剿匪功绩，但孙美瑶毫无疑虑，更不知是计，慨然赴宴。当时孙美瑶带卫士十一人，不料张培荣已予先埋伏下武装人

员，有两人袖中装满石灰粉，等孙到会与张谈话时，武装人员冲到跟前，挥臂将石灰粉照准孙美瑶及其卫士劈面撒去。孙美瑶及其卫士眼被石灰迷住，疼痛难忍，不暇抽枪抵御，随又被另一部分埋伏的武装人员，从背后抱住，按倒在地，捆绑了。因为缴获十七支步枪未向上交，指为不服从命令，杀掉了这一劫车事件首领，收编了这支军队。这支土匪也就从此告终了。（注五）

注　　释

一、以上情况是我村当时干土匪的殷××讲的，殷××是孙美珠的秘书，他参加了临城劫车事件，亲眼目睹了事件的经过。后来在家闲居，我以此事询问，他说看起来我们真有时运，刚拉到“客”（匪语绑架的肉票叫拉客），天就下了大雾，等大部队到来，我们已回到目的地了。

二、以上这段情况是龙门观老道士所谈的，他是目睹具体事实者。

三、以上情况，是孙美珠五服以内的族孙，孙××所提供的。

四、以上情况，是从我村干土匪的殷××口里传出来的，殷跟孙美珠作秘书，亲身经历其事，并且也是顶撞孙美瑶的小头目之一。后来不干了，在家闲居，谈及此事。

五、孙美瑶被捕杀的情况，是滕县韩村张××所谈，他当时在警察局，曾参加捕杀孙美瑶的斗争场合。

编后附言：

王有持，原名王右池，早年参加革命，现任市、县政协委员。

本文涉及的一些材料，系本人亲历亲见或调查所得。文中对这段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视为一家之言，供研究者参考。

“滕　国”漫　游

万　东

乘京沪路快车北上，跨过雄伟的长江大桥，穿越当年的淮海战场，便进入了齐鲁之邦的山东境内，列车停靠的首站即滕县。滕县是以古代滕国所在而得名的。曾为历代传颂为“贤君”的滕文公，其业绩见诸于《孟子》、《战国策》等古籍。怀着崇敬的心情，我踏上这片故土，渴望能追寻到历史的踪迹。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滕国在诸侯国中，是以其“小”而著称。滕文公在“上宫”礼聘孟子，求教其治国大略曾说：“滕小国也，间于齐楚”。而今之滕县，却以其在县邑中之“大”而为人注目了。据说县境东依蒙山余脉，西至微山湖畔，北起龙岭，南逾薛水，其方圆达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已有一百四十五万之众，堪称全省的“特大县”。市内道路宽阔，绿树成荫，楼房栉比林立，商贩彩棚云集道旁，五光十色的商品，眩人眼目。城区已有机械、纺织、酿酒、造纸、皮革、卷烟、建材、化工等百余家中小企业。据称某仪表厂生产的色谱仪其质量居国内之冠；工艺厂精制的石板画屏和小巧玲珑的首饰盒畅销于广交会上；附近建成的煤矿不仅装备精良，且煤质尤优，吸引了日本、西德、巴西等国人士前来光顾。然而，最吸引人的仍然是这里珍藏的历史文物。

在县博物馆的陈列室里，主人热情地为我们追述了滕国的历史。“西周初年，武王封其异母弟叔绣到滕，是滕国的第一位国君”。《左传》里有这样的记述：“隐公十二年春，滕侯、薛侯

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乃周之卜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这段发生在春秋朝鲁时"争长"的故事，反映了滕侯以王室嫡亲而自居的心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间于齐楚"两大霸之间的"滕小国"，竟然能相传三十一世，历时七百余年，直到战国周赧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二八六年），才被残暴的宋君偃所灭。

滕国故城据唐"元和郡县志"称："在城西南十四里滕城村。"展室里悬挂着大幅城址的照片。但见故城城垣依存，上已植树绿化，据称周长达四华里许，保护良好，城内除滕城村外是一片葱绿的果园和农田，清新而幽静。唯城东北隅有一高台，俗称"文公台"。相传是当年滕王的宫寝所在，台前古木苍苍，台上明朝万历时建筑的寺院殿宇尤存，巍峨屹立。

明净的展橱里陈放着瑰丽的滕国铜器，其中以"滕公鬲"最为重要，这件造型古朴庄重，纹饰复杂细腻的铜器上铸着"吾作滕公室隣彝"七字，是西周初年滕公的后裔为祭祀祖先所铸的礼器。还有一件上刻"滕侯虞之造"的铜戈，是春秋时滕隐公所造的兵器，虽已埋藏两千余年，而今仍乌光闪亮，锋利逼人。"滕器"以往见于著录者极少。三十年代郭氏在日本撰著《两周金文大系》时只收集到几件拓片，但均为"传世品"，现多不知去向，唯这里所藏者"地物有据"，因而不仅是史载滕国在此的有力佐证，也对研究这个奴隶制小国的政治、军事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摘自香港《新晚报》

发表于八一年六月

七千年前的村落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见闻

万　东

不久前，笔者有幸到了山东省滕县，参观了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北辛遗址。据说这是我国目前继在中原地区裴李岗、磁山之后，在东部沿海地区又发现的一处原始社会早期的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经“放射性炭—14”测定为距今七千三百四十五年。

遗址座落在鲁中南丘陵边沿的一条古河道旁，依山傍水，景色怡人。考古队在这处临河高地的中心位置开掘了棋盘状的许多方坑，仔细的逐层清理着出土的遗物、遗迹。承在场负责人士的热心介绍，使七千年前祖先的生产、生活景象得以再现在笔者眼前。

北辛遗址的先民已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生产。这是他们得以定居的重要条件。在居住区附近的一些窖穴里，出土了炭化了的粟类颗粒。它告诉我们这种耐旱的农作物是最早被北方氏族选择的食粮。人们使用石铲耕耘土地；用鹿角镐松土点播种子；用蚌镰、石刀收割庄稼；用石磨盘和磨棒脱粒粮食。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知道最早的一组配套齐全的农业生产工具。它为我国农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然而，当时的农业生产毕竟还不能给人们提供能以维持最低生活的需要，所以，狩猎、捕渔、采集等生产活动仍然是重要的生存手段。遗址中出土

的骨标、箭镞、弹丸、鱼叉和陶网坠等工具；在一些“灰坑”里发现食用后遗弃的兽骨、鱼刺均说明了这一点。

科学家对这里土壤中含有的“花粉孢子”作了分析和测试，认为当时这里是一片温润潮湿的沼泽地，灌木水草丛生，难怪在这里发现了鳄鱼鳞甲和数目相当可观的淡水螺蚌、龟、鳖的遗骸。在有些地穴的底部，存遗着坚硬的腐蚀质层和动物粪便，被认为可能是饲养过动物的场所。动物学家对两个保存完好的兽类头骨进行了鉴定，确认它们是“家猪型”头骨。这使我国猪的饲养历史有了最早的记录。

聪明能干的“北辛人”已经开始了编织、制骨等手工业生产。有两件残陶器的底部，清晰地印下了纤细规整的席纹；磨制精细的骨针和陶纺轮的出现，使利用野生纤维和动物皮毛编织，缝制衣着成为可能；制陶工艺尚处在原始阶段。陶器手制痕迹明显，器型简单，火候一般较低，纹饰古朴，独具一格。其中有一件通体饰以指甲印纹的红陶钵，精致典雅，不仅是一件实用器，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曾被郭沫若誉为“文字的起源”。我国目前发现的“陶文”，最早见于距今六千余年前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这次北辛遗址的发掘中，在数以万计的陶片里，发现了两片刻有基本相似的陶文符号，使我国陶文的历史提前了数百年至一千年。北辛遗址的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滕县地处黄淮下游，东海之滨，是古代传说中“夷人”聚居地。这一遗址的清理发掘对“东夷文化”以及此后发展起来的“齐鲁文化”的渊源，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科学资料，为我国灿烂的原始文化增添了新的篇章。

摘自香港《大公报》

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滕县轶事一则

城关镇供稿

再让一墙有何妨？

据传说：明朝万历年间，滕县城北门里，黄甸街，有张、黄两姓相邻，因筑墙发生争执，各据其理，各有靠山（黄家有族人在山西做巡抚，张家有近支在江西做知府），两家相持不下，提起诉讼，县令惧势，不敢审理，此案积压，久不了结。其后，黄家捎书给山西巡抚大人，请求支助此案。黄某秉持大义，回书附诗，劝慰族人，相善勿争，诗云："千里捎书为一墙，再让一墙有何妨？万里长城至今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千金养亲，万金养邻"！黄家得书，恪守家训，主动再让一墙。张家观之，得息而有悔，亦退后一墙。至此，两家和善如初，各相谦恭。为教导子弟，邻里相帮，友情为重，勿因区区小事而斤斤计较，致伤感情。两家商得，共同凿井一眼于其胡同内。井水甘美，里巷均乐，众议之，此井曰"义井"。传之于今，此井尚存，在今北门里街路西胡同内。

滕县古城四门匾额

滕县古城明清两朝均有修筑加固，四门筑成城门洞，城门上内外皆有名人书写匾额，气魂非凡，词意深湛。

东门外“宗鲁”，内“云连东岱”
西门外“怀古”，内“宝庆西畴”
北门外“望阙”，内“恩承北极”
南门外“迎薰”，内“化洽南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滕县委员会历届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简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人民政协是我党联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知识分子以及社会贤达的纽带。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建立人民政权中，政治协商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协组织也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滕县政协始建于一九五五年。第一届委员仅有五十九人，常委二十五人；第二届委员一百二十五人，常委四十五人，以后逐渐扩大。到第七届已达二百二十九人，常委四十二人。但是在十年动乱时期，由于“四人帮”实行“打倒一切”、“全面专政”，对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妄加罪名，百般摧残，践踏、破坏了党的统战政策，我县政协一度停止了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重点转移，遵照胡耀邦同志发出的“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号召。滕县政协又于一九八一年五月恢复。县政协首先对各方面的党外人士进行了适当的安排和照顾，尤其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而大大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在县委领导下，滕县政协认真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围绕着新时期人民政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争

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服务；积极开展人民政协外交活动，为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保卫世界和平服务”的三大任务，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发扬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以及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调动和利用起来。我县政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了较大贡献。

下面是滕县政协历届主席、副主席、常委一览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滕县历届委员会组成情况

职别 / 人数 / 届别	主席	副主席	常委	委员	开会日期
第一届	1	3	25	59	1955年9月16—18日
第二届	1	3	45	125	1958年5月20—23日
第三届	1	6	46	164	1961年4月8—12日
第四届	1	7	43	163	1964年3月25日
第五届	1	4	33	150	1966年4月28日
第六届	1	5	35	207	1981年5月10—16日
第七届	1	5	42	229	1984年5月16—22日

政协滕县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主席	孔良民	常委	李景宽
副主席	于庆丰	〃	曹景雪
〃	张瑞五	〃	杨洪九
〃	黄慕陶	〃	刘振东
常委	邵杰	〃	巩印华
〃	张瑞林	〃	仇有廪
〃	康金田	〃	于汇川
〃	韩瑞图	〃	马洪寿
〃	党金秀	〃	刘祖德
〃	赵全科		
〃	赵连银		
〃	王学田		
〃	万保厚		
〃	胡文祥		
〃	张继经		
〃	王寄萍		

政协滕县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主席	孔良民	常委	葛树臻
副主席	于庆丰	〃 〃	陈修德
〃 〃	张瑞五	〃 〃	朱传诺
〃 〃	黄慕陶	〃 〃	马子超
常委	辛大兴	〃 〃	曹景雪
〃 〃	闫守浩	〃 〃	赵呈文
〃 〃	刁俊然	〃 〃	魏仲拗
〃 〃	周永孝	〃 〃	李景宽
〃 〃	陈励亭	〃 〃	王修德
〃 〃	康金田	〃 〃	胡文祥
〃 〃	贺绪谟	〃 〃	杜书致
〃 〃	仇有廪	〃 〃	张继经
〃 〃	刘振东	〃 〃	孙雨亭
〃 〃	王寄萍	〃 〃	杨省三
〃 〃	于汇川	〃 〃	吕依民
〃 〃	马洪寿	〃 〃	董玉章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常委	韩瑞图		
〃 〃	赵连银		
〃 〃	张桂卿		
〃 〃	党金秀		
〃 〃	赵全科		
〃 〃	黄道玉		
〃 〃	杨长荣		
〃 〃	刘祖德		
〃 〃	杨传第		
〃 〃	庄兴元		
〃 〃	王立真		
〃 〃	邓永增		
〃 〃	李森		

政协滕县第三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主席	陈永峰	常委	王子富
副主席	韩瑞图	〃 〃	王景玉
〃 〃	于庆丰	〃 〃	郑一鸣
〃 〃	曹铭盘	〃 〃	余晓春
〃 〃	李景宽	〃 〃	陈古溪
〃 〃	黄慕陶	〃 〃	张雪梅
常委	孙敬岳	〃 〃	程斌
〃 〃	杨子相	〃 〃	赵连银
〃 〃	赵全科	〃 〃	黄道玉
〃 〃	党金秀	〃 〃	孙德成
〃 〃	王大如	〃 〃	王修德
〃 〃	魏仲拗	〃 〃	曹景雪
〃 〃	房筱山	〃 〃	王义文
〃 〃	贾瑞芳	〃 〃	张绍曾
〃 〃	刘振东	〃 〃	马洪寿
〃 〃	郝增印	〃 〃	于汇川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常委	张广德		
〃 〃	朱传诺		
〃 〃	孔宪述		
〃 〃	孙雨亭		
〃 〃	胡文祥		
〃 〃	岳家矩		
〃 〃	杜书致		
〃 〃	张继经		
〃 〃	王寄萍		
〃 〃	庄兴元		
〃 〃	吴道泉		

政协滕县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主席	陈永峰	常委	党金秀
副主席	韩瑞图	〃	王大如
〃	于庆丰	〃	魏仲拗
〃	曹铭盘	〃	王子富
〃	郑一鸣	〃	王景玉
〃	李景宽	〃	陈古溪
〃	张天刍	〃	陈玲
〃	黄慕陶	〃	程斌
常委	余晓春	〃	赵连银
〃	郝增印	〃	黄道玉
〃	杨子相	〃	孙德成
〃	孙敬岳	〃	王修德
〃	赵全科	〃	曹景雪
〃	王义文	〃	张绍曾
〃	贾瑞芳	〃	马洪寿
〃	刘振东	〃	于汇川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常委	朱传诺		
〃	陈修德		
〃	孔宪述		
〃	孙雨亭		
〃	胡文祥		
〃	岳家矩		
〃	杜书致		
〃	张继经		
〃	王寄萍		
〃	庄兴元		
〃	吴道泉		
〃	房筱山		
〃	王健		

政协滕县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主席	程怀仁	常委	郝增印
副主席	杨子相	〃	余晓春
〃	张天刍	〃	商太峰
〃	李景宽	〃	刘金凤
〃	黄慕陶	〃	李为义
		〃	韩可选
		〃	张正林
		〃	李波
		〃	张纪
		〃	秦咸诗
		〃	王岩
		〃	杨家和
		〃	宋永年
		〃	王承先
		〃	孙德成
		〃	王修德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常委	曹景雪		
〃 〃	王义文		
〃 〃	刘振东		
〃 〃	朱传诺		
〃 〃	陈修德		
〃 〃	孔宪述		
〃 〃	孙雨亭		
〃 〃	王寄萍		
〃 〃	杜书致		
〃 〃	胡文祥		
〃 〃	张绍曾		
〃 〃	马洪寿		

政协滕县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主席	殷昭瑞	常委	刘文玉
副主席	赵芳	〃	刘长春
〃	宋永年	〃	李继祥
〃	杨子相	〃	宋晓亭
〃	田洪宽	〃	陈芳泉
〃	崔振声	〃	何大美
常委	于汇川	〃	何贵善
〃	万树瀛	〃	吴寅春
〃	王宝成	〃	杜书致
〃	王牧天	〃	邵展
〃	王振祥	〃	应月娥
〃	王玉泉	〃	肖衍雄
〃	王树范	〃	周光成
〃	孙作民	〃	周玉超
〃	孙书琴	〃	周永杰
〃	刘玉礼	〃	张崇道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常　　委	官　景　成		
〃　　〃	赵　丙　铎		
〃　　〃	韩　可　选		
	〃　　〃		
	〃　　〃		
	〃　　〃		
	〃　　〃		
	〃　　〃		
	〃　　〃		

政协滕县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主席	郭良志	常委	孙作民
副主席	孔庆班	〃 〃	刘长春
〃 〃	田洪宽	〃 〃	孙书琴
〃 〃	崔振声	〃 〃	匡立己
〃 〃	鲁开杰	〃 〃	刘永祜
〃 〃	吴寅春	〃 〃	孙继孟
常委	于福德	〃 〃	宋晓亭
〃 〃	万树瀛	〃 〃	张殿维
〃 〃	马士珠	〃 〃	杜书致
〃 〃	王宝成	〃 〃	张长荣
〃 〃	王树范	〃 〃	郑良生
〃 〃	王牧天	〃 〃	赵介珠
〃 〃	王振祥	〃 〃	邵　展
〃 〃	仇光珍	〃 〃	吴家仁
〃 〃	童长远	〃 〃	郑硕田
〃 〃	傅明源	〃 〃	倪道臣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常　　委	吴　向　飞		
〃　　〃	应　月　娥		
〃　　〃	周　光　成		
〃　　〃	杨　遇　春		
〃　　〃	贾　庆　贞		
〃　　〃	肖　衍　雄		
〃　　〃	张　　韬		
〃　　〃	杨　爱　玲		
〃　　〃	赵　俊　德		
〃　　〃	黄　佳　君		

政协滕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征集文史稿件启事

遵照全国政协关于“征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要求，我会大量征集文史资料。为“广征博采”特向全县各界爱国人士，广泛征集以滕县地区为重点的文史资料稿件。

一、征集范围：

1．自1898年戊戌政变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各个历史时期的资料。（详见县政协文史会编写的“征集参考目录”）

2．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工商、医药、宗教、民族、侨务和社会，以及其他方面敌、我、友三方面的材料。

3．有关现代史的文物、日记、遗稿、书信、手迹、歌谣等。

二、撰写要求：

1．求实存真，要写亲历、亲闻、亲见或熟悉的人和事。

2．文史并茂，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求完整，长短均可。

三、来稿处理：

1．来稿请交滕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2．对来稿文史委员会有权删改。

3．所送稿件不要一稿多投。

4．来稿酌情发给酬金。

附：征集文史资料参考目录

（征求意见稿）

一、政治、军事

1．有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捻军对滕县的政治影响及其活动情况的资料。

2．辛亥革命时期滕县史实。

3．戊戌政变（康梁变法）对滕县影响。

4．有关在讨袁运动中高熙喆弹劾袁世凯的资料。

5．“五四”运动以来滕县学生运动史实。

6．有关军阀混战对滕县人民祸害的资料。

7．有关韩复榘在滕县的资料。

8．有关滕县城国民书店的资料。

9．国共合作时期滕县的政局。

10．有关“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中滕县抗日保卫战的资料。

11．日本侵略军在滕县的血腥统治、残酷扫荡和烧杀的有关史料。

12．日军侵占滕县后“维持会”、“新民会”等日伪组织活动情况，汉奸附逆情况及其有关资料。

13．日伪特务机关在滕县的内幕的有关资料。

14．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至1949年建国前滕县的社会状况。

15．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活动情况。

16．滕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组织的斗争史

料。

17．国民党第一军团第一纵队司令暂编第六师师长孔昭同在鲁南与我党合作抗日的有关资料。

18．国民党二次入滕后摧残、烧杀人民群众的有关资料。

19．国民党滕县党部的建立、发展的有关资料。

20．三青团在滕县建立组织及其活动情况的有关资料。

21．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在滕县的组织活动情况的有关资料。

22．一一五师挺进鲁南山区的有关资料。

23．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滕县“收编日伪军”情况的有关资料。

二、财政、经济

1．有关北洋军阀和日伪、国民党统治时期滕县的交通、邮电演变情况的资料。

2．近百年滕县的较著名的商号、工厂演变情况的资料。

3．日伪统治时期滕县经济状况的有关资料。

4．近百年滕县饮食、服务行业史料（澡塘、照相、旅店、饭馆名吃技艺）。

5．滕县烟厂的发展资料。

6．滕县同丰锅厂的发展始末。

7．滕县比较著名的手工业产品发展资料。

三、文化、教育、卫生

1．滕县新学制的兴起。

2．有关滕县乡农学校的资料。

3．有关滕县第一所女学——文庙女学的资料。

4．有关滕县麓水中学的资料。

5．有关滕县繁蔚中学的资料。

6．有关滕文中学的资料。

7．有关滕县华北神学院及弘道院的资料。

8．滕县日伪时期的奴化教育的有关资料。

9．滕县一中的发展演变。

10．滕县考古史略。

11．滕县予剧团的发展演变。

12．滕县柳琴剧团的演变发展及著名演员。

13．滕县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情况。

14．有关滕县近代著名的医生的资料。

15．李店正骨膏药的发展情况。

四、民族、宗教

1．滕县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及其风俗习惯。

2．滕县籍华侨的分布及情况。

3．天主教、基督教在滕县的组织活动情况。

4．滕县华北基督教会。

5．一贯道、白莲教、红枪会在滕县的组织活动情况。

6．近百年滕县的佛教、道教（寺院、庵堂、观庙、主持僧尼道众、庙产及其活动）概况。

五、人　　物

1．罗荣桓同志抗日时期在鲁南——滕县地区革命活动情况。

2．王麓水烈士在滕县的革命事迹史料。

3．张光中、李乐平同志在滕县革命事迹史料。

4．有关彭畏三、张少溪同志在滕县的革命史料。

5．有关孙兰峰同志的革命史料。

6．有关刘子衡同志的革命史略。

7．有关孔昭同同志的抗日事迹。

8．有关孔繁蔚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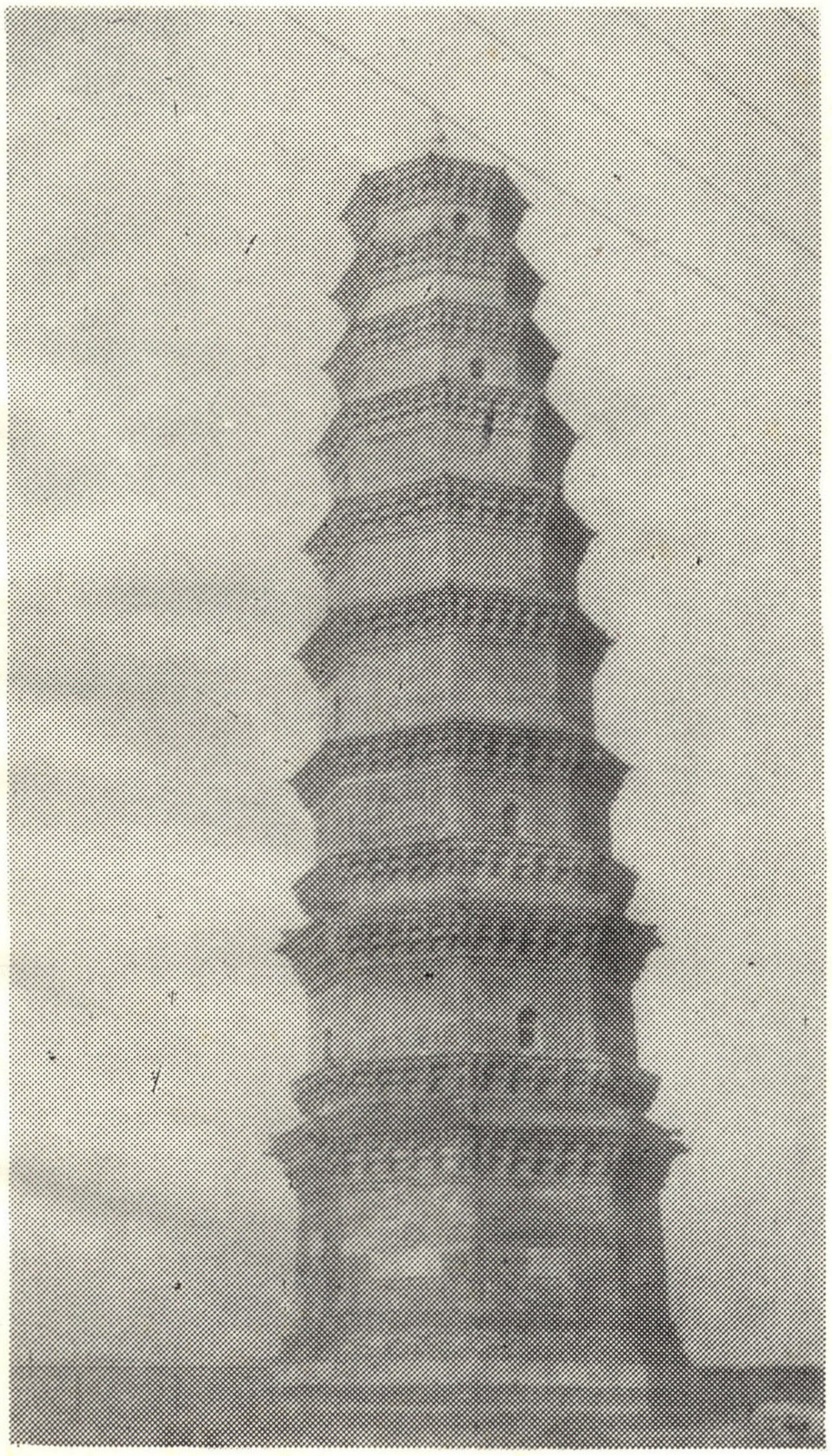
9．有关陈名豫（雪南）的资料。

10. 有关高熙喆的资料。

六、社　　会

1. 安清邦在滕县的组织活动情况。

2. 土匪恶棍、流氓集团、赌博、烟馆、妓院、迷信等资料。



龙泉寺塔，位于县城东郊。据有关专家考证，其建筑风格属北宋，距今已近千年历史。由于长期受自然侵蚀，加之屡遭战火，使塔刹倾倒，挑檐脱落。为保护文物，对古塔于一九八四年七月进行全面维修。修复后仍保留了宋代建筑风格。

万树瀛摄影

书名题字：李剑晨
张　悟
封面设计：王牧天



滕县印刷厂印刷